

炎黄春秋

第 8 期
2010年

杜光：改革的目标模式

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

“一厘米主权”与赵作海的生死

曾彦修：我认识的胡乔木

1959—1960年贵州粮政日记

目 录

沉思录

- 1 我看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杜 光
8 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何 伟

亲历记

- 15 朱厚泽的到任和离职……………李炳华
20 大跃进前后的煤炭工业
……………徐达本 口述 徐平平 蒋燕燕 整理

春秋笔

- 26 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王启星
32 黎澍批判专制主义……………王曾瑜

一家言

- 35 “一厘米主权”与赵作海的生死……………郭道晖

人物志

- 37 我认识的胡乔木……………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记录整理

故纸堆

- 44 1959—1960年贵州粮政日记……………王民三

求实篇

- 53 为何“耀邦不愿动华国锋”？……………胡德平
56 批评性报道的“送审”制度曾被取消……………戴国强

往事录

- 59 刘顺元和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的交往……………马懋如
62 697人丧生的新疆61团场火灾……………高 栋

争鸣录

- 64 关于“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李 锐
65 “万岁”口号之我见……………郭道晖
67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冯敬兰 刘进 叶维丽 宋彬彬 于玲

怀人篇

- 76 “京剧革命”与李琪之死……………王红领
78 我心目中的廖承志……………瞿独伊
79 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艾 以

忏悔录

- 75 匿名信让我错杀人……………张红云

海外事

- 81 古巴革命与华侨的命运……………程映虹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副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 徐庆全

社 长 助 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 李 晨

副 总 经 理 兼 网 络 总 监: 张晓鸥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吴 思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6.90元

我看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 杜光

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有不容忽视的缺陷。社会在繁荣富强的表象下,潜伏着深刻的危机。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极有必要回头省思存在的问题,以寻求更好的发展路径。

一、中国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模式

为把改革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首先应该对改革 30 年来的成败得失,进行必要的总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认为,改革过程所出现的许多失误和缺陷,原因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没有找准改革的目标模式。

当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目标的,因为它起初并不是人们自觉选择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社会拖到全面崩溃的边缘。人民公社社员为了活命,冒着生命危险实行包产到户。当时有所谓“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间谚语,就因为当时主持四川和安徽工作的领导人,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允许试验的宽松政策,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里,却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在几个月后的一份文件里,还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1979 年 9 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仍然强调“不许分田单干”,但同时允许“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

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独户”,可以包产到户。从 1980 年开始,包产到户才逐渐得到普遍的认可,并美其名曰农业生产责任制;1981 年底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还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表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源头的农业体制改革,是农民的改革实践一步步地推动着领导人的改革意识,当然谈不到什么目标模式。

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使农民丰衣足食之余,还析出富余的劳动力和十分有限的资金,于是出现了最初的私有经济实体——摊贩、游商、个体工商户,以及小规模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在城市里,大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城市,为了生活,也摆起了小吃摊、维修点、理发铺、杂货店等等。乡村和城市的这些经济细胞,突破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统天下,为市场经济争取到了最初的阵地。胡耀邦主持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则为新生的商品经济



1979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提供了宽广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使它得以迅速在全国城乡蔓延开来。

市场经济的萌芽和成长,使得死气沉沉的社会经济生活变得生气勃勃,使执政者的目光越出了结构调整、综合平衡、管理体制、关停并转等单纯计划经济的框框,承认商品市场和个体私有经济的积极意义。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过十年的改革跋涉,市场经济终于获得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为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反而模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在政治领域,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摧残迫害,官方和民间对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政治,都有殷切的期待。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愿望。这个报告提出要肃清官僚主义、家长制、权力过分集中、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但是,由于这些改革的实施触及“四项基本原则”,所以报告过后就偃旗息鼓、无声无息了,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目标模式了。

二、应当确定什么样的改革目标?

要确定改革的目标模式,首先要认清改革的性质,弄清楚为什么要改革?

当人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厄难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大家普遍意识到,导致文革悲剧的体制,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十分明显,50年代中期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名言:“一个社会制度,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生产关系,在它借以

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母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上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任何一种经济成分的生产力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连影子都没有,更谈不上成熟。也就是说,50年代的中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经过民主主义”,就到达的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是社会主义呢?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像苏联共产党人反省的那样,经济上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了国家权力,在文化领域垄断了真理裁判权,公民权利受到全面侵犯。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改革这种缺陷明显的体制。这也是一百多年来的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在现阶段的主要形式。

但是,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我们还是把中国社会看做是社会主义社会,把改革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同时又承认:“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搞不清楚”(邓小平语)。让“还搞不清楚”的东西去“自我完善”,就只好“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反映了改革指导思想的悖论:改革的历史任务是要革掉行政权力全面控制社会的专制主义的体制,而改革者的思想却又把这个体制看做是社会主义体制而加以维护。这个矛盾贯穿于30年的改革全过程,也是改革中的一切缺陷的总根源。

这个矛盾还表现在“不争论”的提出上。所谓“不争论”,就是不要去争论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极左派攻击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要走不出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争论起来,改革者就必败无疑。这才有“不争论”的大政策。

其实,改革派的领导人只要离开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高举我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名言,理直气壮地宣告改革就是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是为了“到达社会主义”而必须“经过”的民主主义,就可以驳倒极“左”派的责难。

理解了改革的性质是现阶段的中国民主革

命,它的目标是要革除专制主义的体制,我们就不难确定改革的目标模式,那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

三、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经济市场化

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是自由竞争。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该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其资本,和任何其他人和其他阶级相竞争。”

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也是它得以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活力的源泉。因为有竞争,所以企业经营者必须不断改革经营方式,革新生产工具,改善技术条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以求在同行业中出奇制胜,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受到非经济力量干预、控制的市场经济,则会制造竞争者之间的不平等,违反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使市场经济处于一种病态的无序状态,甚至出现劣胜优汰的现象,阻碍生产力的正常发展。

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由两股经济洪流汇集而成的,一股是在个体户小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经济,一股是由台港澳和外国投资者兴办的经济实体。至于国有经济,从一开始就同市场经济若即若离。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实际上是由市场经济和垄断经济两大板块构成的。经济市场化,就是要使市场经济成为统御整个经济领域的经济形态。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营经济的繁荣。而民营经济30年来的发展轨迹却表明,它几乎无时无刻不处在垄断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挤压之下。许多企业家被迫讨好权贵官僚和垄断企业,以求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统称“36条”),



改革开放后,个体户开始在街头涌现

为民营企业打开了进入垄断行业的大门,但在国有垄断企业和有关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民营企业要进入垄断行业却困难重重。有人把它形容为“两门”现象:一是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一是弹簧门,好不容易进去了,却被弹了出来。时过5年,不久前国务院又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几点意见》(被称为“新36条”),再次强调允许民营企业投资垄断领域,改善他们的融资条件,但这个文件是否能够切实贯彻,恐怕前景未可乐观。

为什么官方文件再三强调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民营经济,实际上却总是贯彻不下去呢?这里固然有既得利益者的私利在支配着决策,但更重要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因素。

按照权威的说法,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两条是论者都承认的,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两个来自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特征,不但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同市场经济相互抵牾、格格不入的。市场经济的最主要的特征是自由竞争,权力介入之后,还能有什么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呢?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需要纠正和澄清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可是,在我们国家里,却把国家所有制的垄断经济,说成是公有制。由此可见,把“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有问题的。

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应该是国有垄断经济,而应该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公民社会的温床、中产阶级的摇篮、劳动者就业的主要依托、工人阶级有产化的希望所在。三十年来它已经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权力机关和既得利益集团能解除对它的束缚,制止对它的侵害,它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目前中国的经济形态,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和垄断经济各占半壁江山。以市场化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使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实现优胜劣汰,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此,一方面要开放垄断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入,同国有企业竞争;另一方面,要取消国有经济对资源、产品和价格的垄断,把它们赶到商品市场里去,通过竞争来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指导思想上就必须挣脱斯大林主义的枷锁,转变许多习以为常的错误观念,实现政企分开,不要干预市场经济的正常活动。只有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利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时,国家的调控干预才是必要的。

四、政治改革的目标模式——政治民主化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公民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它表现为一种国家制度,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古希腊的梭伦改革和伯里克利民主,是古代民主的典型模式,但那只是有产者的民主、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民主成为普适性的价值,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事。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以来,民主的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中,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提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号召,赢得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拥护,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广大民众从“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中深深体会到专制主义的罪恶,强烈吁求改革政治

体制,建立民主政治,但迄今看不到启动改革的明显迹象。执政党的文件里虽然不断有改革政治体制的说法,但也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政治,在现阶段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目前社会上的所有弊病,如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丧、腐败严重、贿赂公行、官民对立、治安恶化等等,总的根源都在于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民主政治,是解决当前所有社会弊病的总枢纽。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内涵就是宪政民主。所谓宪政,就是依宪决策、依宪行政。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既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也约束每个公民的行为;它不但符合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也符合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宪政民主已成为所有民主国家的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和追求。

宪政在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继《宪法大纲》之后,中国也有过多部宪法。但是,宪政仍然遥遥无期。

宪政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这两条要求在现行宪法条文里都有所体现。如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里,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等等。对于政府权力及权力部门之间的制约和监督,宪法也有明确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立法权、任免权、监督权;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它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使行政职权,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则“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在这些条文里,公民的权利,权力机关的职责和相互之间的制约、监督,都有着明确的规定。目前,推进宪政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的课题,在于恢复宪法的两大基本功能:保障公民的自由权

利,实现权力机关之间的制约与监督。

五、文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文化自由化

文化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表现及其成果,这些成果的积累就是文明。

一般说来,文化和自由是相互影响、同步发展的。文化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自由度,而社会的自由度往往有赖于文化的进步。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诸侯忙于争霸称雄,给文化学术提供了比较自由的空间和比较宽松的环境,诸子百家讲学授徒,各抒己见,带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比宏富的文化遗产。民国初期,政客和军阀粉墨登场,他们为了争地盘争权力,放松了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控制,加上西学东渐,人们求知若渴,于是便出现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上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发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开辟了相对自由民主的新时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里,对文化的管制最为宽松的10年,尽管文化专制主义频频干扰压制,但言论出版的相对自由,国外学术著作的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恢复,使社会文化出现了一个复兴繁荣的小高潮。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自由对于文化发展,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总的说来,这60年的时间,除了1989年前的10年外,在文化领域都乏善可陈。从围剿《武训传》,改造思想,批判俞平伯、胡适,到反胡风、反右派,知识分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战战兢兢地苟且偷生;有些学有所成、才学宏富的学者、教授不堪百般凌辱,以自杀来表示最后的抗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文化自由的摧残,造成了文化凋零、知识断代的严重后果。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和复印技术的普及,自由文化获得了崭新的活动舞台,出现了日益繁荣的山寨文化、山寨出版物。由于它们是自由思想、独立创新的产物,往往比官方文化更有社会价值,更有历史意义,因而已经成为延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但是,如果文化专制体制不

改革,那么中华文化就很难有再现辉煌的时刻。而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自由还给文化,实现文化自由化。

六、社会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平等化

平等观念来源于启蒙时代的自然权利思想。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来到世界上的,有什么贵贱贫富之分?这个观念在欧洲是容易深入人心的,因为平等是基督教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它一旦进入人们的头脑,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因此也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1776年制定的美国《独立宣言》就明确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也在第一条就指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时至今日,平等已经成为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却没有平等的遗传因子。从奴隶社会的主奴之分,到封建社会的“人分九等”,每个人都是有着严格的尊卑划分的。农民造反,不是为了争取平等,而是“彼可取而代之”;知识分子十年寒窗,是为了“金榜题名”,即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帝制中国终结之后的100多年来,平等观念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回顾60年来平等在中国的历程,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为地制造了两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一个是由“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构成的贱民阶级,他们被打入社会底层,承担着繁重的劳动任务,却得不到应有的合理报酬;社会上—有风吹草动,便被拉去批判斗争,他们受尽凌辱,日夜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状态。另一个是农民阶级,他们名义上是人民公社社员,和工人同为国家主人翁,但实际上却被剥夺了很多公民权利,不但享受不到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种种福利,而且连劳动的自由都遭到剥夺,在房前屋后种一点瓜菜,就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饥荒岁月出去讨饭,也要经过大队批准,更多的人却被斥为“破坏公

社形象”、“给党抹黑”等等,只能坐以待毙。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以大无畏的气概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把上千万的贱民从社会最底层提升为平等的公民;在农村,亿万农民冲破人民公社的枷锁,搞起包产到户,夺回劳动的自由权,实现了自我解放。这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带来了社会的相对平等和自由。

但是,在相对的平等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例如:同样是落实政策,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后就业无门,生活困难;而“文革”期间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多数官复原职,他们的许多子女凭借父辈的权势迅速致富,成为权贵阶级的最初源头。

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促成了权贵阶级的诞生。许多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和主管者,利用机会,或内外勾结,或上下其手,或明目张胆,或暗度陈仓,总之是把国家财富装进自己的口袋。与此同时,新老权贵纷纷上阵,占夺国有大企业的肥缺。于是,一个利益相关、既贵且富的权贵阶级就出现了。

在民间,有些不肖之徒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巴结、贿赂、美人计等等手段,勾结权贵,巧取豪夺,拉拢官府,欺压百姓,短短几年里就成为富甲一方、雄霸乡里的豪强。

这两部分人在近几年来不断勾结在一起,成为现阶段不平等、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他们仗仗政治权力,掠夺民众的财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圈地、拆房的浪潮。当受害群众起而抗争的时候,他们就调动警力予以镇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要解决大量因不平等而造成的社会危机,一方面,必须铲除不平等的根源,限制剥夺者的权力;另一方面,应该发育公民社会,解除对于结社的种种清规戒律,调动民间维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使处于弱势的分散的民众,发展成为足以同侵权者抗衡的力量。

七、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

目前的中国社会,在朝在野都有三股持有不同发展目标的政治力量:一是坚持继续改革并且不断深化改革的改革派、民主派,二是主张维持

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三是竭力想把社会推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派。对于社会的发展前景,我们当然不希望改革停滞不前,更不希望极“左”时代卷土重来。但是,深化改革是一条曲折复杂而且无比艰辛的道路。我前面提出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目标模式。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到达这个目标,很值得认真探讨。我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供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参考。

(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前已指出,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和垄断经济各占半壁江山,经济市场化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使市场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坚决贯彻2005年的“36条”和今年的“新36条”,使这两个文件成为民营企业通达垄断领域的桥梁;打破垄断企业和有关部门设置的“玻璃门”、“弹簧门”,严惩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违抗国务院决策、阻挠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的权贵集团成员。二是制定《反垄断法》,打破国有企业对资源和价格的垄断,使自由竞争的原则,在国有企业间也能畅通无阻,把它们赶进市场经济。

除此之外,以下几项措施是有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可以考虑在条件适当时实行:

1. 逐步推行按生产要素分配。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一个很有创见的观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奇怪的是,这个提法很快就在文件、报告和媒体上消失了,多年不见踪影。我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现阶段最好的分配方式,但应该把劳动力计算进去,就是说,企业获得的利润,应当按照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做出的不同贡献,分配给这些要素的所有者。

2. 实行职工持股。可以先在一部分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里试行,然后逐步推广。职工持股是实现工人阶级有产化、使职工成为企业主人的重要步骤,应该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高潮里,有些企业把资产的一部分分给职工,结果被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斥为“国有资产流失”,勒令改回去。这是非常可惜的。

3. 把土地还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上世纪80年代初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产量逐年提高,但六七年后就出现了生产停滞。这时应该进一步改革,把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提高为所有权,以继续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当时见不及此,没有解决,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一方面,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使政府得以用种种借口,或直接下令,或与地产豪强勾结,侵夺农民土地。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将会遏制这个趋势。另一方面,处于小生产状态的农业生产,同市场经济很不协调,土地所有权可以成为农业小生产经济同市场经济接轨的桥梁。

(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当前许多社会弊病的总根源,这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也的确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我认为,要改革政治体制,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依宪治国,依法治党,杜绝贪污腐败,就必须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定期向民众公布官员的经济情况,以便更好地接受民众的监督。同时,建立政府工作公报制度,各级政府部门,都应定期发布公报,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目前亟需解决的是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遏制权力的横行霸道。为此,不能只有体制内部的监督,还应该通过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以舆论和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监督政治权力。

(三)关于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自由化的核心是实施宪法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其他文化活动如新闻、学术、创作、演出、创业、竞争、网络等方面的自由,就有了基本的保证。文化自由不仅是文化繁荣的不二法门,而且是监督政治权力的最有效的工具。而要向文化自由化迈进,就须有破有立:要破的是限制有关文化主管部门的权力,他们有责任创造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条件,却无权为文化发展制造障碍;要立的是制定《出版法》、《新闻法》,保障新闻出版的自由。这样有破有立的结果,不但可以带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而且为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供无数有效的形式,新闻、出版、文学、理论、电影、戏

剧、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发挥监督政治权力的作用,网络就更不用说了。近几年来,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互联网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应该使它成为推动改革深化的有力工具。

(四)关于社会体制改革

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日益严重,劳资、官民冲突的日益频繁,充分显示出社会平等要求的紧迫性。为了逐步填平又大又深的不平等的鸿沟,很有必要培育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公民普遍具有权利意识、并能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公民社会和国家权力、市场经济鼎足而三,共同推进社会有序发展。我们距离这样的社会还很遥远。培育公民社会,首先需要在各级学校建立公民教育体系,使所有公民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公民教育,树立公民意识;其次是制定《公民权利义务法》,用法律的形式把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确定下来,以便人人遵循。

八、简短的结语

把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我认为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会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模式,但任何特色和模式都不能违抗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历史潮流。

近一两年来,所谓“中国模式”的喧声甚嚣尘上。所谓“中国模式”,指的是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政治上保持高度集权。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近几年繁荣崛起的奥秘所在。把这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的暂时现象,说成是一种规律性的成功经验,是非常荒唐的,反映了既得利益集团力图保持现状、反对深化改革的政治意向。我们没有理由因所谓的“中国模式”而自豪,相反,应该看到隐藏在表面繁荣背后的严重危机,老老实实地探求改革的最佳的目标模式。只有广大民众都来关心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发展的路径选择,才能最终找到最理想的目标模式和最便捷的发展路径。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吴思)

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

• 何伟

最近看到《求是》杂志主管、主办的《红旗文稿》今年第8期上,刊登中国社科院徐崇温先生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一文,读后引起一些思考。

文中主要内容是讲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表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好,放弃马克思主义也好,反正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违背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但对“科学社会主义”只字未提。可是文章标题中用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两者是同义语、还是有区别,就不得而知了。

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

目前一些人往往以捍卫“科学社会主义”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它的内容是什么,人们还是说不清楚的,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其实“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后人杜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为未来社会设置“预定看法”和“提出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因而就没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

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恩格斯说: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待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在1893年恩格斯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同样坚持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894年1月,有人请恩格斯为社会主义新纪元题词,他说“用不多字来表达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

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恩格斯早在1886年,应邀谈社会主义特征时指出:“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从以上引语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情况下,谈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必然会堕入“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征只能“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才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没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是后人强加给经典作家的。

人们往往把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误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恩格斯这里讲的“科学”是说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不是论述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恩格斯在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时说:“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解决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端,消除这些弊端是思维着理想性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他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恩格斯在讲到社会主义如何由空想走向科学时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

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明亮的阳光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这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3页)这就表明,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而不是从人们头脑中产生的。这就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的社会主义”相对应。“科学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虽一字之差,但含义不同,一个讲的是社会主义奠基的理论基础,一个讲的是未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应将二者混同起来。为未来社会规划的蓝图,应称之“科学社会主义”,但恩格斯始终回避这一问题。为什么?我认为:一是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时,提出一些特征必然会陷入空想。二是防止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人类”,束缚后人的手脚。三是恩格斯认为“我们是不断发展者”,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会“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所以,在他们那里没有一个完整的、固定的“科学社会主义”蓝图。

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现在有些人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内容是斯大林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什么“科学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实践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存在80多年,还扩展到十几个国家,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鼓励和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影响全世界。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将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社会实践,为探索社会主义“特征的看法”,提供了一个可以“从历史事实和

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由此就可以得出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结论——失败。

第一,从苏联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来看,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后是失败的,当苏联解体时,没有人挺身而出,为捍卫苏维埃而进行长期的英勇战斗。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质变,其他保留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斯大林模式作为改革对象。目前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表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已经尘埃落定。

第二,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斯大林的一种探索,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首先,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只限于“过渡时期”,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的消亡,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存在,存在的是自由人联合体。而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党专政,又变为一人独裁专政。而目前一些人所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

其次,斯大林所确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三大特征,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为它们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是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你是私有我是公有,你是生产无政府状态我是有计划,你是剥削工人我是按劳分配,没有体现自由、平等、共同富裕,这一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本质。

再次,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斯大林将马克思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变为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公有制违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教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都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的两种公有制理论是城市剥削农村,导致体制、制度、政策上的不平等。

所谓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官僚统治经济,一切进行垄断、进行配给,消费品严重匮乏,形成短缺经济。

所谓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保证人们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平均分配,使贫穷普遍化。

最后,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人们没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迁徙的自由,是缺乏民主、



1930年,苏联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土地、牲畜以及所有的农具都成了国营合作社的财产

人权得不到保证的社会。人们没有监督、罢免政府和官员的权利。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把本国人民害苦了,所以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苏维埃联盟立即垮台,社会主义阵营立即瓦解。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人们80多年的国家,就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为捍卫苏维埃而进行顽强战斗,表明这一制度已失去人心,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斯大林的伟大之处在于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探索,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前车之鉴,避免后人重蹈覆辙,从中吸取教训,在斯大林的模式上,重新探索社会主义。

可见,斯大林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因而不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

三、历史唯物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王震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访问英国。“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辛子陵文)王震是党中央领导人中反对自由化最积极的人之一,这次访问英国回来他也犯了自由化——赞美了资本主义。这表

明目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条件的出现并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人为的产物,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发挥作用的结果。

任何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客观规律,它的作用不以社会制度的区别和执政党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照样发挥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讲到,资本主义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机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三个阶段,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股份制,引起了生产关系重大变化,马克思称之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私人资本的扬弃,即为社会资本,使生产关系出现局部质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发生变化,因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也应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也会与时俱进。恩格斯在1895年,即逝世前5个月,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恩格斯指出当时的观念是“幻想”,斗争方法“陈旧了”,我们“错了”,历史消除了“迷误”,这绝不只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应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和战略的转变。

首先,在取得政权上的变化,由单一的武装斗争转变为议会斗争。恩格斯讲:“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见同上第607页)“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现在大都陈旧了。”(见同上第603页)“最近五十年来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见同上第

607页)现在应转到议会选举上来。他指出:“‘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见同上第602页),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利用俾斯麦实施的普选权进入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取得了巨大利益。恩格斯赞扬德国党,指出“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见同上第601页),“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见同上第602页),使普选在欧洲大陆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见同上第603页)对于在战略上这一重大转变,恩格斯很感慨地说:“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见同上第610页)

其次,在消灭私有制上也有转变。从股份制出现以后,他们对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又提出了另一条途径。马克思说:股份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5~496页)私人资本扬弃以后,“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见同上,第493页)马克思指出私有资本是“自行扬弃”,表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规律发挥作用。马克思又说:股份公司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须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资本论》第3卷,第49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

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恩格斯在1891年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从以上这些引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有了新的看法。一是,不用剥夺、股份制可以使私人资本“自行扬弃”转变为社会资本;二是,把股份企业看做是“合作工厂一样”,“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三是,“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的必需过渡点”;四是,股份制可以使“无计划性也没有了”;五是,“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页)实践证明:股份制的本质特征是资本社会化,以适应生产力高度社会化的要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推行非国有,不是“私有化”,而是股份化,股民从300万猛增到1000万,增加了几倍,如一户一人持股,近80%的家庭持有股票,表明资本公众化。

总之,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指出了一条通过普选权掌握政权的路线图。他们又通过股份制指出了一条由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路线图。这二者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区别,第二国际执行的是晚期马克思主义路线,也是考茨基、伯恩斯坦所执行的路线,也是目前民主社会主义党所遵循的路线。

晚期的马克思主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早期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蒸汽机生产力基础上,社会化水平很低,残酷剥削,贫困绝对化,阶级矛盾尖锐,在这一基础上所产生的理论和策略只能是举行起义和武装斗争。现在看来“错了”是“幻想”,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

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见同上第 597 页)。所以,建立在蒸汽机基础上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产生这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同恩格斯所说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99 页)。在当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2 页)。

而电气化引起资本主义又一次经济革命,“这个经济革命自 1848 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真正确立了大工业……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这“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见同上 597~第 598 页)。电气化使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社会化已冲破一个工厂,已普及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使工人运动达到更高的水平。建立在电气化生产力水平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晚期的马克思主义,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就提出政权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和所有制通过股份制使私有制“自行扬弃”,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斯大林创建社会主义所依据的理论,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将其空想的社会主义,“从外部强加于社会”,因而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了本国实际,最后导致失败。而民主社会主义者执行的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和谐,和平过渡,因而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们物质丰富,才出现王震副总理所说的“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的结论。

现在信息化使社会化已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全球一体化、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技术一体化、信息一体化,为世界大同提供了物质基础。联合国和 WTO 等国际组织,对维持国际秩序,缓解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目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已成为世界潮流,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步让位于如何对待人类共同生存的问题。这样的国际形势在过去是不可思议

的。欧洲联盟是一个典型,它打破国界、取消关税、统一货币、建立统一议会和政府,形成几十个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联盟,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曾记否,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人提出欧洲建立联邦或邦联的主张,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进行批判,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必然引起战争,不可能出现联邦,实践证明列宁的判断是正确的。但现在不同了,共同利益的追求,化解了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有人计算过,在欧元出现之前,持 100 元马克在 15 个欧盟国家走一圈,什么都不买,就只剩下 50 元,其余 50 元都花在货币兑换上,耗费的时间还不计算在内。实行同一欧元就可避免这些损失,利益的驱动促使一体化、社会化,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发挥作用。

王震副总理访英后发表的观感值得我们深思。他一方面承认这些国家已具备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共产党执政。可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十项基本政策,在一些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现了,而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反而没有完全实现,这就表明: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规律的作用,不论共产党是否执政,都要走向共产主义。如果把共产党执政看作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条件,那么共产主义就成为共产党人的专利,共产党人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商标,这显然不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位学者而不是神,他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76 页)。马克思主义也要适应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要求,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才能永葆青春。

四、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序言中说,当德国人看到《资本论》揭露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采取讥笑态度时,他指出,这时德国人还受旧观念的影响,是“死人抓住活人”。我们国家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宰的国家,观念决定着行动。没有观念的转变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但政治改革远远滞后,因而使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止步不前,甚至有些

倒退,其原因是斯大林的阴魂不散,作为一种潜在的主旋律笼罩在我们的上空,还没有完全摆脱“死人抓住活人”。我国《宪法》第七条已将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界定为“国有经济”。而《宪法》第六条却将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又要回到斯大林所设计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体制,用计划经济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回归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在经过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对斯大林应重新评价,过去的“三七开”,只表明功过之间的数量之比,而不能表明功过内容质的规定性。应从过程看功过,应从结果看成败,对斯大林重新评价。

第一,斯大林是一位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伟大探索者。列宁虽然领导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就逝世了。斯大林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创建一个完整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人。这一制度在苏联存在了80多年,还扩大到十几个国家,并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不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一探索的功绩是伟大的。

第二,斯大林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误导者。斯大林所杜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有许多是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如全民所有制、商品和价值规律等),但却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被后人误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谁要是违背他的理论和制度,就被扣上修正主义或叛徒的帽子,有的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如南斯拉夫),有的被肉体消灭或驱逐到国外(如布哈林、托洛斯基等)。

第三,斯大林在历史上也曾辉煌一时。他在很短时间内使苏联实现工业化,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强国。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打败希特勒。在军工、航天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

第四,斯大林最后是一个失败者。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不得人心,顷刻之间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瞬息之间瓦解,到目前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已变质,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其做为改革对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可盖棺论定。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但没有追究制度的责任。斯大林犯错误固然由他个人负责,但不应回避这一制度的纵容,不能制约斯大林犯错误,这一制度的弊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带有普遍性,表明制度之使然。可惜赫鲁晓夫没有从制度上找原因,反而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继续坚持这一制度,对待不同意见者——莫洛托夫等人,将之打成反党集团,进行清洗。不对斯大林式的体制进行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因此应该用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代替单一公有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代替单一的平均分配。我国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引起世人瞩目。但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甚至还倒退,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表明目前还没有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国企改革经过近20年的摸索才找准改革对象——政府,取消几个中央工业部,政企分开,这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但在工业部改为专业公司后,这些公司继承了原来部的垄断权,依据改革的进程应对这些垄断企业进行改革。但可惜的是,不仅不对这些垄断企业进行改革,还要“做大做强”,提出“国企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党执政的支柱”,将“以公有制为主体”改为以国企为主体,表明国企的重要性。这种扬国企贬民企的思维和做法都是受斯大林理论的影响。可是民营经济在我国的作用不应低估,当清一色的国企走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时,是民营经济拯救了中国,免蹈苏联覆辙。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平分秋色,各占半壁江山,这时贬低民营经济是很不明智的。

今日央企已非昔日国企,在所有制、人事制度、经营决策上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利润不上交、自行分配,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补贴,已发生变异,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凭借优势的垄断,以各种借口——如用保GDP的增长、保就业、保社会安定、应对金融危机等等,来挟持政府。在斯大林理论影响下,我国目前呈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双轨制,这些央企发挥他们的双栖功能,从市场经济获得经济利益,不承担风险;从计划经

济获得特权,不承担责任;以向国际惯例看齐向国家讨价还价,以中国特色来获取特殊利益;以企业高管身份获取高收入,以政府级别获取省部级待遇;他们可以回避计划经济的纪律约束,又不受市场经济带来的惩罚,他们已经成为既得利益的权贵。

这些垄断央企虽然获得优势资源垄断特权、获得政府大量投资特权、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特权、获得股票优先上市特权,获得红帽子等等特权,但经济效益低下,贡献率低。国企占有60%以上的社会资源,对GDP增长贡献不足3%,就业贡献不足20%。今年全国政协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披露,“2009年私营企业工业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增长6.9%”;……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5.3%,国有企业同比增长0.8%,私营企业主业收入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降低0.2%;从最重要的利润指标来说,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同比增加17.4%,而国有企业同比降低4.5%。”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国有工业实际增加值平均为0.83%,民营工业则为2.87%,是国企的3倍多。2009年国企利润中80%是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提供的,其余绝大多数国企要么产能过剩、要么亏损。如果与国外同业来比差距更大。2009年,中石油人均盈利为1万美元,已经认为效益不错,而埃克森美孚人均利润为50万美元,相差几十倍。

虽然新中国的历史和目前中国的现实,已经证明国企经营效果差,但政府有关部门还是要把国企“做大做强”。

一是扩大国有经济控制的范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战略调整,指出:“国有经济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为社会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一《决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之内,这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战略。由此国资委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要集中精力和财力把“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搞好;二要促使一些国企从非国有经济控制的行业和领域退出。但国资委不仅不这样做,反而要扩大,将《决

定》中的“自然的垄断行业”,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扩大国有经济控制空间。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一方面将许多已允许民营经济进入的行业驱逐出去,收归国有;另一方面扩大占有领域,央企仅在房地产业就占到60%的份额,许多“地王”出自央企。国资委提出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是掩人耳目,因为其剩余的16家在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净利润等方面均占85%以上,但它们仍然保留在房地产业(见《中国流通经济》杂志2010年第5期,第29页)。目前出现“国进民退”,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是又提出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一提法大大超出十五届四中全会的“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的《决定》,为垄断企业改革设置障碍。央企均属于国民经济命脉,这样如同为央企修建了一个堡垒,一方面把这些垄断企业保护起来,不要改革,还要“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关闭了民营企业进入这些垄断行业的大门。现在已经不是“玻璃门”、“弹簧门”,而是堡垒的铁大门。维持国家安全是否都需要国家垄断?

三是改变国有经济任务。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国有经济的任务,是为社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国资委改为“保值增值”,迫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国企为了实现“保值增值”,就放弃社会责任,追求利润最大化,背上奸商之名。

以上所谈这些问题,表明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维持现状?继续改革开放是化解矛盾,是前进;维持现状是积累矛盾,是停止甚至倒退。目前正逢振兴中华的有利时机,千万不要辜负人民的重托,背离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贻误中华民族崛起的良好机遇,再一次造成历史遗憾。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要有观念上的转变,应当重新认识斯大林,重新认识“科学社会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其次,整个改革应有总体规划,逐项提出目标要求、限定时间,有部门承诺、专人负责,一项一项落实;最后,改革方案要公布,由人民公议、监督和验收。这就为探索社会主义实践扫除障碍,推进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朱厚泽的到任和离职

● 李炳华

1985年夏,朱厚泽同志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调来北京,接替邓力群同志任中宣部部长。当时中宣部的办公地点在和平门路口西南侧的一栋塔楼里,与中国邮票总公司为邻。机关大门东向临街,入门只有很小的院子,停不了几辆车,局促狭小,各局室的办公用房都不宽裕,是中央机关几个部门中办公条件最差的。

那时我是中宣部普通工作人员。1985年7月24日(星期三)上午8点半全局开会,传达周一上午部里吹风会的部分内容。其中提到,中央政治局最近开了会,专门研究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决定部分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按照干部“四化”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原则,对三个委员会成员都有所调整,补充一些年轻的同志。政治局认为,十二大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成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永远保持活力,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新老交替,立一个好的规矩,从中央开始做榜样,以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能够长治久安。为此,政治局决定,由乔石同志接替陈丕显同志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由尉健行同志接替乔石同志任中组部部长,由朱厚泽同志接替邓力群同志任中宣部部长。会议还确定,由胡启立同志任党代会筹委会秘书长,乔石、田纪云、王兆国、周克玉同志任副秘书长。

朱厚泽的到任

1985年8月19日,朱厚泽同志和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的王大明同志来中宣部履新,陪同他们来报到的有乔石、邓立群、尉健行同志。当天参加会议的范围不大,只有各局正副局长,我们普通干部是第二天在各局听传达了解具体情况的。

在新部长见面会上,中组部部长尉健行首先

介绍了朱厚泽的情况:1931年出生,贵州人,汉族,1949年3月入党,1950年5月参加工作,1949年考入贵州师范学院,大学一年。1950年至1953年,任贵阳团市委书记、书记;1953年至1963年,任贵阳市烟草公司经理、市化工局长、市经委副主任;1963年至1965年,任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65年“四清”时受到错误处理,“文革”中受批判、冲击。1973年至1978年,回到贵阳市等待分配工作。1978年8月,得到平反。1978年至1982年,任贵阳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一年。1983年1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分管省委常务工作和理论工作。1985年3月,任贵州省委书记。

接着,乔石同志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对朱厚泽和王大明两位同志,我都不大熟悉。按照中央选人的标准,决定朱厚泽任中宣部部长,是比较合适的。宣传部是中央重视的部门,主管理论宣传战线,任务很重要,党中央寄予很大责任和希望。朱厚泽和王大明两位同志到任后,要调动全部同志的积极性,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做好工作。中央确定,今后胡乔木、邓力群仍分管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他们会经常过问、指导朱厚泽同志和宣传部的工作。

邓力群同志随后也讲了话。他说,中央关于领导班子调整,有明确的方针,是为了保证中央领导和政策的持续性,需要新老交替,原则上过了年龄界限的都要下来。同时,把符合“四化”标准的同志选拔上来。这项工作,一年多来已很有成绩。中宣部原任正副部长、顾问,年龄都已过线,最年轻的贺敬之也已61岁。大家一致同意,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和重大步骤。我也很高兴,自愿退下来。今年我到四川、贵州前,曾向中央反映,提出我们的意见,希望中央从中青年中选拔

既做过实际工作，又有理论基础和兴趣的同志。到7月8日，得到正式通知，经各方面征求意见，中央人事安排小组向中央提出两个同志。大家认为，朱厚泽、王大明两位同志是合适的，一致同意他们到中宣部任职。他们好的条件不只是年龄，还有政策理论水平。朱厚泽在“四清”时受到错误处理，到平反前，这一段包括等待分配，长达16年，是很大的坎坷。朱厚泽利用这一段时间读了不少书，既有社会科学又有自然科学。他在错误处理前做实际工作，处理后没有消极，而是认真读书，并且读进去了，这是很难



朱厚泽

得的。这对于他今后的工作，对他做宣传部的工作，是很好的准备。我看过他写的文章，其中两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了，有一篇是讲新老交替中的问题，作为中青年干部应如何正确对待，说最主要的是加强工作实践、理论修养、文化知识，使自己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很值得赞赏的观点，同我们党的性质、选拔干部的要求，是完全合拍的、一致的。说起来，这好像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目前党内党外有多少人注意，写出这样的文章，这一点作为宣传部长尤其重要。王大明同志我接触不多，听过一些同志介绍，他对北京市委宣传部的的工作、如何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这一段北京市的宣传工有有明显的进步。这两位同志到新的岗位上工作，合乎我们事业的要求，我个人完全赞成、拥护。

今后的宣传工作，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这一段特别关心宣传工作，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今后就按这些指示开展工作。小平同志说，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要坚持这个方针。在这同时，过去讲两手，一手是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另一手对严重犯罪分子要打击，今后还要坚决打击。最近他又说，还要加第三手，进行经常性的思想工作。主要内容，书记处多次讨论，就是邓小平讲的“四有”，最重要的是理想和纪律。今后要结合各条战线的

实际情况，看如何把中央提出的要求，分别解决，加以执行。我们的方针有了，干部也有了，毛主席讲领导就是出主意、用人才，这两条具备了，加上宣传部原有的同志，共同合作，互相帮助，同心同德，把中央的方针和任务一个个加以贯彻实施。

中宣部经过一年多整党，不是没有问题，但总的讲，我当部长这3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团结问题不是尽善尽美了，工作也不是没有缺点，但在照顾大局的问题上，从上到下，绝大多数同志是顾大局的。希望今后做得好上加好。过去的问题，有那么一点疼

疼，不要影响今后的工作，不要使朱厚泽同志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为难，有问题找我来谈。朱厚泽同志作风平易近人，能平等地商量问题，大家可以信任。

时年54岁的朱厚泽最后作了表态性的讲话。他说，刚才乔石、尉健行、邓力群同志讲的，关于我个人的部分，是对我的鞭策、希望。我们党确实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前进中不可能不经历曲折，个人的坎坷与之相比算不得什么，只有奋力向前，以弥补流失的光阴。尉健行同志介绍我的简历，确切地说，我的文化水平只是高中，大学进去了，但没有念完。其他方面的知识更差，看了些书，也是支离破碎，零敲碎打。我长期做基层工作，书记处找我谈话时，我心里很不平静，真的感觉诚惶诚恐。十年内乱，把许多老同志的时间耽误了、丢掉了，也使青年同志的成长受到影响。我们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挑出来担负过渡工作的。我实际上已经是老头了，耀邦同志说年富力强，那应该是40多岁的同志。可许多老同志在“文革”中耽误了，年轻同志也受到影响。现在让我们做这个工作，对我们是信任，也是检验。按我自己的条件来讲，是不适应的。但党作了决定，我们不能开小差，只有用鞠躬尽瘁来勉励自己。

朱厚泽说，对今后的宣传工作，中央领导同志都有明确指示，对我们是大好事，为我们做好

工作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我们只有尽量努力,在书记处的领导下,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掌握中央的方针,认真贯彻执行。工作中错误可能难免,但要避免犯大错误,而且有了小错及时改,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完整准确地传达出来,把群众中发现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上去。

朱厚泽说,我最近看到李先念同志一个批示,新华社记者随云南报告团到各地作报告,所到之处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余秋里同志说,这是最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最有纪律的人讲纪律,所以受欢迎。新华社记者建议,应该让这个报告团到全国都去讲。希望我们能在这件事落实好。由此可见,中央的同志不仅在大的方面考虑,在具体问题上也有很多指示。我们要把宣传战线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不偏离中央的方针,积极贯彻中央的方针。我作为宣传战线的一个新兵,虚心向同志们请教,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出现问题也请同志们及时批评指正。

朱厚泽在正式接任的第一天,就从一件具体事务上,开始考虑、研究、落实思想宣传战线的工作了。这件事的由头是,1985年8月14日,12个新华社记者给胡耀邦同志并党中央写信,建议组织云南前线英雄报告团到全国巡回演讲。新华社将此件分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赵紫阳、余秋里、习仲勋、胡启立、邓力群等同志。8月15日,李先念批示:“此件很好,请耀邦同志阅酌。”胡耀邦于8月17日批示:“将先念同志批的此件转启立同志阅后转朱厚泽、王大明同志并中宣部同志考虑办。组织先进人物到群众中去演讲,对人民进行教育,除前线英雄外,也还有别的一些先进人物。问题是要我们有计划地当做一件大事来抓。请中宣部负责落实。”

但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主持全国宣传工作的朱厚泽部长,却未见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热闹,而是谨言慎行,低调不张扬。他在部内分别与各局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在宣传思想战线与各口各单位人员广泛接触,直至1986年春季,开始提出“宽容”,继而提出“宽厚”和“宽松”,即对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宽厚一点的态度,争取使整个社会政治空气、思想文化环境搞得更宽松、有弹性一点。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有启发性、开创性、变革性的新

方针,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三宽”部长。而他多年后也坦承,这是他在中宣部不长时间的工作中,提出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主张。

朱厚泽的离职

政治变幻,世事无常。改变人生命运和历史轨迹的很多社会变动,常常是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降临的。从1986年10月下旬开始,在全国10个省市16所高校发生学潮苗头,学生从对伙食水平低、校内治安差等问题的不满,贴出大小字报,发展到提出政治性诉求,要求自下而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掀起第二次“五四运动”。终于在12月8日,安徽工业大学上千学生上街游行,以后迅速蔓延到上海、广州、杭州、南京、北京,形成全国性学潮,并最终引发了导致胡耀邦辞职的大政潮。在这场剧烈的政治动荡中,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个被公开点名批判后被开除出党的人,受牵累最重的,就是朱厚泽了。

朱厚泽是1987年1月28日被正式宣布免去中宣部部长职务的。此前的1月20日下午,中宣部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事前专门通知由朱厚泽部长主持大会。那次会上,由王大明传达了中央二号、三号文件及政治局生活会的有关情况。朱厚泽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全部的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中央的文件、公报及讲话,按照中央的部署,努力做好思想文化战线各方面的工作。在着重抓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同时,对过去一段时间部里和思想战线的工作,对我本人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帮助我回顾、检查、反思。他在会上宣布,部里的日常工作由王大明主持,他将集中精力,清理一年来部里发出的文件和他的讲话。朱厚泽还宣布,书记处会议决定,宣传文化工作由邓力群分管。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自己的感受:“下午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由朱厚泽同志主持,朱部长似乎是板上钉钉的耀邦那条线上的人,实际上已经被晾了。因为事先通知是他主持会议,所以到会者极踊跃,放映厅几乎坐不下,我就从来不知道部里有这么多人。不过会议实在让人失望,朱厚泽只在开始讲了几句话,然后是王大明

传达中央二号、三号文件。最后厚泽宣布，部里日常工作由王大明主持，他集中精力清理一下过去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重点是中宣部所发文件和他的讲话。这无异于正式宣布靠边站、等候处理了。”

处理很快就来了。1月28日上午，中宣部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的王兆国，与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一起到会，王兆国宣读中央1987年18号文件，由王忍之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免去中宣部部长职务，改任书记处农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接着，朱厚泽作了极简短的表态性讲话。他说，我来中宣部工作一年半时间。来的时候，我就提出自己不适合这项工作，但按照中央的决定来了。现在仍按照中央的决定，接受新的任命。来的时候违背本人意愿，但服从组织决定，走的时候服从组织决定，也符合本人的意愿。

朱厚泽说，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完成在这里的工作。我做得好的，有你们的功劳；做得不好的，由我一个人负责。我相信，在历史面前，任何人的功过是非，都将得到历史的鉴定。在我工作期间有什么问题、毛病，欢迎大家提出来。此时他站起来，面向挤满放映厅的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朱厚泽的离职感言，短到无可再短，但算得上不卑不亢、不愠不火了。大家对他的讲话和鞠躬，报以热烈的鼓掌。

接着，新任部长王忍之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中央让我到中宣部工作，我本心是不愿意的，因为我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与这个职务不相称。但组织作了决定，我只能服从。在中央领导下，依靠各级组织和在座同志们的支持，大家一起努力工作，如果不只是在口头上，实际上也这样做的话，相信我们可以完成本职任务的。来中宣部之前，赵紫阳同志找我谈过话，只提出两条，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们今后的工作，无论是团结大多数，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王忍之的讲话，也获得在场同志的掌声。

在会上作压轴讲话的，仍然是主管宣传工作的邓力群。他说，一年半以前，我也在这里参加了

类似的交接工作的会，当时是我把中宣部的工作交给朱厚泽同志。今天王兆国同志来宣布，朱厚泽不再担任此职务，由王忍之同志担任，又一次交接。上次我讲了一段话，今天还要再讲一点。中央的通知是正式任命，但今天有个不同，即朱厚泽同志的工作，一年半以来，是不适应的。他来的时候本人就有意见，但经过胡启立、乔石同志的说服，他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一年多来，他并不适应，所以需要改变工作。同时我要说明，朱厚泽同志的工作确有失误，并不只是不适应。当然朱厚泽的失误他本人有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胡耀邦同志。胡启立同志讲了，他也有一定责任。在党中央的生活会上，启立同志作了很诚实的检查，我觉得是好的。由于这些原因，朱厚泽到农村发展中心工作更适合。在作这个决定之前，我奉中央委托，找朱厚泽谈了话，他提出要有一段时间清理自己的思想，中央接受他的意见，要求他先报到，然后就请假，时间长短自己决定。朱厚泽要求在清理思想时，中宣部把他讲的整理成文的东西交给他，作为清理思想的材料，我觉得应该充分满足他的要求。除此以外，一年半来，同志们如果有意见，最好采取书面方式反映给他，前提是事实要有依据，不要上纲上线，如实反映意见。这些意见先交机关党委，看看是否符合事实，如果不符合事实就不要送了。如果朱厚泽愿意找同志们谈谈心，交换意见，也可以，但不要开大会小会的揭发批判，这不是现在中央处理问题的方法，但这并不妨碍同志们提意见。

邓力群说，上次我讲到，议论提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时，我看过他写的两篇文章，一篇写得很好，是讲从中青年中选拔干部，作为中青年干部，应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这方面他讲了许多意见，这是个好文章。这次他的工作有点失误，是妨碍还是有利于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呢？毛主席讲过，犯了错误，只要认识得当，可以转变为全党的宝贵财富。恩格斯也讲过，在错误中也可以认识真理。如果采取相反的态度，消极、悲观，有埋怨情绪，把责任推给别人，这就不利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希望他是前一种情况，在清理思想以后，重新看看他那篇文章，这是我诚挚的希望。

邓力群话锋一转，明显加重了语气说，功过

是非,历史自然会鉴定,但自己不能等待,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所谓环境的影响,大家都碰到过这种情况,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自己就不需要探讨了吗?不应只等待历史评价而无须思索、无须探讨、无须研究、无须前进了,应该积极地做好自身的工作。不远说了,现在是大是大非时期,耀邦同志已经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会议上大家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为总书记,是不是这个问题也要等待历史去评价,耀邦辞去总书记,也是历史检验的结果嘛。对不起,朱厚泽同志说了前边那几句话,所以我要说这几句话,听起来可能不大顺耳,但我愿意说出来,供朱厚泽同志下一段清理思想时参考。

在大庭广众之中,面对如此直接和严厉的批评,朱厚泽不尴不尬,不恼不羞,面不改色,安坐如常。

邓力群最后说,我同王忍之认识很长时间,工作中联系也很多,他发表过同周谷城商榷的文章,此文在“文革”前,在哲学界有过很好的影响,当然他是在胡绳同志领导下,文章也征求过胡绳同志的意见。“文革”前我们也合作写过文章,“文革”中也间接听到他的情况,他是“财贸一小撮”,

挨整挨了十几年。但他没有乱说,也没有被压倒,整个表现是好的。后来他参加了计委的工作,撰写文件等,长达8年时间,没有搞过邪门歪道。到《红旗》杂志工作,是别人提名的,开始计委不放,后来才勉强同意放他。到《红旗》后,同熊复同志合作,在“两个凡是”问题上,他不是主唱,是合唱、伴唱,犯了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严格按照中央政策办事,工作中比较谨慎,在所有报刊中,《红旗》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好的刊物。当然《红旗》也发表过有缺点的文章,但宣扬自由化的文章从来没有发表过。王忍之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所以中央推选他上来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只要多听群众的意见,是可以完成自己工作任务的。中宣部目前特别需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里夫同志说中宣部不是铁板一块,要按照中央一、二、三号文件精神,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不管怎么样,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不允许违反纪律,发表错误言论。

邓力群同志的讲话,也获得了与朱厚泽讲话同样热烈的掌声。

(作者系北京资深报人、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 李 晨)



SIEMENS SW 声望听力
好听力 · 好生活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聋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层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9080150号

大跃进前后的煤炭工业

● 徐达本 口述 徐平平 蒋燕燕 整理

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从1946年(时任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央局经济部工矿局局长,兼任峰峰煤矿董事长、不公开的党委书记)开始与煤炭工业结缘。

燃料工业部于建国时成立,陈郁同志任部长。1952年底,我任副部长。不久,赶上了计划、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希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打好基础。党中央要求“一五”计划结束时的全国煤产量应比五年前增长70%。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一五”计划,分管煤炭口的陈郁部长和我带领各级领导干部,与技术人员及工人们一道,对各个矿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每一口矿井的出煤量、增产潜力进行了调查。随后,我们对所得信息进行了反复的分析、研究,拟定了煤炭工业的“一五”计划,受到了中央的褒奖。

大家认为,发展煤炭工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1. 继续恢复、改建旧矿井 2. 对生产井进行技术改革 3. 积极为建立新矿井创造条件。另外,我们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的一贯方针,确保“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

1955年,煤炭部成立,陈郁任部长、党组书记,我任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7年,我们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所规定的生产和建设任务,并在科研、教育、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好成绩。

1957年夏,陈郁部长和我组织有关人员写出了有关“一五”工作的总结报告,其题目为《煤炭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建设中若干问题总结》(《总结》)。在《总结》中,部领导检查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并对其产生的根源、内因和外因作了详尽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里,我仅就其中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谈谈我的认识和意见。

1. 计划经济问题

尽管我们超额完成了煤产任务,但全国煤炭供应仍是紧张,影响了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了缓解煤炭供应的短缺,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以调动地方政府、农业、手工业合作社的积极性,千方百计增产煤炭。

《总结》认为,煤炭供应短缺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煤炭部在做生产计划时没有打出足够的提前量;二是国家对各工业口的投资计划失调。另外,我认为,国务院的《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炭供应困难问题。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去开小煤窑,已经很有些“大跃



徐达本(前左一)、陈郁(前左二)陪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等接见全国煤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

进”的味道了。

2. 新建矿井的井型问题

此问题系指建井规模大小和技术装备的高低。我们认为,煤炭部应多建一些具有先进技术装备的大型矿井。这类井具有近、远两期的优势,即近期能确保安全生产,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产效率,远期则出煤潜力持久、丰厚,故投资相对不高。我们不主张大力兴建中、小型矿井,持以上意见者,被称为“大洋群”。部里另一些领导(“小土群”)则认为,目前国家底子薄,上面要求快出煤,我们应因陋就简,大兴小煤窑。在部党委会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吵得不可开交。此时,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写了个条子说他支持“小土群”,不支持“大洋群”。面对这个压力,我仍坚持原有意见。

即便如此,部党委服从了国家以中、小型为主,大、中、小三结合的方针。在“一五”计划的五年中,在部直属开建的115处矿井中,大、中、小型井的比例为11%、23%、66%,而产煤能力分别为28%、33%、39%。可见,小型井的修建占绝对优势,但其产煤能力远不如大型井。

“二五”计划与“大跃进”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做了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陈郁部长也代表部党组,汇报了我们实施“一五”计划的情况,并阐述了将如何在“二五”期间解决煤炭供不应求和机械制造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周密计算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对煤炭的需求量,并决定积极发展地方煤炭工业。同时,我们将大力投资煤炭机械制造业,为矿山提供更多的先进设备,增加安全和劳动保护设施,以提高生产和现代化水平。

不久,陈郁部长赴广东省任职。张霖之任煤炭部部长。

根据“八大”精神和煤炭工业的实际情况,于1957年8月,煤炭部推出了《煤炭工业“二五”计划草案》。我们将1962年的煤产量定为2.34亿吨,比“八大”建议值约高12%。但是,这个草案还没来得及提交人代会审议,“大跃进”就开始了。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我们重新制定一个“跃进”式的“二五”计划。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提出,15年后,中国的钢产量要赶上、超过英国。12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誓言。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随之豪言,他可用10年和20年的时间超过英国和美国。此壮语受到毛的赞赏,并激发各部门抛出“跃进”指标。为了达标,举国大炼钢铁,想在超英、赶美的运动中,打一个短、平、快的漂亮仗。

1958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周恩来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清除了发动“大跃进”的障碍。接着,毛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反冒进”。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为全面发动“大跃进”做好了准备。

以上文件也发到了煤炭部。为了贯彻两会精神,张霖之部长于3月25日主持召开了全国煤炭工业四级干部会议,力求做好开展“大跃进”的思想准备。部党委号召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群众运动的方式,批判部内存在的保守主义。会议领导小组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揭深批透”,对基层领导进行了反复动员,以至各单位先后贴出了近3000张大字报。他们大批陈郁部长、我和其他领导在制定“一五”计划和完成生产任务上的保守思想。我们还被指责为反“冒进”,只讲可能,不讲需要,强调稳妥可靠,压制了生产,导致了煤炭供不应求的局面。于是,“一五”《总结》被说成是“右倾保守主义”的产物。

会议还批判了我们表现在井型、服务年限、机械化标准、生产福利、工作日制度等方面的教条主义错误。并指责我们照搬外国经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煤炭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加大了投资,造成了浪费。

最令我费解的是,会议指责“安全第一”也是教条,并认为如果继续执行现有的保安规程、监督和管理制度,就不可能有“大跃进”。一些领导认为,煤矿生产是与地球作战,和打仗一样,死人是不可避免的。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原煤来自于工人們的地下作业。他们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因此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目前执行的保安规程,是多年来生产实践的总结,也是



1958年9月,徐达本(中)陪同周总理视察赵各庄煤矿

许多矿工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只有执行这些安全措施,才能保证煤炭的健康生产,两者缺一不可。”

正是在这个会议上,部领导提出中国煤炭工业要“5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并规划了“二五”、“三五”、“四五”的煤产量分别为3.3亿至3.6亿吨(此数值比原定“二五”指标增加了41%~54%)、6亿吨和9亿吨。到了5月份,这些指标又显得太保守,又被成倍、成几倍地刷新。

正如《煤炭工业二十八年史稿》所述:“这次会议否定了在执行‘一五’计划经验中总结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正确指导方针,提出脱离实际的生产指标,下达了‘大跃进’的进军号。”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党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了“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为了确保实现冶金部“超英赶美”的誓言,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土法上马。全国各地建起了炼钢的小、土高炉,家家的饭锅、门门都成了大炼钢铁的原料。

炼钢需要煤。为了适应“跃进”局势,煤炭部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例如:

1. 推广水力采煤(水采)以提高煤产。与传统

技术相比,水采的优点是成本低、流程简单、效率高、事故少,等等。但其先决条件是,矿井周围一定要有充足的水源。缺乏水源是此技术在他国发展缓慢的原因。

1956年,煤炭部在开滦林西矿和萍乡高坑矿对水采技术的应用进行了工业性试验。次年又在开滦唐家庄矿进行了扩大试验,效果不错。但由于水采对水力的要求甚高,我对它的应用价值仍持怀疑态度。如果水采矿的水源出现走低或枯竭,我们投资的回报将化为乌有。

然而,部领导对水采技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代表部党组(我和刘向三坚决反对)向中央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发展水利采煤的报告》(《水采报告》)的文件,提出在“二五”期间,煤炭部欲将60%左右的现有矿井,改建成水力采煤、水力运输,而50%至60%的新建井为水采井。

1958年7月,煤炭部在开滦矿区主持召开煤炭工业技术革命“跃进”大会。在会上正式公布了《水采报告》,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国家技术委员会(技委)正、副主任韩光、张有萱在会议的最后两天赶来,井下井参观了水力采煤。一个星期后,技委党组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水力采煤的报告》,认为水采是个好方向。8月16日,中共中央对煤炭部、技委党组的报告做出批示:“水力采煤是煤炭部今年以后所掌握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执行多快好省的先进技术,凡是有条件推行的煤矿企业都可推行。”遗憾的是,部领导舍去了“有条件”这个前提,牢记了“都可推行”这四个字,为在全国煤矿推广水采定了调儿。

同年9月1日,煤炭部将刘少奇、周恩来请到开滦,向他们展示水采的优越性。我先陪同周总理视察了赵各庄矿,随后又与其他部领导陪同刘主席下了唐家庄水采矿。部领导向两位国家领导人介绍了水采的优点,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从此,水采技术在煤炭系统大张旗鼓地推广开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刘向三仍然坚持我们对水采的意见,质疑普及这一技术的可行性。但我们的声音被淹没在为“创高产”而击鼓鸣锣的喧嚣中。

在唐山大会后的二三个月内,煤炭部完成了137个水采矿井的设计工作。但很快,这个技术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例如,井下煤、泥、水泛滥,运

输通道淤塞,煤层面回采率低等。于是,部分水采井被定为“不能正常生产”。就连“生产较正常”的唐家庄井,在3个月内就损坏了大量的水采设备。冬季时,提升到地面的煤炭在煤车中冻结而不得卸车等问题层出不穷。从事水采的职工们对这种不顾条件,盲目推行水采工艺的做法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在全煤系统普及这一工艺的愿望触了礁。

此时,是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失误原因的时候了。但部领导于1958年11月又发出了《关于发展水力采煤的指示》,重申水采是煤炭工业技术革命的核心,坚决批评为难、消极、动摇情绪,进一步大力宣传水采之优越性,使情况进一步恶化。1959年,水采的年产量仅为1000万吨,仅是预定指标的20%。

盲目推广水采的后果不堪设想。唐山会议后突击设计、制造的大部分水采设备不能使用。由于大批旱采井被改为水采井,但因采煤系统不配套,不少矿井在投产后不久就被迫停产了。而很多新建水采矿则因缺水而不得不“水改旱”,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

2.“小土群”疯起以提高煤产。前面我已提到,在“一五”期间,部里就有人力主大办小煤窑,但遭到陈郁部长和我的坚决反对,以致未得全面实施。如今,正值“大跃进”高潮,为了保驾冶金部实现其天文数字的钢产指标,部领导决定支持大办小煤窑的建议,展开了“小土群”运动。其宗旨是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应分散的炼钢小高炉,力图做到“哪有千吨钢,哪就有万吨煤”。在煤炭部的号召和协助下,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带领群众“勘探队”上山找煤矿,一旦发现煤源,马上就地开采。其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就连在校生和老人们也扛起了镢头,随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去挖煤。一时间,10万多个小煤窑星罗棋布于全国。它们都是仓促上马的独眼井,既无安全设施又无专业设备,用的是明火照明,自然通风,出煤全靠那些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农民工,伤亡事故极其严重。

1959年,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降温。公社劳力的回调,使很多小煤窑被迫停工。而一些“不过夏”的独眼井在雨季被山洪吞没。还有的因其地处荒山野岭,煤运不出去,也都荒废了。这场大兴小煤窑的群众运动,不仅浪费了人力和财力,还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矿产资源。面对这个残局,煤炭部

曾提出对小煤窑进行改造的动议,但此动议受制于接踵而至的三年困难时期。

3.大型煤矿大兴超产竞赛以提高煤产。在“苦战三五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中,部领导将煤炭的生产指标也定得越来越离谱了。为了增加产量,煤矿的高产竞赛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启动了。这个运动主要体现于加快采煤面的推进速度上。由于大型矿有良好的基建和机械化基础,大幅度的增产实现了。但这还不够。部领导号召各矿,一定要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精神,大胆进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以求产量的更大突破。很多矿务局为了达到大大超出原矿井设计能力的产值,大破技术操作规程和生产管理制度,破坏了原来有序、规范、行之有效的作业法,致使可采煤层面枯竭,煤产量急剧下降。

然而,这些都没有打乱部领导的工作常规。部领导每早一进办公室,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读各矿报上来的生产报表。对没有达到预定指标的厂矿领导,轻者,狠狠地批评,重者,撤职。当时,煤炭部借用了农口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谁也不能怀疑高产指标是否可以落实,谁认为达标有困难,谁就是“右倾保守主义”。一时间,科室关门,干部与工人们一道下井,加班、加点突击生产。此外,为了“解除对生产的束缚”,煤炭部还取消了总工程师监督等制度。在无人过问安全的情况下,矿井事故剧增,生产陷入了极端的混乱。

1959年,我去抚顺煤矿视察。与我同行的有秘书李子文、工程师吴百川。我们看到那里的工人只是在原地采煤而不掘进(掘进是矿山在地下打隧道的技术术语。在煤矿分为煤巷掘进和岩石掘进,起到运输和安装传送带运煤的作用,此处强调的掘进指岩石掘进),把巷道两边都掏空了。我马上与负责生产的领班人说:“这种生产方式,不是倒退了十年吗?这不仅会导致塌方危及工人的生命,而且在没有充分挖掘原煤之前,这口井就得报废了,这不是巨大的浪费吗?”领班人回答说:“我们这是没有办法呀,就地采煤就是为了快嘛,就这样还完不成上面交待的任务呢!”

随后,为了与辽宁省委磋商工作,我们又去了沈阳。刚住下来的当夜,北京来电说,部里要召开临时计划会议,李富春、薄一波都要到会,要我立

即返京。我们连夜起程往回赶，一下火车就直奔会场。

在会上，由于各矿务局报上来的生产计划指标比部里定的低太多，部领导把这个情况向主管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薄一波作了汇报。薄表示做计划应实事求是。尽管煤炭部调低了原定指标，但仍比下面报上来的高不少。为此，部领导只好与主管长远计划的计委主任李富春商量，寻求解决办法。李提出，只要是国家需要，煤炭部就一定得想尽办法达标。对这个不切实际的要求，我是不同意的。开会时，我把在抚顺煤矿视察时的所见所闻摆了出来，为的是想向领导们讲明，如将生产指标定得过高，既不现实，又很危险。但我提出的问题与当时的形势形成了巨大反差。我的调子太低、太保守，因此未受到重视。于是，在这个计划会议上，领导们为今后全国的煤产定下了高不可攀的指标。

尽管我所提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我并没放弃自己的意见。此时，一些部、局领导表态同意和支持我的意见，于是部党委内出现了矛盾和分歧。

我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正当部党委内部分歧突起之时，毛泽东在党内发动了又一个政治运动，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1959年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原定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毛在概括国内形势时说：“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还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应该改正。他提出了涉及各个领域的18个问题，要大家分组座谈讨论，纠正高举“三面红旗”所犯的错误。

7月14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产生原因，并提出纠正错误的具体建议。但彭的诚意被毛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在向党进攻”，随即展开了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7月31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揭开了在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运动的序幕。在这个运动中，一大批勇于说真话、力保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领导干部受到了惩处，我是其中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我被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点了名。他说，煤炭部有个叫徐达本的，竟然批评我们号召煤矿的家属们对煤炭生产作贡献，是与“大跃进”唱反调。其实，辽宁省委的号召，是不顾家属安危的严重违章行为。

庐山会议一结束，部领导就下传了中央有关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随之，反“右倾”运动在煤炭部铺天盖地地展开了。我是首当其冲的“运动”对象。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挨整”。其原因是，在落实1959年度生产指标的讨论时，我极力主张降低生产指标，腾出力量抓生产的准备工作，改变采掘严重失调的局面，以保护各矿井的综合生产能力。我的“如不迅速解决现存问题，煤炭产量将急剧下滑”的警告被指责为不支持“总路线”，对“大跃进”持消极态度，盲目坚持安全第一、生产第二的“保守主义”。我被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煤炭部计划司司长丁丹则被正式带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主要是因为他给部党组写了一份有关各大煤矿生产状况的工作报告。他指出，部领导对老矿的面貌，及其生产能力的认识不清，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生产计划。鸡西、鹤岗、双鸭山三个矿务局在“大跃进”中已把老本吃光，所以不可能完成目前所定的煤产指标。他明确支持我的观点，以为“煤矿生产并不需费什么力气，生产准备工作无关紧要”的意见是错误的。可惜，这些中肯的意见都被认为是无限夸大一些微不足道的缺点，是歪曲事实，是反对“大跃进”。

刘向三也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边缘人物（刘向三《往事的回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版）。其主要表现为对水采有消极、动摇情绪，对我持支持态度等。另外，因我而被株连的，还有东北煤矿管理局副局长、东北抚顺矿务局局长、副局长以及矿长等。他们“被整”的原因，是与我一起反对辽宁省委“老婆、孩子一起进矿”的号召、反对不掘进、设备失修等违反生产规程的做法。他们因犯了“右倾”错误而受到撤职处分。

刘向三的秘书高德贵被整得最苦。这只是因

为他说了一句大实话：“煤炭部表面上满面红光，实际上患了三期肺病。”其实，“大跃进”这个违背客观生产规律的运动，把我们在“一五”计划时期为我国煤炭工业打下的底子，全都给折腾光了！

在大会、小会批判我的同时，我还被停职，勒令在家写检查。同年，刘少奇批准了部党委对我的处分意见：降职使用。我从主管全国煤炭生产的第一副部长，降至管理财务的最末一位副部长，并免去了我的部党组副书记的职务；我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也被取消。

“停职反省”时的所见所闻

在停职写检查、受批判之余，我能做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是到下面走走，作点儿调查研究。李子文、吴百川与我同行。

我们的第一站是河南平顶山煤矿。在井面上，我们见到工人们正敲锣打鼓地庆祝“又一次突破了产值大关”，真是好不热闹。到井下一看，吓了一跳：到处乱得一塌糊涂。我问采矿区长：“你们不搞掘进，不怕出事吗？”区长回答说：“不行啊！上面下来的压力太大啦！我们没有办法啊！上面说了：‘你们必须完成任务，否则拿着检讨来北京！’”我说：“你们无论如何要掘进，否则矿井就得报废了！”但回答我的，只是无奈的摇头。

我们的第二站是焦作煤矿，其混乱程度比前一座矿更甚。峰峰煤矿是第三站。去之前那里传来坏消息，煤矿被水淹了。当我们赶到时，所见到的还是一片混乱。面对到处生产杂乱无章的状况，我这个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深感无能为力。

1960年5月9日，一起震惊历史的矿难——山西老白洞事件发生了。自“跃进”以来，此矿的煤产猛增到150余万吨，远远超出所能承受的水平（90万吨）！堆积如山的原煤滞留井下，煤尘飞扬。也许是一个小小的火花引爆了煤尘，顿时熊熊的大火从数个井口喷出，将900多名矿工和干部困于地下。

这个事件直到40多年后才被曝光。据统计，在此事件中遇难的人数为684人，但有人说，真实的死亡人数为800多。

当时，为了调查事发原因，中央组织了一个由公安部长、劳动部长、总工会主席和煤炭部长组成

的调查小组。一场“反事故、抓敌人”的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很多无辜的人被卷了进去：709人被批斗，398名干部被撤换，462个“不纯分子”被调离。原该矿总工程师周子义被指控为引发事故的“嫌疑犯”而被逮捕入狱。30年后我见到他时，他向我讲述了“老白洞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和他本人是如何被冤枉的。

“左倾”错误与七千人大会

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回报”是席卷全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工农业的大倒退。当时，除了原煤、石油、电力部门之外，钢铁、水泥、棉花、粮食等重要工农业品的产量，都远远低于周总理签署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的预定值。党中央意识到，如果再不刹住“浮夸风”，其后果不堪设想。

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我也是与会者）。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向我们作了报告，检查了在过去五年里所犯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也发了言，表示愿意为错误承担责任。此外，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也在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参会人员对中央领导们基本上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而感到鼓舞。

令我欣慰的是，中央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绝大多数敢于谏言的同志们进行了甄别平反。我也是被平反人群中的一员，官复原职。部内其他因“右倾”而受到处分的同志，也得到甄别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

我原以为，中国工农业的建设将步入一个“拨乱反正”的新纪元。1964年我调离了煤炭部。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之后，我又转到煤炭部，始终关注煤炭事业的发展。近几年，煤矿事故频发，我听到这些消息很痛心，但我已经90多岁，全然无能为力了。不知那些主管安全、主管煤矿的人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做的。

（徐达本曾任煤炭部副部长、八机部副部长，于煤炭部离休。徐平平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副教授。蒋燕燕为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退休工程师）

（责任编辑 李晨）

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

• 王启星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56年,对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之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跌宕起伏,发展轨迹之诡异,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当时国内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形势:让美国这一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第一次没能赢得战争胜利的抗美援朝,已经结束;镇压反革命、高饶事件、反胡风集团等运动,也都过去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新年伊始,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私营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喜报。4月份毛主席发表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论十大关系》。5月份,陆定一同志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发表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进一步使人心情舒畅、思想活跃。9月份中共召开的八大宣布,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了,毛主席也称“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这是人们心目中越来越宽松的一年,谁也没有料到即将到来的“反右”风暴。

而国际上此时已是彤云密布,浊浪排空。在3月份苏共召开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诸多错误甚至罪行,震惊全世界。10月份,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相继爆发,苏军坦克开上了布达佩斯街头“平息反革命暴乱”。局势一片混乱,苏共和中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尖锐的矛盾、爆发如此剧烈的冲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还行不行?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何处去?当其时也,世界上各种理论派别、政治力量吵作

一团,莫衷一是。据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同志回忆,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央书记处(在那年9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

就在匈牙利局势急转直下、日益恶化,反共舆论甚嚣尘上之时,1956年10月底,为了正确分析国际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毛主席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找一些同志交换意见。

当时的新华社国际部,可以说是国内唯一的国际“消息总汇”。除公开发稿外,他们办的《参考资料》一天要出3大本、十几万字,上午版32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24页(有时32页),而且一定在早上8点、中午1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林克解放后在新华社国际部历任编辑、参考消息选报组长,1954年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主要帮助毛主席挑选国际资料和学习英文。在毛泽东的指派下,林克到新华社后,找到时任国际部主任的家父王飞、副主任李慎之叔叔,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作为当时新华社国际报道的负责人,作为从莫斯科到华盛顿,从华沙到布达佩斯,从赫鲁晓夫到艾森豪威尔,从哥穆尔卡到陶里亚蒂,铺天盖地外电的“第一读者”,在夜以继日的冲击下,王飞等人也在苦苦地思考、探索:斯大林、苏联、东欧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其经验教训在哪里?中国共产党人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中国、国际共运乃至世界向何处去?

李慎之后来回忆:那时他们忧心忡忡,工作之余经常一起讨论,甚至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他们觉得,看来斯大林不行了,赫鲁晓夫更不行,“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7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

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成功的范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原载《百年潮》1997年第5期)

完全可以想见,当他们得知毛主席礼贤下士,要倾听他们意见建议时的兴奋心情。不料谏言上达天听后,风云突变,向党中央主席提的建议,很快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纲领”,二人从此运交华盖,命途多舛。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当年向毛主席进了什么言,主席又是如何回应的?

林克当年撰写的《王飞、李慎之同志同我的谈话》,揭开了谜底。“反右”中,林克应要求,向新华社机关党委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记录稿,记录稿被新华社机关党委编为“1957年第52期整风资料”,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以为批判王飞、李慎之的罪证,遂得以连同他二人在“反右”、“在文革”中写了无数遍的“检查”、“交待”、“请罪”等材料一起保存至今,使我们能够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大体还原历史真相。

限于篇幅,下面对林克的谈话记录稿略作摘录(括号中的文字为林克原注):

王飞同志首先发言: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若干根本问题极想向中央领导谈谈。

看来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上完全靠苏联不成,中国党应该自己研究和提出一些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

问题的实质:基本的意见是苏维埃社会式的民主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苏维埃式的民主基本未解决。

在苏维埃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党的专政,由党的专政变成少数人专制而少数人专制变成个人专政。

由中央一直到村干,管得太多太死,不准有活动余地。如此我们党的威信越高,就越危险,有人认为反我就反党,我即代表党。由于有绝对的权力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阶层,在这个阶层下边也形成了一个阶层,没有思想,没有独立思考,斯大林倒下了,别人就混乱了。

英、法、美政府倒台,就像换件衬衣一样,无论政府换不換,但整个社会是稳定的。而我们社



1957年新华社机关党委印发的林克撰写的《王飞、李慎之同志同我的谈话》影印件

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英明则没有问题,不英明,则解决时即要采取冲突的形式,而且不一定能解决得好。根本的问题即我们(指苏联)采取了集权专制主义。

如何解决:

1.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是民主的实质。我们的报纸上的自由是在小问题上,现在言论不是独立的。领导人物、领导机关的活动、领导机关的决策交给人民评判。这样人民确实有更大的选择能力辨别能力。

如果帝国主义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存在的情况下,还可以将情况公开,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不可以?应该可以发表不同政见的批评,但不能发表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言论。

2. 分权:

分权包括村干问题。党政要分开。削减某些部门的权力、某些组织的权力。不仅分权而且要削权,可以互相制约。

3. 选举:

我们认为中国现在的选举是间接的选举,甚至是中央的圈定。人民代表与其说是选举的,不

如说是任命的,我们不应把选举变成虚伪的形式主义,人民不是阿斗。

4. 保密问题:

有些东西要保密,但是保密的东西太多就是说告诉老百姓的东西太少,人民不知道领导人如何活动、如何决策,结果培养愚昧主义,不能增加人民的判断能力。

这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发生什么问题,从长远来说中国可能发生问题,但目前还没有问题。这是为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可以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跃进、复兴。

对斯大林的估价与看法:关于斯大林功过三七开的问题。完全同意对斯应作全面历史评价。但斯大林的功过是否值得三七开值得怀疑,如能分时期评价则更好。

个人崇拜问题:各国共产党理论上是相信人民创造历史的,但实际上,共产党对领导人、高级领导的依赖思想过于以往任何朝代,这是非常矛盾的。

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但是一个领袖威信高,可以引起不良的后果。毛主席聚集起来的威信要极其慎重防止被别人篡夺利用。

王飞同志谈完后,接着李慎之同志说:

为什么会发生波匈事件这样大的问题?

根本问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问题,无民主则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须同时解决。

我们完全同意阶级路线,民主只能给予人民而不给反动派。但实际上专政不只专反动派之政,而且专到人民。

我们认为中国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我们党几年来一部分已成为一种衰朽的现象,国家大事,如果不通过党的系统则意见不能提出来,一切都统起来。系统严密这是我们党的好处,缺点是不容易听到意见(最后这一句话是我的回忆——林克)。

这可以从资产阶级牵制平衡、司法独立中吸取一些东西。现在小民主不少大民主不够。

现在许多事不是由人民判断而是由自己判断,不能锻炼人民的判断力。社会需要足够的弹性,才能应付一切事变。中央限得太死,中央保

守,有一定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在报纸太少了,过去中小城市都有报纸,一张报纸(不管是否是官方报还是党八股)也可发扬正气。

希望毛主席为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解决一个健康民主的问题。毛主席有极大的威信,这是历史造成,而不是个人崇拜,但不希望他的威信无条件地传给其他人。不希望对其他人感到失望,只要有民主,领导人差一点问题也不大。

我们现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苏联的制度,缺乏弹性、应变和改革。但是在理论上现在就高瞻远瞩,在高级干部中现在就开始,走在苏联、波兰的前边是必要的。

要确立健康、民主、公正的全民舆论。

今天读来,这些意见依旧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掷地有声。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王飞、李慎之甚至林克的预料,“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不久之后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王、李。这个讲话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事实上,同许多后来发表的毛主席的文章一样,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这段讲话,已经与吴冷西、林克当年向王飞他们传达的版本,不大一样了。

有这样一个花絮:看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王飞明知故问,给时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当年向他们二人传达毛讲话的吴冷西打电话:怎么《毛泽东选集》里说的,与你当年传达的不一样了呢?吴也并不讳言:我们改了!

据王飞当年的检查交待,1956年11月,吴冷西传达了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一段批评了他们。主席讲话大意是:新华社有两个干部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大民主是解决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能小民主,小小民主。也许,对付官僚主义者,可搞点大民主。主席还说,他们所提意见的错误一是阶级观点不明

确，二是对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一点不明确。

因为工作忙，与林克谈话那天，王飞谈完后就先告退了，并没有听到李慎之的发言。得知主席批评他们要搞“大民主”，王飞一时摸不到头脑，赶忙去问李慎之。李也大呼冤枉，一再解释：他说的是我们在调资分房等小事上民主多，在国家大政方针等大事上民主少，并未主张什么“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

林克当时对毛主席的批判也感到突然。在吴冷西传达后的一两天，他又来找王飞说，他听了批评之后很紧张，担心是否是他传错了话。王飞即向他表示：“你不必担心，我相信你的记录是不会错的。”林克问王对主席的批评有何意见？王飞说：“完全同意主席的批评，还要好好消化消化。只是第一、我们并未主张搞大民主，第二、主席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还未完全想通。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可以说是手段，但作为斗争目标，如争取人民民主，似乎也可以说是目的。”对此，林克说，田家英也认为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同你们一样。

过了些时候，林克又来转述了毛主席关于民主是属于政治范畴，是上层，服务于基础等意见，批评了认为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之说。关于李慎之所提他未谈到要搞“大民主”之事，一贯善于替别人归纳总结的毛泽东一言九鼎：你们提的意见，实质上就是要搞大民主。

“竟敢怀疑、反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后来在历次运动中使王飞罪加一等，又多吃了不少苦头。

当年的王飞、李慎之希望毛主席在国际共运中“当仁不让”，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当然是毛愿意听的，然而他们针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错误开出的“药方”——改革政治体制（当然当时他们并未明确提出这一口号），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则与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培植、发展对他个人崇拜的思路南辕北辙。现在看来，王、李毕竟是一介书生，对毛太过天真了。不过，恐怕当时谁也未能料到，从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他俩、声称不能搞“大民主”开始，在与斯大林模式分道扬镳之后，为了“反修防修”，为了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竟走了一条从“反右派”、“反右

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专制、更加暴力的极“左”道路。不学斯大林，改当“马克思加秦始皇”了。

然而，后来觉得“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恰恰是毛泽东自己。1966年他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极力推行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要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当然，这个所谓的“大民主”，与王飞、李慎之提倡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自称“末代清凉山人”的李慎之，1946年11月才从重庆《新华日报》撤退到延安，到了清凉山上的新华社。他没有经过延安整风中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没有认识到毛主席批评的严重性，口无遮拦，不知厉害，整风开始后又在国际部公开“鸣放”。如此不长记性，当然难逃一劫，李慎之被划成“极右”，开除党籍，发配劳改农场。王飞曾在延安呆了10年，好歹见过一点“世面”：在与林克谈话之前，尽管李慎之不以为然，他还是坚持请示了社长吴冷西，在得到“作为个人意见，可以说嘛”的允许后，才放胆进言；毛泽东批评之后，他不再做浪漫主义的幻想，在鸣放中噤若寒蝉。即便如此，最后他还是因“系统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反右派中严重右倾，对右派分子李慎之有包庇行为”，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降职降级的处分，下放农村劳动。不过与李慎之相比，总算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了。

李慎之被划“右派”的过程，说来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当时具体负责“反右”工作的新华社机关党委负责人，曾三次将李慎之的“右派”问题提交社编委会讨论，前两次都没有通过，于是便去请示国家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不仅立即认定李为右派，还批评了吴冷西的“温情主义”。有了“尚方宝剑”，编委会第三次讨论时，无人发表不同意见了。身为编委的王飞既认为李不应是“右派”，又觉得“参加革命以来，在敌我问题上与党发生不同意见还是第一次”，在违心同意划李为“右派”的编委会上一时百感交集，无以自解，竟哭了一场。

至于王飞不得不领受的“包庇右派分子李慎之”的罪名，就更加荒唐可笑，主要依据就是他在编委会上不同意划李为右派。在上级党委定性之



王飞(右)暮年体弱多病,不良于行,李慎之每年春节都要登门拜访。图为2001年农历大年初一,两位老友在一起促膝谈心。王启阳摄

父王飞,为什么“婉拒”毛的邀请?他引用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的话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我当时对毛泽东已经失望了。”

毛主席的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怎么不处分王、李的指示就不被执行了呢?

有人用鲁迅先生的名言解释这种现象:“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其实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把那几十年中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有关责任人的个人品质,未免过于简单化。这里面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年代,为

前,新华社多数编委都持反对意见,为何王飞在党组会议上发表意见,就是包庇呢?答曰:其他编委反对,是“温情主义”;你和李慎之是搭档,共同对林克发表了极其错误的意见,你反对就是有意包庇。如此诛心之论,让王飞百口莫辩,最后只能照单全收,否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不过有一说一,对王飞、李慎之,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可是明确说过不给处分的。后来如此处理,不能由毛主席负责。当时吴冷西传达毛泽东的话说:“这两个人讲话很勇敢,他们是肯想大问题的,意见中也有可取之处。我既然批评了他们,就不要给他们什么处分了。”林克也来传达主席意见,说主席要他来告诉他们,“你们是好人,对批评不要感到紧张”,“不会给予处分”,等等。林克还正式转达主席要与他们一起研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邀请。对此,王飞推辞道:“我们是搞日常时事的,工作忙,水平低,实在不能研讨这些理论问题。”请林克代为恳辞。

当时李慎之作为工作人员,正陪同周总理出访亚欧11国。回来后听说“陪圣上读书”的机会居然被王飞托词婉拒了,很是不舍:“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意。”(《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1997年看到李叔叔的文章后,我曾问家

了“继续革命”,为了革命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要不断揪出、打倒反革命。当时历次运动中,实行的是5%的“末位淘汰制”,打击别人是保存自己的前提。不打倒别人,自己就有可能被打倒。没有最“左”,只有更“左”。这种比谁更“左”、比谁更疯狂的大赛愈演愈烈,“文革”中被包装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专政”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历经半年批判、检查之后,1959年初,家父王飞的处分终于尘埃落定。翌年,他被下放到黑龙江宁安县农村“劳动锻炼”。

1961年,王飞结束下放到回到新华社。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新华社举办了干部轮训班,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王飞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毛主席也是人,人总会犯错误的,不能把毛主席神化。把主席神化,认为不能讲一句错话,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别有用心的。”虽然轮训前曾信誓旦旦地宣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但“文革”中王飞却又“新账老账一起算”,被“革命左派”打成“黑帮”、“三反分子”、“漏网右派”,关牛棚、劳改5年多,还一度在“吐故纳新”中被“军管会”开除党籍。林彪事件后,他才得以“解放”。

1956年,王飞刚刚年届不惑,李慎之只有33

岁,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还是个年轻人。在之后那段不堪回首的年月里,他们遭受的打击,不过是沧海一粟,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遭受的损失,才更加令人痛心。

李慎之总觉“永远愧对老友”,“改正”后每年春节都要亲自登门,给王飞拜年,直到因病逝世。王飞暮年双耳失聪,脑力衰退,平日很少与他人交流,包括家人在内。但李慎之一来,两人一会儿促膝谈心,窃窃私语;一会儿高谈阔论,声震屋瓦,患难之交仿佛又回到了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当年。

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时,李慎之给新华社对外部原副主任、同样被打成“右派”的郑德芳同志(“改正”后任《中国日报》副总编辑)所出的证明中这样写道:

1957年11月10日我写的材料,是在我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在压力下写的。但是我当时就不认为郑德芳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因此,凡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可以构成她右派罪行的材料,我都不愿意写。现在事隔多年已全部忘光,当然可惜的是,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以证明她当年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

我觉得,侥幸保留下来的王飞、李慎之 1956

年10月与毛主席秘书林克的谈话记录稿,同样也可称得上是“当年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

曾有同志后来对王飞说,你的看法一点没错,就是早说了20年。

尽管为那篇讲话吃尽了苦头,王飞却“虽九死而不悔”。1981年,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的他在一份自传中写道:

本人一贯主张独立思考,探索真理,反对盲从,从不轻于苟同。1956年10月,在波匈事件尚未平息之际,毛泽东主席派其秘书来征求我们意见。我就国际共运与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些问题,系统地讲了一篇意见。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我们的意见。如果说“创见”,那篇讲话可以算我个人的代表作。惜乎我那篇犯颜直谏的讲话,不但未被接受,“反右”及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长期受到批判、斗争,从而决定了我多年来在政治上的坎坷处境。所庆幸的是,1979年,新华社为我平了反,我在20多年前那篇讲话中提出的一些思想,今日已大部成为现实了。

大部成为现实了吗?又是30年过去了,历史仍在曲折中前进。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按需出版

2004年我公司在国内率先与出版社合作开展按需出版业务。5年来引领行业潮流,已为300多位国内作者出版了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华人作者出版了著作赠送亲属友人,精美的按需出版图书深受广大作者欢迎,成为品味高雅的礼物和更有价值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具备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投入过多印数过多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1—2个月。重印在1—2周。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长辈遗作;书法、绘画、照片、奖状复制;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继续征稿 (50本起印)

资金投入:自费。以50本(大32开)为例,基本费用200页2000元,300页2800元。如需加增录入排版、装帧设计制作,则共为4000~4500元上下(含2页彩插)。具体价格视稿件形式、种类、字数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

正文纸张:70克胶版纸(黑白)、128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邮编:100192,热线:13521531088陶女士。

电子信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外地邮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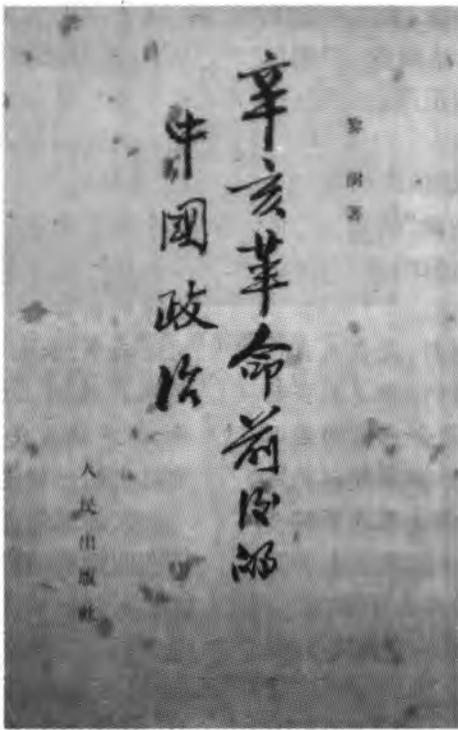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黎澍批判专制主义

• 王曾瑜

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钺先生为史学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则是在“文革”之后，并且也尽力更正过去的错误。他那部《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就记录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新深入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必然性。恩格斯说，“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记得在我们学生时代，不知给我们这些学子进行了多少必然性的教育。然而当中华民族经历了大饥荒和“文革”两次奇灾惨祸之后，痛定思痛，这两次大事件是何缘由，有何必然性？这当然是每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正视、回答，而不应回避的问题。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
黎澍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黎澍先生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的第一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经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之后，毕竟是一批共产党人，开始识破庐山真面目。如周扬先生过去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多人挨整，是由他出面的。如今方知，当年从局外人看来，他似乎是“左”的；但在中宣部内部，他却是“右”的；可是许多“左”的动作，还须由他出面。“文革”结束后，周扬先生却是觉悟的一人，据说每次见到过去挨整的人，总是主动向人赔罪和道歉。他提出所谓“异化”的理论问题，据有的记载披露，是有感于本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却成了高踞人民之上的官

老爷，结果遭到严厉批判。我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周扬，倒不必提什么同化或异化，就是提巴黎公社原则，提批判等级授职制，提马克思主义强调直接选举制，看看那些“理论家”如何批老祖宗。

黎澍先生当然是看穿庐山真面目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对于所谓“四人帮”的本质，最初华国锋提出的官方口径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黎澍先生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的《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首先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后又编入《再思集》。此文指出，江青之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篡党夺权，建立‘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预告篡党夺权成功还要杀人，并且要不断杀人，反复杀人，赤裸裸地暴露了

他们酷嗜杀人的狰狞面目”。“他们颂扬暴政,攻击仁政,原来是一码事。他们颂扬的暴政,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残酷统治,不许人民有任何民主权利,也不许人民生活有任何改善,强迫人民充当供养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驯服工具”。

他在另一篇《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文章中,说“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忽视这个条件,反动阶级的复辟将随时在各个领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整个过程中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除了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我们急需制订法律,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和监督、各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制度、干部制度、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做出详细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自外于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成了封建国家、法西斯国家”。“我们一定要处处警惕数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加以排除,对于封建专制的任何变相复辟的表现,即使是局部的,也必须公开揭发和批判”。

黎澍先生以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入思考,以雄大的气魄,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提出了必须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挖掘出了十年浩劫等奇灾惨祸的病根。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没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是提不出这个科学结论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所谓理论家,那些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既不可能有此责任感,更不可能有此科学勇气。当时,此文的发表真是石破而天惊,对陷入苦苦思索的我,确是起着茅塞顿开、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作

用。黎澍先生曾在《新华日报》工作过,他有时说,自己是搞新闻出身的。他主要研究近代史,就国学和中国古史的根基而论,当然比不上范文澜



1988年黎澍于北京

等先生。但是,提出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是黎澍先生对中国史学,也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这是范文澜等先生未能做到的。至于活到“文革”结束后的郭沫若先生,其后半生的学术道路,也根本无法与黎澍先生相比。我想,中国史学界、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忘记黎澍先生的贡献的。黎澍先生打开了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是一位勇敢的开门手。

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当然是史学的一种重要功能,而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如果要投票选举中国大陆史学六十年的第一人,我想,我一定会投黎澍先生一票。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了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头等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我认真考虑过,六十年间,确有一批学识渊博,在断代史和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史学大家。请注意,我避免使用“大师”一词。关于“大师”,我在《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兹不重复。至少在当时,大师兄漆侠先生就表示同意我关于“大师”之说。但平心而论,也确实并无另一位史学大家,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然而黎澍先生开创的新路,说小了对中华史学,说大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都至关重要。

有人企图将他打开的大门重新关上,但黎澍先生身后二十余年的史实证明,这扇大门是关不上的。例如周良霄、刘泽华、王春瑜,还有不久前逝世的韦庆远等先生,仍步着黎澍先生的后尘,

从事这项令某些人厌恶的工作。

我在黎澍先生的启发和影响下,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一文,但因当时的环境,删削了此文最后一节,后在《凝意斋集》发表时,改标题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最后一节有如下一段话:“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闭着眼睛不承认,并不能使这个客观存在取消。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不搞思想解放,不搞反专制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把我们的民族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如今特别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等级授职制,就是不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两项上层建筑,必定在划革之列,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说,思想解放运动是不可能终止的,黎澍先生打开的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必然是愈开愈大。中华民族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先进民族,批判中华专制主义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是绕不开的。

但是,由于黎澍先生提出了这么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必然令某些人厌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而最终的解决方式是以“退休”的名义革职。耐人寻味的是,对周扬先生的“异化”论公开进行“温和的”口诛笔伐,当然也不容周扬先生答辩;而对黎澍先生的反专制论,却是不动声色地组织处理,从不作公开批判。当然,真理愈辩愈明,应是人们的常识。

“文革”前,我也听过黎澍先生若干报告,但印象不深。只是听说,他一到近代史所,就批评近代史所全所人员只是为刘大年一人服务的情况不对,应当人才辈出。真正对他有个别接触,还是在“文革”后期,记得我们还在明港军营,当时周远廉先生和我一起奉命,对黎澍先生调查尹达先生。此次黎澍先生给了我很深的好感和印象,他为人爽直,说话干脆,相形之下,接触更多的尹达先生,有时说话吞吞吐吐。特别在江青等人倒台

后,黎澍先生也算是复职并升迁,但他对人,特别对后辈没有丝毫架子,真诚而坦率。我对熊德基先生说,像黎澍那样,我作为后辈,即使同他吵架也没有关系,他绝不会记仇,或者认为我对他不尊敬。熊德基先生说,对了,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退休”之后,我仍是常去他家。当时没有电话,从无事前告知的可能,但他大致上闲在家里,往往总能见到他。我当时还在走学究式的道路,所以从不问他“退休”的内情。如今回想起来,我们的多次会面,都对当时愈来愈严重的腐败发牢骚,但又苦于无奈。他辞世的消息,我很晚得知,连他的追悼会也未能参加,这是一大遗憾。但时隔二十余年,我确实忘不了黎澍先生,并且愈来愈强烈地怀念他。

黎澍先生和胡绳、刘大年先生在“文革”前,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印象,都是党的近代史专家,在“文革”中,也都蒙受不应有的冲击和批斗。但正是从“文革”后期始,却各自走完了迥异的人生旅程。我手头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学术大师治学录》,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介绍胡绳和刘大年,甚至还介绍周扬先生,却没有黎澍先生的一席之地。书中称胡绳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说刘大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

记得在“文革”结束后,我对一位师姐说,黎澍和刘大年过去在我们眼里似乎没有差别,现在才看出来,两人高下差别颇大,那位师姐表示同意我的说法。然而刘大年最终获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胡绳获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与黎澍先生相比,当然是荣枯有别。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荣枯有别的偶然性中,自然是有着必然性。此种必然性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起着作用,学者中效法刘大年者不少,而愿意当黎澍先生后继者寥寥可数,但毕竟还是有人。

日月如梭,转瞬之间,黎澍先生离开我们已二十余年了。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尊敬的长者的菲薄纪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一厘米主权”与赵作海的生死

● 郭道晖

近来舆论界、政法界都在热议一桩冤错大案：一个被判“死缓”的“杀人犯”赵作海，经过 11 年牢狱之灾，弄得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之后，被“杀”的人却忽然活着归来，从而赵作海被宣告无罪释放，原来经手审理此案的公检法人员被分别问责：其中进行严刑逼供的公安干警，已被刑拘；而当事人的检察官、法官也被停职检查。但他们私下庆幸当时没有对“杀人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有意“留有余地”，判处“死缓”，否则他们就不只是错判，而是错杀，追究责任就大有不同了。

社会舆论在追问和反思造成这一冤案的原因时，大都责问检察官和法官明知证据不足（检察官曾因此 3 次退回公安机关侦查），而不依循“相互制约”和“罪疑从无”的原则，释放赵作海，却顺从“上面”的压力，判处他死缓，良心何在，正义何存？

这种追问，是有理有据的。作为“维护人权的最后防线”中应当是“公平正义的化身”的司法人员，依法独立和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是他们神圣的职责和使命，也是他们应具的司法伦理。作为错案的经手人，他们责无旁贷，“法无可恕”。

不过，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在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下，他们这样判处，却不无“情有可原”之处。据报道，当时正值中央要求司法机关雷厉风行迅速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高潮期。按权威部门的统计，1993 年至 1999 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超期羁押人数一直维持在 5 万至 8 万人之间，成为严重违法侵权、影响党和司法机关形象的老大难问题。2002 年 5 月，全国检察机关经验交流会要求在 2002 年 6 月底前全部纠正超期羁押现象，这“一刀切”的决定，成为司法部门“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上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实际上是公、检、法、司的联合体，主要职能是互相“配合”，而很少或取消了“相互制约”，政法委员会的委员制也变成政法委书记首长负责制（而书记又多是由现职或出身于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兼任。据悉，商丘市政法委书记还不是学法律

的，而是学煤矿和矿山机电的），大案要案都须经检察委员会和审判委员会讨论，最后由书记个人说了算。这成了判案的习惯程序。正如商丘市检察院此案的主诉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员所说：此前长期关押赵作海“就是政治需要”，此后，上级部门负责人对此案“快审快判”的批示，也是政治需要。“要求我们必须 20 天内起诉到法院”，“商丘市委政法委把结论都定好了，检察院、法院只不过是形式，我们只有服从”。（参见 2010 年 6 月 3 日《中国新闻周刊》专文《赵作海冤案形成过程》）

如果不服从呢？按内部纪律就只有被罢官甚至问罪的后果。我国的检察官和法官一般不具备“舍身为法”的节操，就只好服从上级决定。稍有良心的法官、检察官才勉强做出“留有余地”、“网开一面”的判决。因此，如要追究责任，根子还在党的政法制度的固有弊病：党大于法，政法委的专权和错误决策，以及把司法政治化，把判案运动化。

不过，在那种情境下，当地检察、审判人员采取“留有余地”的对策，判死缓得以“枪下留人”，既保住了无辜者的生命免遭冤杀，使后来平反还有活口；又曲应了上级武断的威权；事后还可减轻自己的罪过。再说，“留有余地”也是给自己的良心存留一点空间，不失为保住做人的道德底线的一种权宜策略。虽然这并非崇高，总比那种视人的生命如草芥，或踏人尸骨以升官的行径要可取得多。

联系到柏林墙推倒后审判东德警察一案（详见郭道晖《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载《炎黄春秋》2010 年第 2 期），该警察曾奉命开枪杀死越墙奔向自由的青年。其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东德政府的法令，罪不在己。而法官则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即只开枪而故意不打中），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

来的而求得宽恕。在不得不执行恶法恶令的时候，当事者应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尽最大智慧，“留有余地”地、打折扣地执行。也就是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你有凭良心坚持和运用这“一厘米主权”的道德义务，否则你必须承担罪责。

我们党的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你整我、我整你”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在最高领袖专权、一个人说了算的不可抗拒的运动中，仍然有一些明智之士和没有泯灭良知的党员干部，不怕担风险，或冒死“包庇”无辜受害者，或在可能条件下宽容、善待一些受难者。如在急风暴雨的“反右”运动中，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的文化部文物局，被上级指定至少要划3个右派，但在局长王冶秋的曲意呵护下，居然没有划一个右派。又如著名历史学家李新在其《反“右派”亲历记》中开篇就说：当年“若没有吴老（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再如张闻天主持外交部“反右”运动，反复强调要特别慎重，可划可不划应尽可能不划，实在不行就划成“中右”或“严重右倾”。由于张闻天的努力，外交部这一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相较其他类似机关，右派少得多。也因此，当时外交部的“反右”遭到了非议。两年后，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张闻天“罪状”之一，就是所谓“包庇右派”。还有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长张黎群等都有被打成右派的可能，但却被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保了下来。据当年的“大右派”刘宾雁说，胡耀邦曾经想保护许多人，包括刘宾雁本人，但是多数人没有保成。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上任伊始，他便开始大力平反历次冤假错案，摘掉了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被确定为错划，予以改正。（以上参阅腾讯网：《他们是如何躲过了“右派”帽子的？》原载2008年7月1日《新闻午报》）

以上诸例表明，即使在“不可抗力”的高压下，仍然可以运用这“一厘米主权”，略尽自己的道德义务。

当然也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在运动中跟风整人，执行恶法恶令，以求自保，伤害了一些人，包括自己老友、老同学和亲人，事后深自忏悔，登门道歉。他们当时一念之差，弃置这“一厘米”自主

权，没有尽这起码的道德义务，以致备受良心谴责，遗憾终身。像《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赵遐秋在其《跟风整人的懊悔》一文中诚挚的自责那样，或像另一期《炎黄春秋》撰述的另一位老干部临终还念念不忘这个毕生欠下的良心债，死不瞑目。（见2009年第2期文章）应当说，他们毕竟还是良知未泯的好人，这是千古悲剧。

往者已不可谏，后之来者犹可追。近读《炎黄春秋》今年第6期田纪云同志《我从政的几点体会》一文，其中告诫人们：“当一个错误潮流来临，个人又无力抗拒时，也要尽量避免卷入，不说或少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违纪的事。例如文化大革命，谁也抗拒不了，但你至少可以不去诬陷他人，更不要去打人。”

善哉斯言！这几个“不”，正是你拥有的“一厘米的自主权”和最低道德义务。

可是，不少人并没有坚持这样的底线，而是随波逐流，积极卷入，充当打手，助纣为虐，至今仍不见有所反思和忏悔。有些人甚至是“借”纣为虐，即借运动的大旗，打击报复，排除异己，做出灭绝天良的暴行。像“反右”运动中的云南昭通专区党政领导人蓄意将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610名打成右派（占被划右派总数的99.38%）和在大坪劳教所听任30%~50%的右派囚犯饿死、累死，就是例证。至于“文革”开始时北京师大女附中女学生们毒打校长卞仲耘致死，北京大兴县农村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后代（包括婴儿）的大屠杀，湖南道县大规模的杀人；广西柳州放水淹没防空洞里对立派别的群众，有的地方甚至炒吃人的心肝；辽宁司法机关虐杀张志新烈士还狠毒地割断其咽喉（据悉当地犯人临刑被割咽喉的前后达30多起）……凡此种种打人、杀人甚至吃人的暴行，固然根在“始作俑”的暴君，但他们在具体执行中不是“打折扣”，而是更加码，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警世箴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这类人的罪恶是不能全推到暴君一人的。

每个人每天都在以自己的行为给自己“写”历史。人们，可要珍惜这“一厘米主权”啊！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吴 思）

我认识的胡乔木

• 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记录整理

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大才人

我感到在中共历史上,胡乔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到只有唯一一个这样的人物。我记得1940年前后,延安《中国青年》杂志上登过他一首诗,中有“雨后的繁花,笑满了春山”这么明丽生动的句子,一吟及此,就会令人感到绚烂美丽,生意盎然。但是,老年后同一作者却又吟出了“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的诗句来,反差似乎太强烈了。

胡乔木的特殊是多方面的,并不是说他权大,后来加上位高,言足以动天下,而主要还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我觉得,胡是中共历史上的才人之一。在中共历史上,有的人不是才学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根本上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开路先锋,是全民族的优秀代表,他们不是、也不必以才名世。后来一批人,如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这些人是老革命家,也是中共知识分子当中很有才的人,尤其是瞿秋白。但是这些人牺牲得早,他们的才学没有得到发挥。再下来,就是张闻天、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这几个,他们跟胡乔木不同。他们在党内名义上都较早地占过重要的领导地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学,而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机缘。再下来,就是党内很著名,但没有占重要地位的人,这就很多了,像李一氓、成仿吾、阳翰笙、周扬、夏衍、邓拓这批名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共历史上也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名声都很大,但跟胡乔木的地位不能比,这些人在才学的广度上,可能也比不上胡乔木。我觉得胡乔木的才学,主要是广度,有些地方也有深度,不是泛泛地知道一些。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马克思的某些著作似乎也不曾用过什么功夫的。中共历史

上有个特点,掌宣传大权的人,几乎没有谁认真读过马克思(张闻天读过)。胡乔木另有个最特别的地方,是其他人远远赶不上的,他在品评文字这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而且我认为在道理上他都是对的。尽管这样,他本人的文字则并不特别吸引人,远远不及陈伯达。他并未留下个人风格,十分可惜。这是什么道理?他的思想受到了太多的限制,文章写得不放手,并不使人爱读。

胡乔木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面的广度上同康生比,恐怕比不上,尤其在甲骨文、金文、版本、戏曲等方面,远不如康生。胡的工作比康生忙十倍,一到了延安,就没有闲的,而且一直到他离开工作。胡工作的紧张程度,是超过常人的。作为职业革命家,他全心全意,呕心沥血,把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生命贡献给了共产党,贡献给了革命。在党内,熟悉胡乔木的人现在还较多。解放后,打倒“四人帮”后,跟他直接长久发生密切关系的,至少几十上百个。我只知道一些过去的琐事。

胡的知识来源,跟他的学校很有关系。他就读的中学是扬州中学,毕业后,进的是清华大学,后来又转到浙江大学,都是全国最著名的学校。但从根本上讲,是胡本人聪明、用功、求知欲旺盛、思想活泼,他杂书特爱读。他参加革命活动很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致力学问,但他还看偏僻、专门的书。所以,在这些地方,你只有叹服。

在延安时期的作用

党中央在1937年初迁入延安,算是定下来了。当时特别缺乏文教宣传干部,在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听说就调了陈伯达、周扬、艾思奇、胡乔木等一批著名人物到延安。

胡乔木在党办的离西安不远的安吴堡安吴青训班当副主任(这个“青训班”是为未获准立即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胡乔木和毛泽东在一起

到延安去的进步青年们办的),主任是冯文彬,主持教务的是胡乔木。胡乔木不久后回到延安。一直到1947年延安撤退,他一直在延安。除了那些主要领导人毛、张、周、朱及其他重要领导人外,他实际是延安天空众星当中最亮的一颗星了。他地位不高,岁数不大,不到30岁。但是,当时很多事情都是他做的,1941年毛把他叫去当政治秘书后,就充分起了这个作用。这之后,还相继有中央政治局秘书等名义,我就不清楚了。

1942年2月初,毛作第一次整风报告《反对党八股》。这个报告前十来天,即1942年1月29日凌晨,张闻天就自觉离开了杨家岭,去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调查工作了(我是跟着下去的七八个青年之一)。张是被迫但又是主动要求下去的,因为这样便于毛的整风部署——他本人有30年代初的欠账,另一方面又有遵义会议以来的“明君”名义与形象。从大局着想,张作了一个不发宣言的自动全面“引退”。后来听说,张的中宣部部长已于1941年夏免去,由凯丰出任宣传部长。凯丰在党内无威信,长征的同志们都知道1935年遵义会议时,他还在反对毛主席,这事在延安是作为讲课之用的。我的印象,抗日战争后,在延安可以公开点名批判过去犯过错误的,只有李立三、凯丰和邓发三人。凯丰长期多病,中宣部一职,很难视事,此事遂被指定由胡乔木去代行。

(是否有“代部长”名义,至今不清楚。但代理过凯丰的工作,他自己在某处自述中似乎也陈述过。)胡作为宣传部代部长或代代部长,住在杨家岭便于指挥新华社、《解放日报》。中央秘书处也在杨家岭,他在这里编什么,调什么资料,方便得很。

现在看来,实际上,1941年夏张闻天已经离开工作,事实上胡已经是代部长了。凯丰除了声誉、健康均不理想外,在能力上更不能同胡乔木比。(事实上,在“多识”一点上,张闻天也比不上胡。)胡乔木来中宣部这一年,是毛决定在延安做宣传大整顿的一年,从1941年夏起,延安所有的报刊全都停止出版了:中央机关刊出了四年多、大概是134期后的《解放》停刊了,在党内很受欢迎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张闻天主编)停刊了(发刊词是毛写的)《中国青年》停刊了,《中国妇女》停刊了,《中国工人》停刊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停刊了,其他的文学刊物也全都停刊了。《解放日报》于1941年创刊。胡则在1942年约3月时即在《解放日报》写了《教条与裤子》社论,号召大家在整风中“脱裤子”。此文看来去与胡的严肃、稳重、周到、平稳的文风截然相反,实际上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时就谁也不爱看,根本不去提及它。胡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唯一一次怪文章呢?非常令人奇怪。

从1943年起,中央政治局内部,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叫中央组织委员会,一个叫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书记是刘少奇,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书记是毛泽东。很奇怪,共产党一直是重组织轻宣传的,怎么这回组织成了刘少奇,宣传成了毛泽东?原因是1942、1943、1944年,都是以整风为主。整风是干什么?是思想教育,名义上属于“宣传”。所以,这时变成“宣传”决定一切了。1943年中央政治局作了决定,毛在中央有最后决定权。最后决定权一来,胡乔木就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毛泽东的秘书。

但是,胡乔木当时与前辈们,与周围人的人事关系却是很好的。他当时为人谦和。所以,尽管他的地位那么高,那么重要,但是他个人的声誉没有受到损失,老前辈们谁都喜欢他,觉得他还是个年轻人,三十来岁。当时我们年轻人非常尊敬他,觉得他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有那么大的本事,相当崇拜。总之觉得,在延安他是一个非

常出众的才人。

我与胡乔木直接接触最多的时期

1943年，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紧张得不得了，需要一批通俗宣传材料，写好后拿到外边去换个题目出版（一直如此，很多人都做过此事）。1943年11月，胡乔木把我叫去，交给我一批资料，要我编写。这时中宣部的人，下放的下放，其他的老人全部靠边，才会叫到外单位的我。（那时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归陈伯达管，我也是在被“抢救”后不久。）我把编写好的东西交上后，胡把我叫去了。是一天下午，很冷，胡生病躺在床上。他这个人，批评人，表扬人，都很简单，点到即止。他的原话记不得了，意思是，还可能改好。但是，他很明白地指出我文字的毛病。说我白话夹文言，还用了一些不妥当的名词、形容词之类，还有就是一些地方文句不通，全文文风不统一，总之，不大像样，只是未彻底否定。最后，他要我回去修改。

他这次对我的批评，我感念不尽，因为，很深刻，令我终生不忘。从此，我才知道写东西要注意很多方面，这对我是极大的帮助，也是一次“启蒙”。

我回去另写后交了。他可能觉得孺子可教，在1944年3月底把我调到中宣部去了。但不到个把月，他本人就调回枣园毛主席处去了。

我继续留在中宣部。干什么呢，谁也想不到。胡本人从1941年夏，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数年间几乎日日夜夜是忙于党中央最高层分清路线是非，即反对王明、博古、张闻天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极端政治路线的错误的斗争。但胡乔木因为个人的兴趣，要搞一套初高中结合起来的语文课本，这是他的“自留地”，千忙万忙也要种。田家英和我奉命参加这项工作。胡当时要我们编的语文课本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语文，选从古到今的，第二部分是文法，第三部分是自写部分，他要求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作风教育以及科学普及知识（包括性教育）等糅进去写成课文。这一大片，他认为没有现成的文章可选，要自己编写。这个设想不错，要求高，但很难办。胡整天是尖锐的政治，吃不消，只好在背后种点自留地。

田家英主要负责选课文与写文法讲义，我负责写课文。我已写成了《生物的生殖》、《尽善尽美》、《百折不挠》、《先天下忧》等四五篇，题目全是胡出的，可见见解之高。为了编这个教材，胡把田家英和我调到枣园他的窑洞里。他的两个窑洞，是挨着的，一个他们夫妇，加上两个孩子住，他把办公的窑洞让我们暂住，他在自己住的窑洞的一张小桌上办公。于此，可见他对此书期望之高。

我们去过两次。1944年“九·一八”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二人背着行李到他的办公室。住了一个多月。1945年4月初，第二次叫我们去，一直到5月罗斯福死后，情况大变，不是再搞“的了吗呢”的时候了，我们才要求回到杨家岭。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在文字上受到胡乔木的“夹磨”，第一次在文字上得到严格的训练，比过去的语文教师好得不可比拟。

三年之后，即1948年5月前后，我从山东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团，同于光远等一齐奉命调回东、西柏坡。当时战争形势发展较快，估计不要太久就会进入城市，因此，陆定一交给我几件小工作，其中之一是编成十本党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先印一些，进城后再大印。陆定一说交乔木审查，他熟悉这些文件。胡乔木当时也没有什么大名义，是小新华社的社长。这也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社长也好，不是社长也好，反正归他领导，他的话大家自然都特别注意，1942、1943年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人名辞典上查他，进城前，说是毛的秘书，新华社社长，并没有其他的职务。

我编的准备进城的十本小册子中，陆特别告知说，苏方已通过各种方式放言，中国是比铁托更大得多的铁托，处处逼中国表态，要编一本。苏联在1948年整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主权方面稍微有一点不同于他们的意见，就说你铁托是杀人犯、匪帮、德国的间谍等。指鹿为马，任意横行。中国没一个人相信，因为我们是把南斯拉夫作为模范的。“解放区”、“解放军”这名词是从哪里来的？是1944年后从南斯拉夫学来的，原来没有。我奉命编的这本书，尽是苏联骂铁托是匪徒的东西，你不把这个东西编进去，苏联就要整你。我编了它，到西柏坡去交给胡审查。关于铁托这本书，

我特意起了三个名字,第三个《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直接骂“铁托匪帮”,胡立即指着第三个书名说,“这个好,这个好”。胡这个人,批评人怎么样,一般讲,比较严格,但态度温和,至于称赞人,很难。如果要称赞你,一般说,“这样可以了”,“我看大致就这样吧”,就是很高的赞誉了。

审查完这十本书后,胡乔木问我在宣传部干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事。他说,你到新华社来帮帮忙吧。1948年11月或12月,我由东柏坡到了西柏坡的小新华社。新华社是很大的,西柏坡就那么大一块地方,只允许一个小编辑部存在。小新华社占一个院子的前半部,胡乔木直接抓。小新华社有军事组、文教组、政法组、经济组几个小组。另外有个名义上的评论组,实际不评论,胡乔木叫评论组,他自兼组长。评论组有范长江、石西民、廖盖隆、王宗一和我。我们在那里,干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回头来看,是胡乔木在办培训班。

一直到3月下旬进北京前,这几个月,我们受胡乔木的培训受益是很大的。他在文字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也很科学化。从政治、逻辑、语法、修辞各方面全面要求。在西柏坡时已经有电灯。我们大概在晚上7点上班,12点下班。快11点稿件发完后,胡乔木经常要召开一个没有名字的会议,现在叫讲评会,就是胡乔木的炉边闲话,他讲得实在漂亮。所有的人集中在中间一个较大的房子里,房间可以坐立二三十人,由他来讲。他主要讲在稿件中发现的逻辑、语法、修辞问题。这些问题经他一谈,觉得太多文章“一无是处”。这里的“一无是处”,不是贬义。因为他说得有道理,很深刻,不是苛求。大家非常喜欢听,像范长江这样的名记者,都常说,我的文章不通呀!我看是口服心服,真心的。可惜那时没有录音,如录下来是无价之宝。

这种训练,对人是非常有益的,而且终身受益。在这类问题上,胡乔木比别人高明得不可比拟。用他的一套来分析,凡是没有经过他改的文章,错误都很多。但是经过他修改的文章,有时也可能发生另外的问题:语法、修辞、逻辑等没有问题了,但也可能把个人的风格改掉了。这个问题还是要十分注意。胡的文章就不如陈伯达,尽管陈全不讲这些。

我一生愚鲁,如果说思想上、文字上受到一些教育,还是离不开陈伯达、胡乔木两个人。胡重视规则,陈重视感性。

胡乔木对“外国政治学术丛书”的批评及我的《申诉书》

1949年3月,胡乔木让我跟新华社一同进北京。进北京后,是他放我南下广州。此点是华南第二书记张云逸在北京告诉我的。1949年5~6月在香山时,胡叫我去作临别的谈话。我一进门,正碰着邓力群站起来欲出门,二人还在谈什么西伯利亚大铁道如何如何等,我估计邓是要到苏联去。此后我跟胡乔木的接触不多了。1954年我从广州调人民出版社工作,还是他主张。这是上级告诉我的。工作中需要请示的,我一般仍写封信请示他,请他秘书打个电话复示。为什么要请示他呢?因为他熟悉历史上的出版情况,别人不一定知道。“文革”结束后,我1978年回人民出版社工作,因为“外国政治学术丛书”,胡乔木认为我出了大问题。

出版这套书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我回人民出版社工作后,还是坚持“睁眼看世界”。我们出版社不够资格发起,我找了社科院于光远、编译局王惠德、出版署陈翰伯,由他们来发起,编“外国政治学术丛书”。选题小组所到之处,一片欢快,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制定出翻译近现代外国学术重要书籍97种,号称100种的计划。人民出版社负责事务工作,打印出来,寄出征求意见。人民出版社的政治编辑室竟寄了一份给胡耀邦。这个做法是很不妥当的。哪晓得过了几天后,收到一份回件,还有胡耀邦的亲笔信,是这样写的: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该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胡耀邦 7·21

这是1980的事。这封信档案中应该还保存

着。

当时,出版界多少形成了一些新鲜空气。但很快地,1982年开始了反对精神污染等运动。当时什么是“精神污染”,没有一个人搞得清楚。我们单位的人事科长已经如执行圣旨一样,望风而动,发动女同志剪头发、剪裤脚了。反精神污染,新华社发消息,一个××,一个×××,出面支持这个运动。两个都是老前辈,有名的作家。

一时全国紧张起来,以为一个什么“革命”又要发动起来了。先是批周扬,周扬一气,得病,从此不起。周扬犯了什么罪?他说,要讲点人性,要讲点人道主义。胡绩伟跟王若水,在《人民日报》大会、小会上被批判,都撤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点敏感性都没有,没有感到后边会连着什么单位了。但是我已感觉工作做不下去了,又要变成文件出版社了。1983年夏我辞职,不是躲风,而是感到工作难做了,辞职后就不去上班了。但是,1984年2月到3月,胡乔木本人专门为了这套书,要人民出版社编辑组长及副处级以上的人到宣传部去听转述他三小时的批评。第一次我不在京。第二次又叫了人民出版社三个负责人去,命令说曾彦修必到。胡乔木一人对我们三人批评了三个钟头。这个会是专门为我而开的,但我始终未讲一字。

按照常理,当然又是下级沉痛检讨,请求处分……这回我不想再演出这个“周期律”了。因为,历史证明,那套东西,其实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变种。这一次我没有屈服(因为,看来势不是屈服能解决问题的),不但没有屈服,会后,我写了一本将近三万字的《申诉书》——不敢叫“抗议书”。(我这个《申诉书》全文,当时因感到来势不同寻常,也同时送呈了中纪委。)我在《申诉书》里说了胡耀邦关于这套书的批示:

今年(按,指1984年)3月5日胡乔木同志找我们(曾彦修、张惠卿、陈茂仪)谈话时,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当面向胡乔木同志念了耀邦同志的批示,但胡乔木同志听了后,随便说了两句:“耀邦同志是一般说说,不是对你们人民出版社说的。”但是,我以为耀邦同志的批示绝不是随便说说,这个批示在党的理论研究上将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他认为必须熟悉国外的理论情况,“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把问

题提得很高,正确而又必要。第二,这个批示是直接回答人民出版社的,批示中还用了“你们”的话,怎么能解释成为不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内呢?第三,正因为只是对人民出版社说的,所以,才会觉得一下子搞这么多书,计划太大。如果对全国说的,能够说只翻译百把本就是一项重要工作停止了么,显然不可能作这种理解。

胡那天同我们三人谈话,提出了一个新原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我在申诉书中引用了:

乔木同志3月6日谈话,提出了一个十分新奇的原则,他说人民出版社1978年订的出书方针(曾按,那时我还未到北京),“这个方针讲了些漂亮话,不切实际。……里边还有一个矛盾,或者叫界限不清,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是宣传马列主义,怎么能并驾齐驱?不太明了。”

我在《申诉书》中觉得此事特大,作了一些质疑,说:“这段话确实很难使人明了。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时,并没有说过它同宣传马列主义不能并存。……乔木同志这种批评,是自‘双百’方针提出后我第一次听见的。如果说‘双百’方针只限于文学艺术,恐怕也不对,因为文学艺术方面主要的是‘百花齐放’,一涉及‘百家争鸣’,就不可能不包括各种人文科学在内了。”《申诉书》说:“……不管哪里都要坚持马列,也要坚持‘双百’,从未有人批评过两者并存是错误的。”我引用了1954年以后,中央、中宣部、出版总署的几次指示,实际均是“坚持马列”与“双百”同时强调的(篇幅太长,此处一律省去)。

当然,根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一定仍然要以一百几十年前的观点去看它,恐怕就不太适合时宜了,处处也行不通了。

我的《申诉书》主要谈了我这个下级与批评者的总分歧,即上面提到的坚持马列与坚持“双百”方针是不是不能并存的根本问题,此外,对胡乔木指责我们最多最尖锐的三类问题,我也做了明白回答:

一,是公开为托派、布哈林翻案的问题;二,“反苏”(指当时的苏联)问题;三,散布其他一些共产党的理论、纲领问题。

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胡乔木和×××做的一些事,知识分子都非常反感,动不动就触网,颇有寸步难行之感。但是像人民出

版社这样具体小事,一般人不知道。实际上是他说了些30年代的老话,并不是科学问题或政治问题。我不得已,只得来个全面抗诉。我在《申诉书》中几次向他要求,要他向我道歉,这似乎是过分了似的。一般,上级批评过分、批评错了,均不宜做此要求,因为这似乎是以过分对过分。但我这情况大不相同:我们在多种书籍中都说明那些“应该法办”并且“已经法办”的人,原来都是不应该“法办”的,当时中国在搞多种“平反”,我们出几本书证明,苏联已早搞了。这就不但是“立场”错误,而是我已经被置于触犯刑法的地步了。当然我就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了。这有点像大逆不道,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人权。难道我们连人家自己都已说了几十年的话,即是枉杀了无辜的话,我们在过了二十五六年之后才介绍一点过来,也不行吗?难道斯大林的大屠杀是“三七开”吗?还要隐秘这个吗?因此,我实在是被逼上梁山,不得不以身试法的。我注意过,在此五年之后,即1989年,中国才能公开地承认斯大林杀托洛斯基、布哈林等是错误的。因为这时再不承认就是在同苏联人民作对了:他们的最高法院正式在1989年发布平反判决了。这时只有一个可能了:要么斯大林杀得对,要么,最高法院平反得对!

胡的外表与内心似乎大有矛盾之处

胡的一生表现出来的似乎全是政治(“文字改革”可能例外),似乎全是苏联的政治与毛的政治。但他内心的许多想法,似乎又不一定是如此的。

中国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外文主要从日文转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著作逐渐多一些了(但是并不多),但其中多是斯大林在30年代思想专制下的产品,是他的部下编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哲学是米汀、尤金等(斯大林培养的哲学界的造反派头子之二),文学、艺术是日丹诺夫,离马克思主义很远很远了,通通都是“教程”,不是说理的。要你记住的,只有一个:公式。集大成的,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恐怕没有人没受过这部书的毒害。这部书说到底只有八个字:个人崇拜、恐怖镇压。

它对中国的影晌是太大了。在中国,取得政权以后的那一些作法对吗?例如,农业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对吗?“反右派”对吗?大跃进对吗?大炼钢铁对吗?庐山会议拒谏并硬着头皮扩大错误对吗?文化大革命对吗?打倒一切对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对吗?胡的诗“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的晚年心理状态似乎不甚好懂了。

胡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在我同他的某些接触中,感到他的内心世界有时似乎与他公开表露出来的东西并不那么一样。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1944、1945两年,田家英和我到他窑洞编语文教材,几个月,天天见面。这个时候,知道他非常赞美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等教授。田家英问,徐志摩、戴望舒,他们的诗选不选?他说,要选,“五四”以来代表性的东西,要选啊。你这个语文,在中学兼文学史的性质,读到五年级的时候,《诗经》、《楚辞》也要选一点。田又问到一些人,胡答,只有汉奸不选,周作人不选。所以从他的这些赞美,你想他会赞成把陆侃如、黄药眠、陈梦家这些学者、文学家打成“右派”吗?

在延安一年多由他具体指导编语文课本期间,知道了他的一些具体看法。以他的这些具体看法,来执行解放后的文艺政策,他会是自愿的吗?

第二个例子。

他对我们自己“赶任务”的创作,内心其实是不大赞成的。1948年秋,一天下午他让我跟他到陆定一那里说我临时调到新华社的事,走了几步,他说不必了,打个电话就行了。我回东柏坡,他说他也想走走,同我走了几十米吧,路上他因刚谈过南斯拉夫事件,突然说,他们还要给我们斯大林奖金呢。我莫名其妙,问什么奖金。他说,想给丁玲奖。我问,奖什么?他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书在1948年可能已经印出来了)。我说,斯大林奖是发他们国内,发给我们……他说,“这还不是跟欧阳山的南区合作社《高干大》一样的东西吗?”他漏出这句话,我吃了一惊,哪敢多问半句。所以我觉得胡乔木的内心世界和他表现出来的,恐怕有时相当不一样,这回,这句话是在

无意中暴露出了一点点。他对于主题先行赶政治任务的东西,内心并不感兴趣。他公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高举政治第一的旗帜,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第三个例子,是胡致周扬的诗。周扬在被公开大张旗鼓地批判后,得了重病。胡送了他一首诗。是安慰么?不像。是道歉么?不像。是解释么?更莫名其妙。这首诗全诗是什么“问剑”,问他自己的宝剑是怎么会自动飞出剑鞘,去伤了战友的;末了,又是“拥抱着一对战士”。人人看了都为之瞠目,这不是对身受者火上浇油么?这是问宝剑如何会自动飞出剑鞘去伤了战友的?那么严厉地去批判了,怎么又会来这么一首莫名其妙的诗呢?这种矛盾,实在是到了令人十分惊异的程度。身居九重太久了,心理状态变化了:不管你说什么,人人都得甚至都会无条件地件件相信似的。哪知情况变了,效果大大不同。

既往与将来

在1976年解决了江青问题以后,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前瞻”问题,“将来”问题,是如何摆脱过去的羁绊,而逐步走上新路的问题。过去是非善恶的标准,决定于“最高指示”。在新的、根本重要的历史关头来临时,应该决定于“国是”前途应该怎么办。这时,逐步出现了邓小平,出现了一系列根本性与带新的历史开拓性的新提法。

邓小平自上世纪末以后,几年间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新理论(当然也有其他领导同志提的,此处以邓小平为代表)。我对此缺乏系统的知识,凭印象的深刻程度与我听说的大致顺序,首先想到约有下列几点(大意):

一、在没有极为特殊干扰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是我们永远不变的根本任务。

二、在对外事务中,我们要采取“韬光养晦”政策。

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潮流。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上第五项,据多年来各种长文介绍,小平同志是立即出面坚决支持了这个原理,所以我没有把它放在最前面。)

以上这些,显然是与1976年以前大不相同的一整套势在必行而又可行的长期国策,同时也是理论基础。仅仅以上这些,已经是一套全新的、不能不执行的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杰出体系的一些要目了。这些理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拥护。但也有一部分人对这些理论原则持怀疑态度,并在不同场合下对它们或其中的某一项长久持怀疑态度。我以为,有怀疑并能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表达出来,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大进步——当然,这要有双方都同样的表达自由才好。这当中我有个印象,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胡对此类问题,似乎没有发表过多少意见、指导与号召。这些事在我看来,是比坚持已往的任何东西,都是重要到不可比拟的。梁启超有名言:“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这段话的教训很深很深,恐怕对谁都是一样重要的。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公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启事

2009年精装合订本 100元,简装 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鸿顺园528信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1959—1960 年贵州粮政日记

• 王民三

1959—1961年，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饥荒现象，贵州省是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当时，我任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一职。以下是我1959—1960年间作为省级粮政官员所写日记的摘录：

1959 年

1月1日

新年伊始，正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上，讨论的中心是粮食问题。经历了大跃进运动、精神大增产，有的地方，去年秋收后就闹缺粮，从会议的气氛看，最大顾虑是怕出现更大的粮荒。

1月2日

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根据中央指令和粮食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确定了1958—1959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已经过去5个月了，至今入仓才25亿斤，其中就有5亿斤虚假数。再也没有入仓进度了。

1月5日

中央安排贵州调出粮食2亿斤，请示周林书记和徐健生副省长多次，他们一致意见是拒绝接受，并责成粮食厅向粮食部反映。省厅当然支持周和徐的意见，曾经呼吁过多次，但粮食部并不理会。

1月7日

徐健生副省长在县委书记大会上发言，对1957年兴义因缺粮而死人问题做了深刻检讨。他说，中央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兴义事件的通报。（注：1957年兴义县弄虚作假，发生因缺粮造成数百人死亡事件，县委书记因此受到处分）

1月15日

晚，党中央召开电话会，彭真、谭震林、李先

念三位中央领导都是讲粮食问题，会议中心是强调稳定农村粮食局势，防止在大丰收后发生死人问题。李先念讲，1958年大跃进不容怀疑，但成绩必须肯定，阴暗面不要宣传，我们认真对待就是了，群众大跃进一年，最后再挨一顿骂是不好的。

既然是大跃进粮食成倍增长，不容怀疑，为什么反而闹粮荒，又要防止饿死人呢？这种极其矛盾的现象使人难以理解。

1月17日

秋季油料收购任务2.6亿斤，至今才完成14%，财贸部为此专门召开了电话会，关键是大跃进使得劳动力十分紧张，不顾一切搞大兵团作战，油料作物采集、管理，无人过问。

2月2日

各专区粮食局长会开了3天，会上统计，有47个县农民自留的口粮不足200斤原粮，大丰收后农民留粮这么少，我看去年定产180亿斤值得怀疑。秋收后损失浪费惊人，这与敞开肚皮放开吃有密切关系。许多材料说明，秋收后4个月，每人吃掉了250斤粮食，三分之一的时吃掉了二分之一的口粮，全国流传着“前4个月紧吃，后八个月吃紧”的说法，我们并不例外。

2月6日

下午听周林书记传达中央“各省第一书记会议”精神，全国一盘棋，鼓干劲、掀高潮。毛主席说，我不愿意住在北京，这里没有新鲜空气，武昌会议以后出了一股冷空气，要正确估计1958年的大跃进，肯定成绩、严肃对待缺点。我在想，是否把听到的对大跃进的不同声音说成是冷空气了呢？

周还说，中央分配贵州1959年上半年上调2亿斤粮食任务，我开始也是讨价还价，以后看

苗头不对,痛快地接受了任务。中央问有什么困难?我说运输有困难,中央领导说,为什么要给你们修铁路?

2月8日 农历大年初一

在今天地委书记会议上,针对粮食产量越报越少的呼声,周林讲,1958年粮食产量180亿斤,不能再往下滑了。依我看,这还是一个谜,能有120亿斤就谢天谢地了,估计那么高,左算右算就是找不到粮食的去向。(注: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最后核实为104亿斤,比1957年不但没有跃进,反而减少了3亿斤)

2月17日 罗甸

县委冯书记和王局长陪同去沫阳、克度、通州和城关几个公社,发现食堂断粮的较多,有的只吃稀饭,城关公社死了7匹马。民间有传言,出了玉皇大帝,扬言要抢粮食仓库,弄得人心惶惶。

这里是桐籽产区,劳动力全部抽去大炼钢铁,桐籽烂在山上无人采摘,收购不起来,白白造成损失。得失相比,谁大谁小,值得深思。

和县委研究了抓紧抢种早熟作物以度夏荒,我建议他们尽可能多种瓜豆之类。县委立即给各公社发了紧张通知。

2月18日 独山

从县委程、刘二位书记的汇报看,情况不好。征购粮食进度才完成58%,但农村闹粮荒风潮已有多起,有的食堂已经停伙,社员不出工了。

从所到几县看到,省委决定的每人14两(即0.875市斤)原粮大都已经做到,但粮食的紧张空气仍然较重,甚而听到不少对政府、对大跃进有不满情绪,有的对大跃进、大丰收破口大骂。

2月25日 都匀

州委正在召开规模宏大的大跃进誓师大会,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挑战书、保证书和决心书高举在大会广场上。口号是,比1958年要有更大的跃进。今年粮食生产计划层层加码,省里给黔南的计划是39亿斤,地区分到县提高到42亿斤,县分到公社再提到62亿斤。据说金风书记压力很大,去年的大跃进,黔南在全省是属于中下游。

我把到几个县的情况向金风书记作了详细汇报。他说,他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都讲到了我所看到的问题。还说,全州粮食征购任务肯

定完不成,能完成八成就不错了。

在都匀市粮管所长会上听到的反映是,今年农村粮食的困难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普遍感到恐慌。

黔南之行使我增添了很大的忧虑,现在就有约四分之一的缺粮面,而且扩散蔓延开来的趋势很快。

2月28日 麻江

见到县委李、田二位书记,一直反映征购粮食任务压力太大,实在无力完成,同时农村缺粮需要返销,至少需要500万斤才能过得去。他们所谈到的数据和具体材料,我表示完全同情和理解。根子还是在粮食的产量上。

3月1日 凯里

州里还介绍,凯里是四县(雷山、麻江、炉山、丹寨)合一的大县,所反映的问题是已经有不少人往外流,有粮食问题,据说也有因坏人破坏。

在州委看到中央文件,批转广东赵紫阳调查农村瞒产私分粮食的情况,瞒产私分数额占到总产量的50%。各省都在开会、开展反瞒产私分。如果把粮食生产大跃进的成果寄托在反瞒产私分上,不尽适合各地的情况。

3月2日 贵定

县委余、冯书记介绍,沿山、平伐两个区粮食已经很紧张,有的断粮停火、有的只吃稀饭,严重影响到社员出工。和余书记到沿山跑了些社、队农民家里看,确实如此。我向县委建议,及早安排解决的措施。

3月7日

几天来,徐副省长急如星火,批评粮食上调任务完成不好。为完成中央安排的调上海粮食任务已经焦头烂额,和交通厅联系多次,始终由于汽车运力和劳动力安排不上,尤其解决不了农村集运粮食的劳动力问题。

3月9日

周林传达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毛主席说,现在各地党委与人民公社基层干部的关系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农村大闹粮食风潮,比1954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矛盾的实质是所有制与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带来的,造成这种紧张局面是由于“平均主义,贫富拉平”,“无代价上调劳力、物资”和“过多的回收历年农贷”,简单说,就是

“平”、“调”、“收”起了破坏作用。

毛还说,去年秋收后,人民公社对粮食采取了“深藏远窖,站岗放哨,以保卫自己的产品”。是否可以这么看,这也是农民反对“一平二调”和对付高征购的一种自卫行为呢?

3月15日

近几天听到不少反映,不是这里缺粮断炊,就是那里停火逃荒,叫人心中不安,究竟真相如何?实在没有把握,但我觉得丰收后我们过多宣传,在农村一律不供应粮食的方针,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

3月21日

胡崇山等几位厅、局长从遵义检查工作回来,汇报到那里的问题相当严重。粮食征购难以完成,近期闹粮荒风潮四起,以遵义、湄潭、桐梓较为严重,病人、饿死人事件不断发生。

3月24日

粮食征购任务32亿斤,入库进度还差6亿斤,再也没有进度了。徐副省长也感到再入仓的可能性不大了,也反映出粮食产量上有问题。

3月27日

和省交通厅研究2亿斤粮食上调的运输问题,他们的态度是运力极度紧张,钢铁是元帅,首先要保;木材、救灾粮也要保证,但汽车运力实在难以安排。

3月29日

许多省传来农村大量瞒产私分粮食的消息,可是在我省还看不到这类典型,各地区五级干部会上也看不到这材料,周林书记在省六级干部会上也讲,我省存在瞒产私分的严重情况,到处有“粮食让大嘴老鹅吃掉了”和“捉鬼拿粮”的传言。真相到底如何?我看不宜把情况估计过重。靠反瞒产来度荒将会落空。

3月31日

农村严重缺粮,各地告急电报不断。晚上省委召开地、县委书记电话会,徐副省长当机立断,宣布一条坚定明确的政策:“凡是发现有缺粮的地方,一律要先供应粮食,然后再去摸清情况。千万不要因为在摸清情况上贻误时机发生饿死人的事件。”这个口子一开,对减少出事具有决定意义,工作主动,但原先安排的3亿斤返销粮,肯定会突破。

4月3日

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已经开了3天,从各省汇报的情况看,是一片叫喊声。粮食的购、销、调、存都处在紧张状态中,为建国以来所未有。许多省的农村出现不稳定的局面,情况并不比贵州好。湖北有几万人逃荒,食堂已经办不下去了,下放到户的十分普遍。

各省发言中对密植都有一肚子的气,种一亩小麦要下五六十斤种子,浪费相当惊人,完全是违反科学的瞎指挥。余杰部长发言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我汇报压缩销量时,谈到压缩酿酒用粮,余部长马上插话,茅台酒用粮可不能压啊。

4月10日 北京

陈国栋部长传达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精神,毛主席说,粮食紧张,谁叫你们吹大牛皮呢?十年之内不准谈粮食彻底过关。李先念说,要闯过4、5、6、7、8月大关,埋头苦干,准备生一场大病过难关。陈国栋部长说,1958年粮食工作有两条沉痛教训,一是征购粮食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太乐观了。二是把话不要说满了,牛皮吹得越大,困难越大。

4月14日 北京

临散会时,部长找我个别谈话,动员贵州在第二季度争取超计划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还说,前天晚上毛主席对李先念副总理说:“抓粮食调运要像打仗一样,每天要掌握进度,第三季度要度过难关。”我对赵部长说,现在我们到处闹粮荒,已经发生死人事件,上调任务难保,超额无望,贵州日子难过。

4月23日

党中央发给省委和粮食厅党组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各级党委当前必须把粮食工作当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粮食工作上实行更加集中的领导原则,实行统一调度,农村粮食供应只能在重灾区和经济作物区,在城市除保证重体力劳动者必不可少的供应以外,一切可以压缩的销量都应坚决压缩下来,各省上调粮食任务的调拨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必须保证完成……”电报重点极为明确:第一,粮食高度统一集中;第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中央给一个省厅局党组直接发电报,从来少

见。

4月26日

看到4月2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切实压缩粮食销量的指示》，要求把城市销量在当时的基础上压缩十分之一左右，同时合理压缩农村粮食销量，为了集中力量应付这个时期的困难局面，各地对中央下达的粮食调拨令，必须坚决完成。

4月30日

中央交通、粮食、铁道三个部联合召开电话会，强调保证上调中央粮食的运力安排，这项任务要提到党委当前工作的重要议程中。铁道部部长说，运力安排以钢为纲、以煤为纲都要服从粮食运输，尽最大努力保证上调和出口任务的完成。

5月1日

五一劳动节，普天同庆，北京50万人大会，贵阳6万多人大会，大张旗鼓地总结1958年大跃进、鼓干劲，争取1959年更大的跃进。晚间，大街上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可是商店里糕点、水果等所有能吃的副食品货柜上却是空架子。用外强中干来形容也是可以的。

5月3日

徐副省长从北京打电话说，中央安排我省第三季度上调粮食1.5亿斤，要如数完成。我是存在侥幸心理的，心想能拖过去就拖过去，谁知中央并不放过。

5月17日

在地区粮食局长会议上，清理了各地区粮食库存的大账。汇总起来各地区汇报的数字使人震惊、担忧。

现库存粮减少了2亿斤；

夏季粮食收购有2亿斤无法完成；

粮食销量要求增加2亿斤；

上调给省的粮食要求减少2亿斤。

这么一算，到秋收9月底只剩2亿斤库存。

危急！危急！

5月25日

省委常委昨夜开会，徐省长传达李先念副总理电话会议精神，说当前食用油的紧张程度，除了没死人，不亚于粮食紧张。要采取非常措施压销，研究出结果，城市供应压缩一半，农村不供应

食油，保证出口任务的完成。

6月3日

周林、徐健生为出口食用油下了很大决心，命令我们连夜安排，指定由我亲自给各地委第一书记打电话，传达省委的意图，要采取紧急措施保证完成。

6月5日

今年夏季粮食产量已定为8亿斤，收购4亿斤，徐省长表示满怀信心。从最近入库进度看十分缓慢，我对产量表示有些担忧，也感到征购多了。徐却批评我右倾保守。

6月18日 金沙县

从县长邱继刚所谈的情况看，金沙县是全国有名的大跃进红旗县，农村出的问题反而严重，这是与浮夸风的严重程度分不开的。（注：据金沙县志记载，全县1959年总人口为33万人，1960年为24.9万人，减少8万多人。）

邱县长介绍用榨过油后的菜子饼做窝窝头的经验，我十分感兴趣，当即给徐副省长、李庭桂部长发了，建议大力推广。

6月20日 遵义

发现遵义不少地方为了完成夏粮征购任务，把农民留的种子都购上来了，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屡禁不止。

7月9日 大方

把长石、飘儿井两公社情况给县委书记杨本和做汇报，我谈到，要坚决制止在夏粮征购中，把留的种都收上来的做法。杨说，全县有40万斤种子入了库，顶了征购任务。

7月11日 普定

县委书记赵锋光一见面就强烈反映，500万斤夏粮征购任务，全党动员，全力以赴，才完成了300万斤，地委多次点名，现在实在没有粮食了。

8月4日

苗书记传达了周林同志在中央庐山会议让传来的电话记录，要反右倾、反松劲、鼓干劲，大战7、8、9三个月。这样，对180亿斤粮食产量又有希望了，比我们估计多出了五六十亿。

8月12日

全省财贸工作会（各地区财贸部长、粮食局长、财政局长参加）传达了中央指示，陈云说，粮食问题要靠政治吃饭，靠政治解决，李先念讲，粮

食就是政治。

会议总结讲话，徐省长再次肯定了30亿斤征购任务必须完成。

我参加遵义、黔南小组讨论中都说，很多县将中央李先念讲的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精神传达到了基层，讨论中大家表示的决心，就是不留种子，也要完成征购任务。这造成了极大混乱，将来必有后患。

8月26日

传来一个重大消息，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攻击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夸大缺点等等。

9月13日 仁怀

仁怀在征购入仓中问题也很严重，抢时间突击入仓，受灾减产的社、队也照样入仓。我去两个生产队，全是种棉花，也分配了征购任务。县委介绍中也讲到全县有5万农民种棉花也分配了100万斤粮食征购任务，已出现上午挑粮交征购，下午从仓库买粮吃。

虽然我所到之处，反复宣传不购过头粮的政策，似乎效果不大，不能不看到，征购任务压力太大的客观因素。问题还在上头。

9月15日 遵义

上午给四川粮食厅通话，他们压销的劲头很大，成都市居民每月口粮从24斤压到21斤，专区压到20斤，县、区压到19斤，熟食已全面收粮票。徐省长从北京来电话，向他汇报了四川的做法，他说要向四川学习。

10月9日

粮食部晚开电话会，陈国栋部长表彰了完成征购任务进度快的省区，四川省为全国第一，完成任务90%，会上介绍了经验，贵州完成28亿斤，也属较快的单位。

10月15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电话会，谭震林、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和讲话，中心是掀起一个以粮棉油为中心的农产品收购高潮，在政策许可情况下，尽可能多购少销，表彰了包括贵州在内完成粮食任务好的省份，我很担心征购入仓数字的真实性。

10月28日

近期来自基层的信息，反映购过头粮的情况

很多，铜仁的报告中说，征购完成后，农村留粮很少，不少地方急于完成入仓。大都是不顾政策，不顾后果，“先入仓再说”的论调。

11月13日

在庐山会上八届八中全会毛主席录音报告，听了一天。其中讲到当前市场紧张是，他说，“无非是妇女头发卡子、肥皂、浙江的雨伞买不到”。没有讲全面紧张的局面，如此轻描淡写，这符合事实真相吗？

12月17日 贵定

黔南来人反映贵定有浮肿病，甚至死了人。今天到了贵定，县委书记陪同去了三个公社，到队到户一看，的确严重，已发现有浮肿病人2700多人，已死亡100多人，县里对此似乎还不具体了解，也不敢正视，公社干部不敢如实反映情况，追问详情时，吞吞吐吐，怕受批判反右倾。这是一种加重后患的危险现象。

晚上梁书记陪同去新场公社，到新巴管区看了几十户，这里已经一个月不吃粮食了，包括公社书记、队干部家家有浮肿病人，有的已不能站立、走动。

12月19日

党中央召开紧急救灾电话会，彭真主持，谭震林首先讲话，特别强调了全国大搞代食品度荒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北京用槐树叶加工代食品的经验。采集槐树叶在北京已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讲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进京。彭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了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顾全大局保北京，并指令贵州紧急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当场表示态度坚决，即席部署，责成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保证完成。在我省浮肿病发展蔓延之际，迅速完成了粮食调运任务，为保首都北京尽了一份力量。

12月21日

把近期收到各地病人、死人问题的报告，综合向徐副省长汇报，他也深感发展蔓延严重，他明确了指导原则是，发现了问题，不要着慌，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强调统计数字，有问题立即拨粮，不要强调手段。这是他多次强调的，我是完全支持和坚决照办的。

下午给粮食部赵(发生)部长电话请示,贵州农村销售计划严重不足,请求中央增拨计划,赵满口答应,他说中央已经发现粮食减产购了过头粮的问题。

12月22日

收到修文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5000多人,已死亡500多人。贵州市委书记对县委书记痛骂一通。另据市粮食局反映,各县都有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的现象。

12月24日 贵定

周林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中央大力压缩粮食销售量的精神,他的意见,我省农村吃粮标准在12两基础上压到10两,城市供应也要大抓节约,减少销量。省委为此做了压销的规定。

12月26日

铜仁专区来人办事,我再三追问农村生活情况,很失望,一问三不知,明明石阡、德江、铜仁病人、死人严重,可是闭口不谈。看样子,好像有压力不敢讲。

1960年

1月2日

省委办公厅内参《贵州情况》刊登了各地农村断粮停伙、病人死人方面的内容。周林看到后,严厉批评说,粮食刚收不久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让办公厅做检查。我认为,这是与虚报产量及高征购有关,农民所剩口粮无几,过早出现断粮断炊。这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不承认不行,在党内通气,引起人们警惕,是有积极意义的。

1月3日

毕节地区粮食局长奉地委书记指令,一天打来两次加急电话,水城铁路上马,要上民工10万人,本地无力供应粮食,请求省里紧急调运大米1000万斤。上这么大的项目固然是好事,无疑也加重了眼前粮食危机的程度。

今晚黔南州李占文州长又亲自从瓮安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和粮食局长跑遍了全县的社、队,发现这里灾情严重,浮肿病人已发展到4000多人,死亡人数有300多。

2月14日

周林在报告国际形势时,也讲了一大段农村

生活。讲到,去年农村生活出了些问题,我们有官僚主义,死了些人。今年农村吃粮标准,四川是四四三(四两粮、四两代食品、三斤菜),我们是五五二(五两粮、五两代食品、二斤菜)。有些估产过高,我讲了多少次,等于放屁。就是不注意抓生活,不听打招呼。受灾地区要按十两(0.625斤)供应,按500万人、100天计算,有5亿斤粮食即可解决。

2月17日

遵义地区农村病人、死人问题相当严重,已成为很多干部的议论重心。特别是遵义县三合区的一个公社死了2000多人,更是出了名。有些人有质疑,为什么下边不报告?我认为不是不报告,而是不敢报。这跟反右倾、拔白旗大有关系,弄得基层干部顾虑重重,胆战心惊。

2月21日

读了一份中央文件,是李先念副总理给党中央的报告,李讲到,目前农村粮食问题有两种情况,一是资本主义势力大喊大叫不够吃,另一种是确实存在问题。干部怕反右倾而不敢反映。我对徐副省长说过,我们是对后一种情况认识不足,下边不反映真实情况的比较多。

3月8日

新华社《内参》转载:目前农村浮肿病人消息,湖北有28万人,江苏11万人,山东2.6万人,北京郊区也有发现。鱼米之乡的江苏也有浮肿病人,可能就是全国性的。湖北提出的口号是各级党委要“右手抓生活,左手抓生产”,第一书记要亲自抓生活。

3月10日

贵州省委2月24日给中央关于农村大办食堂问题的报告,把食堂提高到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毛主席看了很满意,亲自批转全国各地。批语说,报告写得好,是科学的总结,全国要无例外的照办。并由李先念副总理组织学习贵州的经验。

3月15日

遵义地区传来消息,全区已发现浮肿病人18万,已经死亡的有6万多人。但据多数人的反映,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3月27日

粮食部电话通知,国务院和李副总理决定,要在贵州召开食堂现场会,各省粮食厅局长参

加,省人委确定由秘书长张树成、史铭林和农委、财贸部、粮食厅负责筹备,开了几次筹备工作会议。政府办公厅负责接待工作。

4月13日

由国务院指派粮食部陈国栋部长,率领全国各省市粮食厅局长参加的粮食现场会,从4月3日至12日在贵州活动10天。周林亲自接见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镇宁的花江食堂、花溪大寨食堂、都匀全民食堂。评价最好的要算全民食堂了。

就在食堂会议期间,农村浮肿病还在快速发展蔓延,外省同志对我说,看到你们农村群众面色很不正常呀!

4月21日 合肥

全国财贸书记和粮食厅长会议上午9时正式开会,首先是李先念作报告,他讲完全国当前粮食形势后,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落实刘少奇同志指示,‘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要把这句话具体化,就是怎么管、怎么包”。当前的任务是要把人民公社的粮食管理好、使用好。

李副总理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公布的数字是5400亿斤,我看没有那么多,至少也在4800亿斤吧。(注:最后落实按统计数只有3400亿斤)

4月22日 合肥

各省书记们在大会上汇报了一天。

李先念讲,1959年的粮食征购任务1200亿斤,这么大的灾,又增加了100亿斤,这是犯错误。讲到购过头粮的问题,他说,事先要打招呼,不能购过头粮,但实际上难免,今后几年都难免,不要强调过分。我感觉,这么讲,不是开了个口子吗?

山东省委书记发言引起了共鸣,很有代表性。他说,上报粮食产量,上边一批评,下边就多报,生活安排不下来,他们也不吭气,人死了他们也不报,这是出问题的最大原因。各省发言,都讲了类似的情况。我省遵义死那么多人,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4月26日 合肥

国务院财贸书记会议的成果是,做出了生产大队统一管理粮食的决定,明确了粮食收、管、用各个环节的政策、制度。全国争论很大的问题就

此结束。对贵州来说,这不是个新问题,已有青海省就是这么做的。

5月9日

看了几份中共中央文件,都是紧急调粮救灾的。3月份李先念的报告中要求,各省省委把调粮工作当做一项政治任务。4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为京、津、沪、辽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抢时间把一切需要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集运外调,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这些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5月24日

省委秘书长褚振民通知,叫我下午3时去省委,参加向党中央工作组汇报灾情。省委向中央重点汇报了遵义、湄潭、桐梓等七个严重灾情县死亡3万多人的情况(之前,省委已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上述死人事件)。我只提了一条,请求中央在6、7、8这三个月停调贵州的粮食。

6月1日

遵义、湄潭等县死人问题,省委向中央请求处分的电报我看了一下。周林说过,我们不年年检讨了,请求中央少调粮食,我们死了人大惊小怪,别的省死人都不吭气。我也听到外省饿死人压盖子不上报这类消息。

6月3日

晚,粮食部开电话会,陈国栋部长向全国告急,京、津、沪、辽粮食空前危机,全国粮食库存只有240亿斤,比历年来都少。会上宣布了各省上调粮数。安排贵州6月份上调6000万斤,三季度上调2.1亿斤。会后立即向常委会作了汇报。会上冷场,大家谁也不表态。只有徐省长向粮食部大发雷霆,说,有粮不调是犯错误,调走了农村出问题也是犯错误,粮食厅算一算账,能调就调,将来出了问题你们负责。看来,省委向中央请求不调粮的电报一点作用也没起。

6月17日 桐梓县

何专员陪同,去桐梓检查了两个食堂(高桥和红光),在红光大队开座谈会一直到夜半三点,这里购过头粮的情况严重,农民往返背粮,劳民伤财。过去能挑120斤的,现在只能挑五六十斤,农民体质严重下降。

桐梓县长反映,现在干部不宣传“生产自救”,

自力更生”了,我们曾宣传过“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的口号,助长了农民依赖国家的思想。(注:新编桐梓县粮食志,全县因缺粮导致非正常死亡人口近4万人)

6月24日 习水

按赵副省长指示,到习水、赤水去一趟。

昨晚在桐梓住了一夜,听到议论最多的是在反瞒产中的强迫命令严重,捆绑、吊打成风。公社书记亲自上阵,动手打人,往下一级打一级,反不出瞒产就反右倾,情况十分惊人!

和耿唤民书记一起去良村、温水两个公社,看了六七个大队,一直没有发现反瞒产反出了多少粮食的情况,对此我是没有多大信心。温水特别是妇女患子宫脱垂、停经有很多。

在良村,发现这里地、县委工作队有种倾向,就是只抓生产、回避抓群众生活。怕惹祸出事,承担责任,对食堂生活是一问三不知。

6月28日 赤水

县委汇报说,小麦征购任务太重,不少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留够,到小麦播种时,还得供应种子。

四川合江县九支区与赤水县一水之隔,想了解一下四川情况。去九支后区委书记说,今年小麦估产810万斤,实际只有260万斤,高估了两倍。现在就有三分之一的食堂断炊。他陪我去看了第三食堂,已有3天不吃粮食了,浮肿病、死人早已发生。我向书记建议,你们不要再等上边了,赶快供应粮食吧!书记很感激。我看四川管辖的地方不比贵州好。

7月29日

中央下达给我省的上调粮食计划:7月份2000万斤,8月份3000万斤,9月份5000万斤。这比原定的每月上调7000万斤稍有减轻,感到轻松了些,我们为上调粮弄得筋疲力尽。

贵阳市报告,粮食库存告急,只剩下1600万斤库存,请求省里急调,过去库存告急数是三千万斤,现在只有千多万斤,确实到了极限。

8月10日

周林书记从北戴河接连打来十多次电话,今天又说征购任务要按30亿斤安排,农民吃粮标准要从低掌握,按十两(0.625斤)、十一两(0.6375斤)掌握。按照周的电话精神,徐主持会

议把征购方案定了稿,农村吃粮标准规定:丰收地区十两、十二两,歉收地区按九到十一两。征购任务定为30亿斤,这显然是上边压下来的。还是一条大购大销的路子,不光主管部门,就是省委也无能为力。

8月15日

陈璞如副省长在粮食会议上作报告,主题是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和粮食销量。我一直认为,要压销,就必须从压人口着手,光靠堵塞虚报冒领搞不到多少粮食。祝恺然说,你不怕说你是否定大跃进吗?

周林在大会上讲了三点,一是坚决保证完成30亿斤征购任务;二是粮食收、管、用,计划用粮食局要十分抓紧;三是坚决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村第一线。压缩粮食销量,粮食是全党、全民的大事。我看到的情况是,各地对分配的30亿斤征购粮普遍感到压力太大。

8月29日

最近期间,贵阳市大街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欢送街道居民、小商小贩下乡的队伍,掀起了高潮。全市下放人数10万的任务如真能完成,不但少销粮食,还可减轻城市多方面的负担。(注:根据省粮食厅统计资料,全省由国家供应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1957年为163万人,到大跃进的1958年猛增到259万人。为了度过困难,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到1962年已经压缩到180万人。)

9月1日

在省委三千会上,周林书记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李富春讲话,强调自力更生、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强调化气为力(注:化气为力,我理解大概是中央已经看到了干部群众都有怨气的情况吧)。在这次会议上,降低机关职工粮食供应标准,将原有的27、29、31斤三个标准统统降到25斤,贵阳城市居民降为24斤,地、县城镇居民降为22斤。农村吃粮标准,先是降为十两(0.625斤)大米,在大家强烈反对之下,又决定改为十二两。

我看到会上不少人在小组讨论中对大跃进一肚子气,对“一个指头”的错误提出质疑。对化气为力议论纷纷。

10月18日

贵阳市各机关、团体、居民,组织起来采摘加工青冈子,已形成了群众运动,成为代食品的一

种主要原料。

省人委成立了从省到县的“小秋收”办公室，由粮食厅、供销社负责组织采集一切能做代食品原料的野生植物。

11月1日

粮食部今晚电话会上，大讲采集代食品度荒的措施和经验，讲到北京机关、学校已形成群众运动，把槐树叶子都采摘光了。谭震林副总理命令晋冀鲁豫辽五省重灾区每个县派一人到北京学习吃树叶的经验。

11月23日

当前贵阳市的省、市机关干部浮肿病快速增长，贵阳市报告已有4万多人，机关正常办公已经受到影响，弄得人心不安。省粮食厅是管理粮食的部门，目前也有50多人患浮肿病。只靠每月23斤粮食定量，蔬菜、代食品不足，就连我家6口人中，浮肿就有4个。

12月3日

据三干会上披露的材料看，以遵义、湄潭、桐梓为主的遵义地区，以金沙、水城、织金、毕节为主的毕节地区，死人已经不下15万之多，全省少不了有几十万。

12月9日

三干会开了20天，周林在总结讲话中作了沉痛的检讨，说在粮食问题上，省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本问题是浮夸风、高估产造成的恶果。一是粮食政策被迫采取了多购多销，去冬今春，遵义事件、金沙事件集中地暴露了；二是大量收购过头粮，造成生活安排困难；三是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天大会发言的地委书记无例外的检查浮夸风、共产风的严重后果。

会议对李苏波（遵义地委书记）作出撤销一切职务、孟子明（毕节地委书记）撤销地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

12月11日 毕节

今天看到一份中央绝密文件，内容是批转山东济南、河南开封城市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浮肿病不仅贵阳有，外省大中城市机关、居民中都有类似情况。

12月12日

周林亲自主持省委生活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徐、陈、戴、何）主要是研究解决贵阳市粮、煤、

盐、副食、蔬菜全面紧张的问题。浮肿病一天天在发展，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贵阳赵克强市长说，浮肿病已发展到1.5万人，可能还不止。人心惶惶。

12月13日

中央决定，调整贵州上调中央粮食任务，由原定（1960年）的5亿斤下调到3亿斤，实际减少2亿斤，留一亿斤做省里机动。向中央多次强烈反映要求减少上调的呼声，也许引起了注意。精神压力随之减轻了许多。

12月18日

周林书记为农村生活接连开了两次电话会，批评了有些地方在粮食严重困难面前低头、退却，有些人焦急得无法。这几天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多得我看都看不完。黔南州电报说，有一家人四口上山挖榔巴，全死在山上。有一户，六两（0.375斤）粮食吃不饱，全家三口上吊自杀……

12月24日

开会时遇见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他说，金沙县委书记赵某某已被抓起来了，弄虚作假、反瞒产、强迫命令、捆绑吊打和死人相当严重，行为极其恶劣。他还是被树起来的大跃进全国标兵、模范人物。（注：金沙县饿死人数，有人说8.5万，有人说为不止）

祝（恺然）部长说，他看到中央公安部的通报，各省死亡人数都很惊人，其中就有贵州死亡50万。

12月27日

据生活办公室收到的报告，各地发生有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连贵阳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大家最担心会发生更大的抢劫粮食仓库的事件。对各地聚众抢粮事件，中央已有明确的处理方针，即“先分是非，后分敌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更正

本刊今年第5期第15页左栏倒数第16行“中国青年报”应为“风讯台”，第18页左栏倒数第2行“过程”应为“过称”。

为何“耀邦不愿动华国锋”？

• 胡德平

“耀邦不愿动华国锋”。这是杜导正记录赵紫阳说的一句话。我相信赵这句话不会有假，赵对胡态度的判断也是准确的。赵紫阳更为完整的话是这样说的：“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

但为何胡耀邦不愿动华国锋呢？胡耀邦基于什么考虑而“怕自己来接”华的职务呢？人们对历史问题，总是希望能透过层层表象，看清问题的真相和本质。为此，历史学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哪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只要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联系能趋于最大的一致。本文想对上述史料再做些补充和说明，从而进一步探讨胡耀邦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背后的思想活动是什么，揭示出这段真实史料蕴含的历史真实性。

赵紫阳当时说这句话的背景是：1980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舆论，认为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如宣扬个人迷信，坚持“两个凡是”，影响老干部的解放使用，要对“洋跃进”负责，甚至一些党内老同志还指责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有的同志对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毛主席遗体身边的八人合影竟一时糊涂定性为“八人帮”。总之党内的舆论非常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则缺乏分析，一小部分则是极端的情绪之词。但形成的主流意见则是华国锋党中央主席的位置应该变动一下。如何处理这个尖锐问题，人们期待着党中央的决策。赵紫阳说，叶剑英不赞成动华国锋，他和胡耀邦也不赞成动华。但赵也很遗憾，他对当时的情况已记忆不多，对此他说：“可零星回忆，主要是前几年没有留下东西，有些忘了。”

对华国锋功过的评论，不是本文的主题。本

文是想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对赵紫阳叙述过于简单而没有讲透的问题，作一注释，以防歧义。当然更多的也是想为胡耀邦当时的思想理念和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道德人品，也作一个注释，以备历史的查询。

人类的历史是客观的社会进程，历史不能复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科学。历史科学若不建立在真实的史料之上，不是用史论结合的方法，而是想用“以论代史”的方法说明历史，那就只能深陷在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中，那么历史的挽歌就不能引起人们的伤痛，而历史的颂扬也不能唤起人们的信心。

1980年年末，随着党内对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反对声音的高起，胡耀邦又成为接替他的主要人选，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1980年11月23日晚，父亲下班回家。那天，他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篇话，题目是《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父亲问我听到这篇讲话没有？不知怎么，我突然联系到华的去职，很可能由他替任的问题，我当时很冲动，脱口而出：“你难道在当主席的问题上，也想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我不同意你任此职。现在是你最据有优势的时候。”（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我说的“此职”，即指党中央主席之职。我所以说父亲现在是他“最据有优势的时候”，那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生产目的大讨论，平反党内外大量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摘帽之后，那时的政治局势，是上有老一辈领导人掌舵，下有人民群众的拥护，父亲又是中央常委、党的总书记，这种条件正是他为党为民服务做事的大好时光，华国锋同志即便不做主席，也应由老一辈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担当才妥。

胡耀邦之所以不赞成动华国锋主席的职务，

还有他一些更深的想法,他认为动华而引起的人事变动,不是一件小事,甚至还是一步险棋。他说:“新的考虑,我认为是步险棋,我、赵、胡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并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1980年10月12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和赵(注:是赵紫阳无疑)、胡(注:应是胡乔木)想法不完全一致,那么胡耀邦有些什么具体想法呢?他说:“我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认为我在主席团中也不合格……在这样的位置上多做工作。”(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这一设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过,但未被接受。六年后,未曾想到赵紫阳也向胡耀邦提出过这类建议:“在谈话中,还向胡提出个设想,可以考虑今后不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担任主席,譬如说每人半年,主持全党工作。”

所以在1980年12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议决是否向党的六中全会建议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时,胡耀邦并未参加投票,而是提前出京到湖南,名义上是解释几次中央有关会议对华国锋问题的讨论意见。

当月27日晚,父亲和军队干部谭友林谈话完后,又找我谈话,提醒我和德国一名历史学者交往的言谈举止要多加注意。借此机会,我又问他“有关党的领导还有无更改的希望……我不希望它成为现实”。父亲似乎又高兴了些,他的谈话,我是这样记录的:

他说还有希望,没有最后定,还可以再做工作。他认为最后(注:“后”字应为“好”)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1980年12月27日胡德平日记)

说到他本人,胡耀邦接着说:

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同上)

大家知道,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六位常委,那第七个人是谁呢?不言而喻,在胡耀邦的构想中,非华国锋莫属。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我知道他找了很多党内同志讨论此事,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他都为此构想努力。这些史料既印证和补充了赵紫阳的回忆,又能较好地解释为何他对华国锋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思想根源,他对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也坦诚表明了他“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的心愿。

当时,胡耀邦对华国锋之所以有这种态度,还有一段宝贵的历史原因可供参考。即1962年年底至1964年上半年,胡耀邦和华国锋共同在湖南湘潭地委工作,共同领导了那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俩人不论职务的高低,合作得很好。他们都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一次教育运动。评论运动合格不合格的标准,主要是看紧张的干群关系能否得到正确处理,农业生产能否有一更大发展,农村社会能否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俩人还都以毛泽东的学生互相勉励,1964年春,俩人和湘潭地委的部分同志还集体上了一次井冈山,到了黄洋界和“朱毛”当年生活过的居处。这一期间毛泽东还亲临长沙两次,找他二人座谈“四清”问题,并牢牢记下华国锋的名字。

因此,对华国锋在党中央主席位置上的去留问题,胡对华也有批评,但他不赞成说华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不赞成说华是“坐飞机”上来的。他说:

“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

胡耀邦对华以上的评述并不是全部内容,现在历史也要对胡的评述再做评述,但胡对华历史的介绍我认为还是公正的,因为对华认识的这一底线,有很多人并不认同,否定这些,我认为对党的事业非常不利,对华更不能丑化!

这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选的变动距今已有30年了。我愿根据我所知所记的材料,将赵紫阳回忆的这一史料补充得更丰富些,把史料背后胡耀邦的思想活动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当时,胡耀邦不愿把人事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能够一分为二看待华国锋同志,在华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他希望华能继续留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并提出改中共的主席制为主席团制。这都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表现出的眼光和品德。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做得不足不够之处,或有什么缺点,那我认为,就是他已经看到这种人事变动是步险棋,但没有更多强调这步险棋如不加警惕,也有酿成更大损失的可能性。再有,他既然提出了党中央的主席团制度,为何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公开讨论一下这一制度呢?

历史,我说的是当代史,往往二三十年就会有一次史料信息的大爆炸。我当时的态度、意见,现在仍然健在的邓力群同志也清楚,如他愿意,也可为我作证。我认为,史料的真伪及取舍一直是历史学中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激烈斗争的一个领域,一个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科学就是对社会发展问题,知其然又能必须知其所以然的一门社会科学。

(责任编辑 吴 思)

代购代邮

《烙印》——“可以教育好子女”的集体记忆 1949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打击,有的被迫害致死。他们带着屈辱和创伤生活在那个年代;他们被施以暴力或遭受凌辱;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使他们因家庭关系在政治上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历尽坎坷……

本书分别记述了他们不同的身世故事,表达了对抗遗忘的集体意志和社会变革的共同渴望。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本书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具体到中国,对于正在崛起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在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式、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揭秘、蒋介石日记解读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2006年3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作者阅读了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对于人们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是必要的;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是必要的。

北京市内乘车路线:公交车13路、21路、32路、65路、68路在三里河东口站下车,西行50米路北,西华饭店院内。

联系电话:010-68532048,68539058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我与《第二次握手》	张 扬	32.0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张闻天图册	张培森主编	260.00	10.00
张闻天在 1935~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张培森著	20.00	6.00
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	吴 思	38.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38.00	6.00
丁玲在北大荒	郑笑枫	2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张 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吴江文稿	俞可平主编	200.00	18.00
李昌传	周士元	68.00	8.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	刘 刚 李冬君	58.00	9.00
1978 大记忆	苏 峰	35.00	7.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7.00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	39.80	8.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的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 1957 年	和凤鸣	29.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于光远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李桂兰译	26.00	6.00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20.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批评性报道的“送审”制度曾被取消

• 戴国强

《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刊登了《重温〈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一文,该文清楚而又详尽地告诉读者: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党刚刚执掌新中国的领导大权的时候,为预防胜利后骄傲、掌权执政后腐败,即放开了对各级领导者的舆论监督的限制,号召人民群众公开地自由地批评党和政府的缺点和错误。60年前我们党中央这个英明《决定》,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对当前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决定》是强化舆论监督的法宝

从这个《决定》当年的产生背景看,主要是预防性的。60年前,我们为巩固新中国政权,跳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历史周期率,就决定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对党政领导的缺点错误通过报刊进行公开的批评揭露。这个《决定》是1950年4月19日发布的,就在发布的当月,《人民日报》即收到读者批评性稿件1674件,比3月份增加了一倍,可见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对领导者监督的积极性之高。从1950年到1953年间,《人民日报》和各地报刊,每天都可见到一篇又一篇的批评性报道,三年中仅《人民日报》就刊登34243篇,平均每天刊发的批评报道即超过4篇。

我们党执政初期,还是党风较正,社会风气较好,干部廉洁,党和群众关系也较为密切的时期,党中央就认为放开对舆论监督的限制,允许新闻媒体公开批评党和政府缺点错误,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了。那让我们看看现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虽成就巨大,人民生活也有极大改善,但是党政领导官员中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比比皆是,日益

蔓延。在这样的情况下,像《决定》那样放开舆论监督,不是更有必要吗?

令人不解的是,党中央在60年前发布的那样重要那样正确那样英明的《决定》,为什么后来就很少提起了呢?甚至被淡忘了呢?很显然只有把“为民谋利”只放在嘴上的官僚主义者才害怕这个文件!这样一个纲领性的重要文件被淡忘,被掩埋,不能说这同既得利益集团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日益恶性发展没有关系。不是吗?不知从何时起,有人把新闻媒体的批评报道,就定性为只能起消极作用的“负面报道”,这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说这种话的人,难道忘记了在几十年前,在中央《决定》的号召下,《人民日报》和各地报刊每天都可见到的批评报道后,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衷心赞扬,不仅没有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反而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就是现在,报刊上每刊登揭露批评大小贪官的报道,也都从正面起到了增强信心、密切党群关系的积极作用。

《决定》不仅阐述了在报刊上公开对党政领导者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巩固新中国政权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而且还对如何保证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顺利进行,对党政领导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的具体方式方法,也作了若干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其中最关键的规定就是批评报道无需经党政领导审查就可刊用,新闻媒体及其记者、编辑有独立自主的刊用权,由媒体及其采编人员对他们所刊用的批评报道的真实性、必要性负责,也即“文责自负。”可是,到了1999年,竟又进一步颁布了一个新文件,明确规定了即使媒体的内部刊物刊登反映问题的内部报道,也要先征求省一级的“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也就是必须送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一级党政“一把手”审查。现在包括新闻界在内的各行各业,莫不强烈要求,必须对

各级领导层中日益严重的贪腐势力加强监督。尤其是加强其他监督不可替代的舆论监督。因为舆论监督一能“通天”，二能曝光，那些干了许多坑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坏事的贪官赃官们既想保帽子又怕丢面子。

批评性报道的送审制度害多利少

1950年4月19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是迄今为止，由党中央发出的唯一的一个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批评报道的专门文件，到现在还未发过第二个这方面的文件。因此，《决定》所提各项要求，至今仍然有效，应该坚持执行。可是，实际上，官方的态度和看法同《决定》精神相悖。在我一个记录本上记载着当年传达的《厅字1999年11号》的文件，是转发中央某大新闻单位对主要反映党政领导“问题”的内部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其中一个问题谈到：记者采写的打算反映的问题如涉及全省或全市全区大局的稿件，要征求各省（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等等。这等于说，反映问题的稿件，当然包括批评报道，凡涉及“全局”的都要送给省一级党委和政府的“一把手”审查。这个《通知》对内部报道都有这样的要求，对报刊的公开批评报道就更不在话下了。何况所谓“全局性的问题”又如何界定呢？

早在几十年前党中央就明确取消了对批评报道的审稿制度。《决定》说：“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这就是说，报刊在刊发批评报道时无需经过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审定，而是由报刊独立地、自主地确定是否可以或应该刊发。而且《决定》还指出：“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 and 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是害多利少，不对的。”这里已把取消对批评报道的“送审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清楚了。

实践也证明，那个对批评报道要审稿的“通知”下达后，确实是害多利少，最突出的问题是言路被堵塞了。那个有名的内部报道中有分量的东西也大大减少了，记者、编辑们采写批评报道的

积极性也大大下降了。许多应该及时反映的重大问题，也没人愿意去调查了。有的虽已写成稿件也送审了，却被长期扣压，连索要稿件都无人敢出面。事实上，不取消对批评报道的送审制，就无法发挥新闻舆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应有的监督作用，而舆论监督恰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不可缺少的，也是其他监督不可替代的。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曾在某媒体当记者。那时期，应该说是新闻单位自主权较大的时期，是“文责自负”的“黄金时代”。那几年，我就报道过几次在现在无法报道的批评报道：一次是，当时的省委“一把手”，因年纪大了，思想较保守，对经济改革百般抵制，特别坚决地反对农业大包干，全省从上到下都希望更换“一把手”，我通过内部报道反映了，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如当年有审稿制，就报道不了。紧接着，中央要求这个省用召开省市县四级干部大会的办法，民主推荐“一把手”，在民主推荐票数刚统计结束不到两小时，我即通过内部报道把当日民主推荐情况反映到中央了。可是由于老“一把手”对推荐结果不满意，想私下更改后再发中央，可是来不及了。如果放在如今，审稿制也就成了及时如实发批评稿的障碍了。这一类的事例还可以举很多，就不赘述了。不过从利与害来讲，就是上述几个简单例子也可看出，不取消对批评报道的审稿制，对舆论监督进行限制，堵塞言路，确实是害多利少呵！

应当让《决定》在当前的反腐斗争中发挥作用

党中央在建国初期，就重视反腐倡廉，就作出了加强舆论监督的《决定》，那为什么几十年后的今天，贪污腐败却那么严重了呢？只要翻翻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清楚了：那就是我们在前几十年未认真坚持按《决定》的要求办事，未坚持执行《决定》！不是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党和政府虽然也不断地号召反腐倡廉，每年也能惩办若干大小贪官，可是贪腐势力仍在恶性发展，仍在不停地蔓延。原因何在？集中起来就两条：党政领导的权力太大，特别是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一把手”的权力太集中太大了；二是缺乏有效而有力的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被削弱了，被限制

了。调查资料表明,凡贪污腐败的易发地区(包括重灾区)、易发领域或单位,以及易于产生贪官的高危岗位,几乎都集中在煤、气、油、矿比较集中的地区,集中在管钱管人(包括升学和分配)管物管土地管工程(包括房产、交通)等领域和部门的掌权者,至于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虽不断加强,但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这个弊端,已是人所共知。谈到舆论监督,我们自己及港台经验也

都一再证明,其在反腐斗争中有着其他监督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肯定,现在只要能按《决定》的要求办事,这个《决定》就可以成为反腐倡廉最锐利的武器之一,可以在反腐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吴 思)

新书介绍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历史研究,贵在真实。

本书全面系统论述了国共关系的发展,深入细致地研究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文章使用了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和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论述严密,多有创见。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看,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实际上

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并授予重要职务的,到底是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容共”的争议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政策建议,或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也不能简单地断言孙中山决定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予以重用,是因为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这些争议均不全面,涉及这一问题的争论,作者准确地以孙中山的言论,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马林”路线的失败,孙中山的希望与两难,国共两党的困惑与尴尬,孙中山与弹劾共党案以及孙中山的去世及影响的深入分析,对了解此后国共关系的深入发展和破裂的原因显得格外的重要。

1924年,国民党成功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这一发展,毫无疑问从孙中山坚持的“容共”政策中获益良多,但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在不足10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自身组织竟然接连三度发生严重分化。除了种种特殊的原因与背景,毋庸置疑都与国民党内部在“容共”政策上久已存在的意见分歧有关,围绕着“容共”政策的利弊得失,是“容共”,还是“分共”?从国民党党内分化之缘起到党内反对派的首次抗争,戴季陶的转变与廖案的发生以及西山会议派的结合及影响,这些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1927年蒋介石最终下决心走向“清党”的道路。

国民党自发生西山会议和另立中央的重大事件后,1926年3月20日发生在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

二〇”事件,使国共关系遭遇了剧变,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包括蒋介石主张“师法”苏俄,曾一度赞成“阶级斗争”,蒋介石赞成联俄到“联”共,在护党与联共的矛盾中蒋介石走向“三二〇”之路。

“三二〇”事件的直接结果,是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并开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权力。然而,事件的发生和法案的通过是否注定要发生“四一二”事变呢?或者这种和平限共方式是否必定会导致武力“清党”的结果呢?文章从限共主张的提出背景,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迎汪、拒汪的较量,蒋介石与共产党人在“扶助农工”问题上的分歧,双方权力斗争的全面发酵至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4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布《清党布告》,宣布了与共产党决裂的决定。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其矛头所指首要是共产党,其次就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在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公开通缉“共产党首要”197人的名单中,赫然列出当时在武汉的著名国民党领导人徐谦、陈其瓌等人的名字。反共扯上武汉国民党人,理由是认定这些国民党人已与共产党人同流。无论事变前或者事变后,武汉国民党人的确与共产党人同仇敌忾,甚至开始把之前的“容共”变成了实际的“联共”政策。宁汉之间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的这种对立,只持续了不过三个多月,武汉国民党人也走上与南京国民党人同样的道路,宣布“分共”。

南京国民党开始了的“清党”运动,其最大的特征就是“血腥”。它开创了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

国民党的“清党”,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随着共产党人开始举起武装暴动的旗帜,国民党就不得不各地疲于应付。因此,“清党”运动很快转变成持续的镇压行动。这种镇压从最初的集中在城市实行的“白色恐怖”到逐渐转入偏远乡村进行的“剿共”,双方互报之以血腥和暴力,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年之久。

本书还以以下内容:国民党以政治的方式解决“共党问题”;抗战开始后双方妥协与磨擦;皖南事变及其善后问题;国共两党攻防态势的转换;抗战结束前后的和战选择;战后国民党人的反共困扰;阻止内战的最后尝试;四平战役与内战爆发;从“戡乱”走向崩溃;国民党对中共的最后一搏;等等,章节来为读者解读国共关系。

以客观的立场、第一手的史料,开阔的历史视野来了解民国史。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刘顺元和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的交往

· 马懋如

刘顺元和胡耀邦本不相识,他们虽互知其人,却从无往来。“文革”结束,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关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一次讲话,引起刘顺元致信胡耀邦,说:希望见面一谈,本人无车,请派车来接。胡耀邦看到信后,亲自登门,接刘顺元到家中叙谈。刘顺元和胡耀邦这才有了联系,且有共识。刘顺元在南京大学关于真理问题的一次讲话,引起胡耀邦的关注,考虑请他来京参加拨乱反正。

刘顺元的思考

“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重要领导职务的刘顺元,对党内没有了民主,个人专断,很是担忧,对林彪大搞个人迷信,极为厌恶,对毛主席喜欢林彪等人的吹捧,并重用他们,很有看法……他甚感不能说真话、实话,言不由衷之苦,不想再干下去了。当时党内高层一些老同志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分歧明显,形势严峻有同感。深知刘顺元的同志,有人劝他少讲话,有人劝他早点休息算了。1963年9月,刘顺元向省委请病假,谢客,闭门读书。

“文革”来了,倒行逆施,全国大乱,江苏也不例外。红卫兵包围,省委无法正常办公,被迫转入地下,省委一位领导彭冲同志被揪斗、关押、受辱,著名教育家吴天石夫妇被毒打、摧残致死;曾经和刘顺元在国民党监狱共患难的老战友王范同志抗拒“文革”,举枪自杀,以死进言毛主席,他指出“现在通行着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刘顺元悲愤之极,先后两次昏倒,他忍无可忍,又无能为力,感到活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准备服安眠药一死了之。幸被夫人鲍有荪发现,对他说:你不能死,你曾经负责审查的上千出狱难友,无人证明,他们怎么办?刘顺元这才打消了死的念头,活了下来。刘顺元电报中央,要求彻底离职休养,他搬到乡间,准备盖两间茅屋,读书、种菜,度余生。

事隔不久,茅屋还未盖,刘顺元被揪回南京,游街、批斗、入狱,和省委书记同事们共难十年,无自由、无人权!

多年来,刘顺元一直思考着“文革”的发生,“四人帮”出现的前因后果,他重读马恩列,研究“文革”,研究党内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他格外关注国内外、党内的形势,每天不仅注意收听中央台的广播,看国内报纸,还收听英、美、日等外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多方打听邓小平等老同志是否出来了。他对毛主席最后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不放心。他说:“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的批示),一个人放心不行,要看老百姓放心不放心,我就不放心。他对“一举粉碎”中的华国锋是肯定的,但是,他认为单靠华国锋恐怕解决不了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问题,毛主席定的事要否定,他可能没有那个觉悟,也没有那个胆量!党的十一大召开,他满怀信心,高兴得买鞭炮准备庆祝,听到会议公报后,不放了。他认为放鞭炮为时过早,纠“左”谈何容易!小平同志主政,他感到有了希望。

刘顺元和胡耀邦相见叙谈

刘顺元得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讲话中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



晚年刘顺元

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刘顺元对夫人说:这就是说,毛主席批的冤假错案也要平反。他认为这个讲话冲破了“两个凡事”的禁区;他感到拨乱反正、纠“左”有了希望,他钦佩胡耀邦的胆识。

1977年12月,刘顺元出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78年2月,刘顺元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并到阜外医院检查身体、治病。这是他15年来第一次来京参加会议,他的次子(我爱人)在北京工作,和蒙难多年、久别的父亲相聚,谈得很多。老人对时政,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非常关心,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总结“文革”的教训,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振兴中华之大事。他赞扬耀邦同志的大智大勇,很想和耀邦同志见面一谈。果然,他致信耀邦,与耀邦同志相见,一席谈,找到了知音,更加高兴。可惜此次谈话没有记录。我们只知其大概,谈的是有关中兴党的事业的大事。幸好丁群同志所写《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439页上有一段文字,记载了这件事,特抄录如下:

“他是一向坚持不到中央领导人家里串门的。以前他多次去北京开会,连在淮南共过患难的刘少奇,也没有前去登门拜谒,以避讨好上级之嫌。可是1978年2月……他却主动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希望与他面谈一次”。

“胡耀邦以前虽然没有与刘顺元共过事,但是也知道他是一位忠实耿直、识见过人的老革命家。他接信后不是派驾驶员,而是亲自到京西宾馆来看望刘顺元,并且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深谈起

来。胡耀邦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正面临着‘光武中兴’的时期,希望刘顺元这样的老同志能助一臂之力。刘顺元说,他很赞赏耀邦同志敢于冲破禁区的胆识。不过‘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实践上的错误,而且是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要彻底拨乱反正,还需要破除迷信,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理论观点,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胡耀邦频频点头称是,说现在党内思想僵化的情况还很严重,要实现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还要待以时日,而且要找到一个使全党不致受到太大震动的契机。这次深谈增进了这两位革命家的互相了解和友谊。”

刘顺元在南京大学讲真理问题,胡耀邦极为关注

刘顺元回到南京后不久,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反响很大,分歧很大。广大干部和群众及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表示赞同;党内一部分高干、有的省市领导人认为是“砍旗”,有损毛主席的形象,表示反对;党内长期受极“左”思想禁锢,不理解、转不过弯子,或不敢表态的大有人在,就连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不介入”。此时此刻,刘顺元对夫人鲍有荪说:小平、耀邦同志把头提在手上反对“两个凡是”,我也该站出来讲话了。1978年9月初,刘顺元到南京大学演讲,这是他“文革”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从理论上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文革”的出现,发源于党的领袖的左倾理论观点,发源于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制度受到了彻底破坏,这种阴影至今还在中国上空徘徊。他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等口号,阐述了民主、法制等问题。讲话得到了南大师生的好评,受到了省里一些人的反对,认为有“毒”,应予批判。在场旁听的《光明日报》记者赤布认为,这个讲话很重要,对当时真理标准的讨论起了南北呼应的作用,立即整理记录送到北京,《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同志看后,认为这个讲话具有彻底的唯物主

义精神,急送耀邦同志,耀邦看后说,刘顺元把南方一些省的沉闷局面冲破了。耀邦同志四处打听刘顺元的身体情况,能不能把他调到北京来参加拨乱反正的工作。(见《刘顺元传》)当时刘顺元已是75岁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我们曾听说,有人建议他来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不久,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委他以重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1978年12月23日,刘顺元再次到南京大学讲话,与9月讲话基调相同,不仅重申了9月讲话中所讲的有关阶级斗争、民主与法制等一些敏感的问题,还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他说:“不能再搞穷革命了”,再搞下去“就不是穷革命,而是穷反革命了”。1979年2月2日,刘顺元离开南京前,在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的欢送会上讲话,比在南大的两次讲话,更深了一层。(后两次讲话见《刘顺元文集》)

刘顺元为什么两次到南京大学对师生们讲话,他是有考虑的。他一向重视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首先要唤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了,冲破“左”的禁锢就有了力量。刘顺元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曾有多次讲话,《刘顺元文集》中有部分收录。

刘顺元来京工作参加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为第二、第三书记。刘顺元来京工作,他被指定为中纪委五人核心小组成员之一,承担中纪委的日常工作。他参加了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审理“两案”的领导小组,和张启龙同志共同负责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工作。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他认为刘少奇案是“文革”中的最大遗留问题,对刘少奇的平反不宜久拖。他对刘少奇案、瞿秋白案、陶铸案等特大案件的平反做了不少工作。为党的建设,他不仅参加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制定,为“准则”的实施他讲话呼吁并身体力行。他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贯彻“准则”的座谈会上,大讲

干部制度中终身制的弊端,并强调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他立即上书,要求中央批准他离职休养,告别终身制。这是小平同志讲话后,中央收到的第一份主动要求离职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他离京回到曾经久居的南京落户度晚年,不参加政事,很少公开露面。

刘顺元和胡耀邦的友谊

刘顺元对当时以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为首的中央领导班子很信任,评价很高。他说:“不可能找到比他们还强的领导班子了”;“四人帮”粉碎后在这么混乱、困难的情况下,“中央领导不论是在原则上、战略上、措施上,稳扎稳打,步步前进”。他还说:“有话可以讲,那还是现在”。他虽年事已高,但很有信心,对形势很乐观。他给在京工作的次子写信说:“三中全会,中央领导格局定了,大局定了。我认为这已经是很好的局面,看来还可以发展得更好些。今后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搞四个现代化是没有疑问了。但实际工作仍会是复杂的、艰苦的……”他对江苏省社科院理论界的朋友们说:现在“正处在大转变的前夜,曙光在前,光明在前。时代给了我们责任,时代提供了我们活动的舞台,大家要踏踏实实地干它一番事业。”

刘顺元和胡耀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不谋而合,配合默契。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他很尽力。他常赞扬耀邦,说“他是一个好同志”,“我很佩服他”。在一些讲话中,常引用耀邦的观点。例如,1980年6月21日,刘顺元在贯彻“准则”的一个座谈会上,从耀邦所讲的制度问题、思想体系问题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他说,耀邦的讲话在“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解放,因为他从出现‘四人帮’的问题,联系到我们的制度,联系到我们的思想体系。”刘顺元根据耀邦讲的这两条着重讲了干部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干部是委派的,而且是上面委派的”,因而“干部的眼睛往上看,他不想往下看”,还是终身制,“一辈子做官到死”,“还跟上一个世袭,老子是干部,儿子也得是干

697人丧生的新疆61团场火灾

• 高 栋

1977年除夕之夜，地处祖国西北边境的新疆霍城县境内的兵团农四师61团场礼堂发生了一场惊天大火。火势凶猛，瞬间便夺走了697条活蹦乱跳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为少年儿童。从此，这个团场的街头几乎见不到孩子们天真烂漫的身影，家家户户与欢乐绝缘。

翌年夏，我来这个团场出差，离着老远就看到横卧在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三大片坟茔，人们说，这就是那场惊天大火的遇难者的墓地。眼前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除夕之夜，团场放映队在礼堂内放电影。在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当时，看电影的机会也很难得，听到消息，人们纷纷扛着椅子，端着板凳奔向礼堂（那时团场条件差，礼堂没有座椅）。由于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大人们都忙着准备过年的事，来看电影的大多是团部与附近连队的少年儿童。小孩子好动，放映中间倒片子时不断可听到鞭炮的炸响声。这时，有个小孩跑到舞台上放“地老鼠”（花炮的一种），而舞台上堆满了为纪念毛主席去世而敬献的花圈。突然间，一只“地老鼠”窜进花圈堆里，转瞬便燃起熊熊烈火。火焰很快“舔”到了屋顶的苇把——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农场盖房子大多采用密集排

列的苇把子做椽子，上面覆盖一层红砖，再浇上一层沥青。苇把、沥青都是易燃物，舞台顶部的大火迅速蔓延到大厅顶部。燃着的苇把失去了支撑力，覆盖其上的砖头噼里啪啦砸了下来，加上被烧化了的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的沥青雨点般落下，700多人的礼堂内顿时乱作一团。人们发疯般地涌向唯一的逃生通道——大门，而大门只开了一半，其余半扇据说是为了便于维持秩序早已用砖头堵死，至于那几扇距墙根一米多高的大玻璃窗也早被砖头砌得严严实实。求生的本能使人们不顾一切地涌向那仅有的半扇逃生之门，而外面闻讯赶来的家长又心急如焚地往里面挤，试图救出自己的孩子，这样，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通道变得水泄不通。事后，人们发现，死在门前的人垒起足有两三米高的人墙——许多人是被活活压死的。而大厅内的死者，多数是被顶上掉下来的砖头砸死的，被滚烫的沥青烫死的，被沥青燃烧后产生的有毒烟雾窒息而死的。在那些砖头砌死的窗户壁上，到处可看到残留的一个个血手印。

这场惊天大火发生后，据说外电很快就进行了报道，而我们内部却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对外宣称是“苏修搞破坏，阶级敌人放的火”。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人敢讲真话，更不

部”。他说：“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有严重缺陷”，“成了官僚集权制”。他还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方面的问题。他说：“要是耀邦同志不讲话，我看出了问题，也没有这个胆讲这个话”。他说：耀邦的讲话是“贯彻‘准则’的指导思想”，要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改善党的领导，端正思想体系，充实思想体系”。（见《刘顺元文集》）

胡耀邦对刘顺元很尊重、很关注，促膝谈心，委以重任。刘顺元告老离职后，一次耀邦到南京，在会场上没有看到刘顺元，特地请刘顺元到自己

下榻之处会晤，谈了一个多小时。1982年，离职后的刘顺元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场上，一个个点名询问老同志们的情况，第二个点名的就是刘顺元。他问刘老退下来以后干些什么？刘老回答：一读书、二下棋、三锄草。耀邦听了很高兴，连说：好好好！……

（责任编辑 李 晨）

敢触及火灾的成因。

对于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团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啻为天大的灾难: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个不剩命丧黄泉。活着的人悲痛欲绝,近乎疯狂,他们睁着发红的双眼四处寻找团场领导,而领导早已躲了起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团场的政委,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将其打个半死。那些侥幸没受损失的人家则大气也不敢出,悄悄窝在自己家里。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将心比心,谁家遇到这样的变故能不悲伤,不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死者家属作出一些过头的事情原本是应该谅解的,但当时的自治区领导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发来电报要求团场抓人。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头脑非常清醒,极富人情味,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电局局长,一位13岁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时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61团场大火后被派来兼任团场政委的马骥。他清楚地知道若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必定会引起更大的骚动,这中间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导火索,局面将越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经不想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立即面见当时的伊犁地委书记谢高忠陈说利害,又恳切地说:“老百姓太可怜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我们领导的体谅、帮助、关怀,即使关怀、体谅也弥补不了他们的损失。”谢高忠听他说得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平息了一场风波。

这是多么难得的情怀!须知这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话不当便可能导致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30年后,年过八旬的马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诗表达自己的心境:

旧事重提泪满腮,七百儿女入火海,
终生难忘悲惨事,常闻父老哭声哀。

如今,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说过的那些掷地有声的话仍言犹在耳,声震如雷。

2007年春节前,为纪念61团场那场惊天大火30周年,悼念死者,伊犁当地一家主流媒体报纸曾以两个版面的篇幅作了长篇报道。记得那天报纸上赫然印着八个大字:以史为鉴,警钟长鸣。然而,读罢报道却令人失望:记者只是就事论事

地记叙了事件发生的过程,并没有对火灾的成因及其教训作深层次的剖析。相反,通篇给人的感觉是都怪那个放“地老鼠”的孩子,似乎他才是酿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难怪那个孩子虽说从里面跑了出来,拣了条活命,但再也不敢回团场。

不错,火是由这孩子放“地老鼠”引发的,但那些堆积如山,一遇火星便迅速燃烧的花圈呢?没有这些花圈,莫说一个小孩,即使十个八个,放上成百上千个“地老鼠”也不会酿成这场夺走697条生命的大劫难啊!再如那防人如防贼的用砖堵门、堵窗户之举,倘门窗不堵,将会有更多的人逃生,火灾的损失也会减小。如今回顾那场让人痛心的大火,可供反思的实在太多了。

(责任编辑 李晨)

书屋 2010年第8期目录

- | | | |
|------|---|-------------------------|
| 书屋讲坛 | 当代教育的出路是回归,不是创新
——潘光旦教育思想的重新认识 | 李工
郝稷
黄江苏 |
| 史识佚篇 |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启蒙
再议知识分子的本分 | 姜异新
张宗刚 |
| 人物春秋 | 国学大师投袂而起
房谋杜断?
——论钱穆与顾颉刚的分野
“一饭之恩”和“一饭之仇”
严耕望评史学家陈寅恪、陈垣
不应忘记胡先骕 | 郑善庆
耿法
符本清
熊卫民 |
| 灯下随笔 | 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
时间与极权主义 | 王宏任
刘畅
狄马 |
| 书林折枝 | 《箫声剑影》读后
韦卓民生平与思想的真实记录 | 邓晓芒
陈金龙 |
| 流年碎影 | 和“窄而霉小斋”沈从文的交往
小报界的“教父”钱芥尘
不够知己
——一帧照片的往事
1968 惊魂万里 | 苏晨
蔡登山
黄永厚
杨昂岳 |
| 前言后语 | 《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序
民族的宝典 智慧的结晶
——《鲁迅箴言》读后
让《红楼梦》真正回归曹雪芹文本
——写在甲戌、庚辰校本终结版相继问世之后 | 孙郁
黄乔生
邓遂夫 |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关于“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

• 李锐

读了张素华同志在《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上的文章——《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觉得对待重要的历史事实，就得有这种认真的态度。我很欣赏张素华同志这种态度。不过，这篇文章还不能作为最后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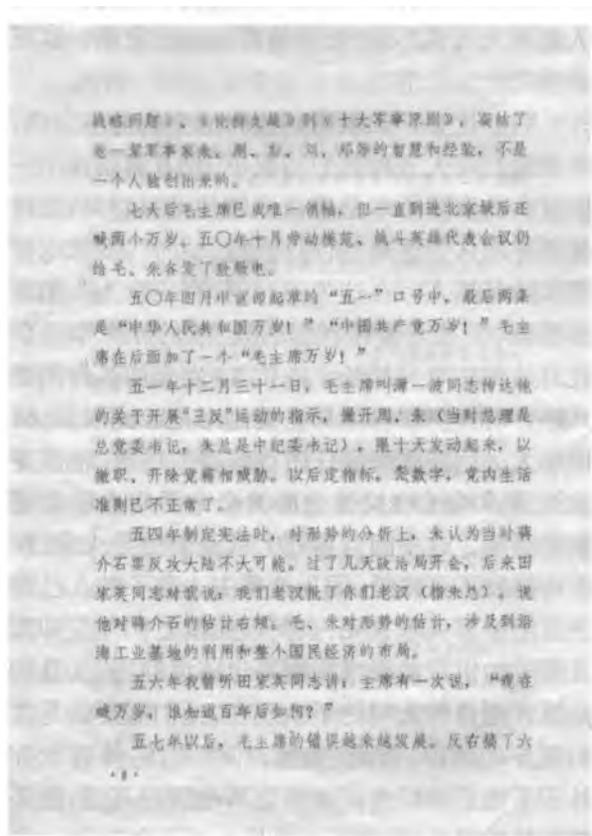
毛泽东自己在1950年五一节口号上亲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是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案时，朱德秘书陈友群亲口说的，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简报（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简报，第五组，第三十二号[1980年11月17日]陈友群同志十一月十四日的发言）上的，陈友群当年还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

据我了解，陈友群绝不是一个说假话的人；这件事情如此重大，他也应当不会有记忆失误。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的简报，也是很严肃的，是经过审查的。发表前要经过胡乔木把关。这方面胡乔木是个认真细致的人，他又是1950年五一节口号的当事人，陈友群的发言如果与事实不符，胡乔木应当是不会放过的。当年讨论决议时，我是国务院能源组的组长，《简报》上刊出我有关1959年庐山会议的二万字发言后，胡乔木即让我写一本回忆的书。

张素华这篇文章虽然提到了陈友群发言这份简报，但没有否定这份简报，而是否定了这份简报的内容。否定其内容时没有对简报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张素华以档案为依据。但我猜想，张素华看到的胡乔木的这个草稿可能不是最原始的。在这个草稿之前还有没有一个预备过程？在预备过程中，胡乔木和毛泽东之间还有没有过文字交流？这都需要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当年是要让人欢呼他“万岁”的。

附简报照片。



本刊扩版调价启事

为了刊发更多读者喜爱的文章，应读者和作者要求，从2011年1月起，本刊正文从88页增加到96页。每期定价8.00元，全年96.00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0年8月

“万岁”口号之我见

• 郭道晖

读了张素华先生的文章(《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写“毛主席万岁”》,见《炎黄春秋》第7期,以下简称“张文”),有几点看法,略述如下:

一、我所撰《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见《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一文中有关“五一口号”事,并非是张文所说的是“郭文所谓……”,即并非我的杜撰,而是转引当时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简报第五组第三十二号(1980年11月17日)所载陈友群同志的发言。他作为朱德同志的秘书,身处党中央机关,应是知情人,其对“万岁”口号的史实的发言,想必言有所本。此前,关于此事,在理论界史学界也多有论辩,可供读者比较辨识。

二、今“张文”亦言有所据,如所据档案属实,可供识者参酌。但据他考查的结果,也同时可证明,“万岁”口号正式纳入党中央的“五一口号”,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并默许的(档案上只有他对其他口号的仔细修改,未见他有只字对“万岁”口号的修改或否弃),表明喊“万岁”是经他批准同意的。

据张文,本来中宣部(胡乔木)最初所拟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还比较简单朴素;经刘少奇精心审改,加了不少装饰词,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奉上“伟大领袖”的徽号(比林彪后来恭奉“四个伟大”要早20年左右)。对此,毛泽东不置一词,欣然默许。对照他在建国前夕纪念党的生日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开头所讲的:“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国家权力和党最终都会“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共产党也不可能“万岁”;可不到一年,就同意在“五一口号”中喊自己“万岁”,自我否定了原先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

后来,党的八大批判个人迷信,放弃这个口号和在党章中删去“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

思想”的规定。这是正确决策。但在“文革”前后,毛泽东借口“不崇拜马克思不得了”,直言不讳地主动地要求全党对他本人“搞点个人崇拜”。基于此,说“万岁”口号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即使史实不确切,似乎也合乎历史逻辑,并非完全“客里空”。

三、在革命时期,作为革命党,党的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拥戴毛主席而呼“万岁”,未可厚非。记得1949年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和前不久还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下党员,参加开国大典,从心底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欢呼雀跃,在会后游行经天安门城楼时,我和全体清华师生一起曾激动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对着扩音器高呼回应:“清华的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说明那时领袖和人民群众还是心心相印、平等相待的。

当然,在刚解放初,十三兵团文工团来清华演出时,带领师生在大学堂里第一次喊出“毛主席万岁”,多数群众还是有迟疑的。虽然大家都拥护共产党,也赞赏、崇拜共产党干部的廉洁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受过民主自由教育的师生,对这种带封建性的口号是心存疑虑和不习惯的,有的教授和同学还对是否应当喊“万岁”进行过辩论。后来经过学习和潜移默化,才慢慢习惯起来。

四、问题在于,建国后,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要经全民选举产生的。在我国是经建国前夕的全国政协选举,1954年以后是经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当然这种选举只是表面形式,谈不上民主选举,领袖人物是终身制,直到他去世才不再“万岁”了。)其所制定和宣示的对国家和人民有约束力的口号、政策,也是应当经人民选出的代表机构的通过或确认的。“五一口号”是党中央基本政策的宣示,而当时我们党是以政策治国的(而非以法治国,而且多数情况下政策高于

法律)故“五一口号”(包括“万岁”口号)具有政策指向性和事实上的法律效力,意味着全国人民都须遵循。

基于此,未经政协或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其职权相当于全国人大),仅由执政党中央以“五一口号”方式将这种宣扬个人崇拜的口号政策化、法律化,要求全国人民都呼喊党的领袖“万岁”,其合法性更是大可商榷和质疑的。

五、问题还在于,这种个人迷信的口号,诱导人们盲从领袖的绝对权威,竭诚拥护和贯彻他晚年所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理论、“左”的路线政策和种种违宪侵权行为,在各种反复折腾的政治运动中产生了严重后果。发展到后来,这个“万岁”口号已不再是人们出自内心的情感呼唤,而异化为必须绝对遵从的“圣旨”。特别是“文革”中更将它法律化,具有高度的国家强制性。“文革”中颁布的《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共有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就是恶名昭著的所谓“恶毒攻击罪”。“文革”中如果有人

不小心损坏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拒绝或反对呼喊“毛主席万岁”,就可根据这个“恶法”判重刑甚至处死刑。不知有多少无辜群众遭此毒手,张志新、林昭等烈士就是最突出的惨案。山西有个牛小顺,为表自己的无限忠心,种小麦时别出心裁设计长出“毛主席万岁”的五字造型,但事后发现既不能对这些麦苗施肥(那会被当成是给毛主席身上泼屎尿),也不能打药除虫(那是诬蔑毛主席有病),更不敢开镰收割(那会被认为在万岁头上动刀)!这块地把他逼得全身发抖,几乎发疯,只好听它烂在田里,终究没有逃过被打成“反革命”的命运,最后在自家水缸里溺水自杀了。(毕星星:《种一个“毛主席万岁”》,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类似的荒唐悲剧可说是罄竹难书。就连创造“万岁”口号的始作俑者刘少奇,一当他觉醒过来,不再迷信最高领袖,反而批评大饥荒时期饿死几千万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得罪毛泽东以后,他就落得个屈死他乡的悲惨命运。

六、因此,时至今日,郑重的唯物主义者和科学历史观的倡导者的职责,应当是批判这种口号,肃清其后遗的不良影响,而不是替它辩护。当然,实事求是地澄清某些史实也是需要的。

出版社约稿

国内正规出版、公开发行,或海外正规出版、公开发行

- **书稿内容** 1. 文史类:回忆录、自传或其他人物传记、社会纪实作品等; 2. 社科类:社会科学、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研究著作; 3. 文学类: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作品; 4. 小说类: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败等长篇、中短篇小说; 5. 美术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绘画作品; 毛笔、硬笔、篆刻等书法作品。
- **书稿要求** 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个人专著由单独的作品或若干篇合集组成,字数应达到6-8万字以上;多人合集由2-10名作者的作品组合而成。
- **出版发行办法** 本年度计划出版360部,以图书形式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210余部。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分别面向国内以及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
- **其它事宜** 1、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订标准合同; 2、组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一到二周内回复; 3、来稿请勿寄原稿(切记!!),并保证字迹工整、清楚,已编好目录、顺序; 4、书稿经审阅,如达到出版水平,我们将及时通知作者,如经审阅不符合出版要求,作者可以要求稿件退回(挂号或特快退回,须自付邮资); 5、寄稿须知: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E-mail)更佳,来稿时附彩色近照一张,200字内简历一份,注明联系地址、电话; 6、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24小时全国投稿热线: 400-680-8368 (免费长途电话)

我们每年运作500余部图书,新书欣赏、网上订购,请登录: <http://shop.chinesezj.com/> (学习新知网上书店)

投稿地址: 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邮编: 100025)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综合编辑部(收)
电话: (86)10-81118378、81118398、86878777、58429718 传真: (86)10-89506467
在线投稿: bookbj@126.com 联系人: 伽悦、文馨、汪鹭、高晶(编辑)
详情请浏览网站: <http://www.zuojiba.com> (中华出版热线)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 冯敬兰 刘进 叶维丽 宋彬彬 于羚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后文简称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批斗、殴打致死(后文简称“八五事件”)。我们是当时的女附中学生,算是知情者,近年做了一些调查,现将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八五事件”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第一张大字报

冯敬兰(本文执笔人,初三3班学生[均指1966年在女附中就读的班级,下同]):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印象中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课间响了,然后就是夏青在播送一个社论。下课后,就在校园里看见了大字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刘进,是你们写的大字报,打破了校园平静的空气。为什么你会成为第一个?

刘进(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也许和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吧。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刘仰峤,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在河南工作,那里是重灾区。正上初中的我,亲身感受了大饥荒,亲眼看见了什么是一穷二白,也开始懂得什么是责任。1964年春,我随父母调动(刘仰峤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转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我于1965年年底入党,在党支部会上也给学校的教育提过意见。1966年上半年,党报不断发表批判文章,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文化革命。1966年5月,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有个报告,我们认为是压制革命的,和社论讲的精神不一样。党支部的老师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早6点,我在锻

炼时听到早间的新闻正在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现在党中央发出号召,支持我们了,说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看来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结果我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住住在同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我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她说愿意。我俩又跑到学校去找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党),她也支持我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还没有到校呢,我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我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本来以为把意见提出来想办法解决就行了,没想到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同学都无心上课了,这和想象中的革命不一样。我们也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党支部担心影响扩大,当天就把我们三人隔离到阶梯教室,告诫我们这么做很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他们苦口婆心地帮助我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我们认清形势检讨错误。我们对此很不理解,广播里都肯定了大字报,说明这就是党的号召,为什么我们给学校贴大字报就成反党行为了?那天在阶梯教室内始终围着很多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群情激奋,既有指责也有同情。

二、工作组进校期间

冯敬兰:我记得你们受到了“围攻”,我有深刻印象。接着就是工作组进校,动作很快,应该和

邓榕有关吧,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她回家一说,立即会引起她父亲的关注。

刘进:我想是这样。6月3日晚饭后,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被一个同学直接带到阶梯教室。他们当场宣布说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让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6月4日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是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责人。欢迎大会上,胡启立、张世栋、胡志涛校长都讲了话,胡校长还传达了前一天李雪峰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报告。6月6日,工作组主持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二人,数学老师李松文和生物老师陈大文,学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前四人为高三学生,尹斐是高二学生。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其他四人为副主席。当天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

冯敬兰:工作组进校后,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组。工作组一师生代表会一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

刘进:这种按部就班学习讨论的情况没有维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

叶维丽(初三3班学生):在6月21日工作组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袁淑娥(女,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女附中英语教员丁某前妻)的表现引人注目。在这个会上卞校长被打得很厉害,这应该和袁淑娥的煽动有直接关系。卞仲耘后来给上级写信,详

细地讲了当天挨打的情况。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

刘进: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了会场。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奋,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会场安排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袁的发言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直有对校领导的过激行为。还有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发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园贴过一张小字报,揭发卞校长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

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班同学的笔记上,记着在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学生中间活动,包括学生去卞校长家贴大字报,都是她领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见到她也在场。

冯敬兰:袁淑娥为什么这样恨卞校长,她们的关系很复杂吗?于羚,你曾帮助王晶壺先生整理过大量资料,也见过袁写的“万言书”,请给我们讲讲。

于羚(中五2班[五年制实验班]学生):袁淑娥是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1959年与卞校长同住一所医院时相识。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袁的丈夫丁某当时在北京空军,也有转业到女附中的意愿,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讨论通过,丁某调入女附中教英语。这期间,袁、丁夫妇经常争吵,卞校长从中做过一些调解,袁、丁最终离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

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将上万言的揭发信,复写多份,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等寄去。揭发信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把个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公安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察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王晶珪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

冯敬兰:当时,全社会都处于丧失理智的疯狂中,任何人想挟私报复他人,只要他有“资格”,譬如“红五类”出身或符合别的什么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

刘进:几年前我在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里看见了贴在卞家的大字报,语言粗暴恶毒,画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学了解情况,证实是袁领着学生去卞家干的。

两天斗争会后学校恢复常态,继续维持着原来的运动节奏,写大字报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学梁二同为首的18人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内容涉及虽多,却不再具有轰动效应。她们多数时间不到学校,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或去海淀区的中学活动。7月初,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

6·27大字报贴出后,工作组分别找参与的同学谈心,如果是干部之女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

冯敬兰:海淀区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为代表,反校领导的学生,后来又反工作组,一路造反下去,并有“理论建树”,一论再论三论什么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明确。你们反了校领导却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回归“主流”,成为反工作组同学的对立面及多数派的代表,这种异常是否与邓小平的支持有关?请你们谈谈去邓家汇报的情况。

刘进: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是在邓小平家里,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

冯敬兰:为什么要带你们两个学生而不是别人去邓家汇报?

刘进:是邓点的名。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们的父母很熟。那天邓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刘仰娇是个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我父亲主持工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因此,邓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激动,胡启立、张世栋他们怎样开始汇报的,我都没有听进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邓的两次插话,一次是张汇报6月21日揭批会袁淑娥冲会场的情况,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是外校的一个老师,没通知她,她自己来的,邓说这是个坏人。另一次是张汇报到17日、27日两次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

最后,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该校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

宋彬彬(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后来他又说到老师们都是好的,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17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

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原来听说“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结束，听了邓的讲话觉得他想尽快结束。

叶维丽：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

刘进：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和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7月6日准备，7月7日、8日、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可以“缺席辩论”。辩论对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学校，没有参加辩论。

连续三次辩论会后，学校开始部署下一个任务：老师集训和学生军训。7月28日集训结束，7月29日集训人员返回学校。

叶维丽：当时是“兵分三路”：少数骨干学生参与在马神庙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的学生去郊区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军训。军训是突然结束的，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开的联欢会临时改成了欢送会。

刘进：军训的大队伍8月1日回到北京。

叶维丽：我们是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的，当年这么走路很平常。到了学校一看，我们离开还不到十天，整个校园面目全非了。大字报主要是鼓吹对联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和工作组有关的大字报似乎并不多。从火车站一回到学校，就有人向我们宣布工作组撤销的消息，我记忆中有工作组王老师满脸错愕的表情。对联加上撤工作组的消息真把人给震懵了。

刘进：在军训同学回来之前，开了两个大会。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撤工作组的大会，毛主席一出来，掌声雷动。刘邓说老革命遇见新问题就是那一次。究竟发生了什么？谁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说工作组是消防队，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校会，把7月29日的中央领导讲话录音放了一遍，随后就宣布工作组撤出女附

中，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冯敬兰：学校三级组织的最高一级——工作组因方向路线错误被撤销了，师生代表会因此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看来学校再次产生了“权力真空”，这是最危险的时期。

三、后工作组时期

刘进：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当时校园里除了对联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才两三天，就有学生跑到团中央去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十几天，要求他们揭发问题。工作组撤走后，多数学生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学校，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和辩论对联。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冯敬兰：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日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叶维丽：8月5日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刘进：因为我们不在班里，不了解各班的具体情况。我和宋彬彬每天还在学校，总被一些同学围着问下一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却犯下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迷惘。犯了错误跌倒了，可以爬起来再干，但是方向在哪里？具体干什么？无所适从。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

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

冯敬兰: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四、“八五事件”

刘进:《“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1966届高三1班学生)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冯敬兰:当时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

刘进: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

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待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冯敬兰:离开医院你们去了哪里?

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

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走回学校,我们一直坐到天亮,谁都没有合眼。校长死了,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认为应该让全校同学们知道。由谁来说?有同学说你当过学生会主席,还得由你来说。其实我也犹豫,觉得很难开口,但自己不说让谁说呀?是我们把卞校长送医院的,是我们向市委书记汇报的。我作为党员应该出面向同学们说。于是,8月6日早上,我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冯敬兰: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

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冯敬兰:你们劝阻了两次,却没有使她们停止游斗活动。难道因为她们以革命的名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才让你们的劝说苍白无力吗?

刘进:当时斗黑帮是革命行动,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站在对立面上制止她们游斗校领导,何况自己又是犯了错误的人,只能说些不要打人、注意政策的话,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说话完全没用。

从近年的调查中得知,8月5日下午,不少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对打人者进行过劝阻。在游斗中,胡校长争辩说“我不是黑帮”,一个高个子学生说“我现在就让你变黑”,拿着一瓶墨汁就泼在胡校长身上。围观的一个中五年级(五年制实验班)同学立即上前阻止,说“斗黑帮也不能这么斗啊!”有个同学劝阻不要体罚打人,立即被回击说,好久没有斗黑帮了,今天斗黑帮有什么不对?工作组在校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可神气了,我们斗黑帮有什么不可以?高三4班反过工作组的王亚力、李乐群等同学也劝阻过两次,一次在厕所附近,一次在校园里,看到围观的低年级同学都散了,她们就走了。她们也没想到,老师们会被换个地方接着遭受折磨。有的老师劝学生,说她们(校领导)年龄都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干这么重的活了。这么热的天,他们肯定受不了,会出事儿的。有的学生也这么劝。这些劝说立即遭到激烈反驳,说你是保工作组的吧?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班有同学

看到梅树民老师挨了一棍子,血立即从衬衫里面流了下来。梅老师自己也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学生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打在他背上,钉子扎进肉里,拔出后都是血,染红了衬衫。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学生会主席,反工作组成员之一)到校比较晚,8月5日她没来,听说卞校长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2006年我曾问过她,她说调查后基本落实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学生为主。很多人是在表现自己,谁打得凶,谁的阶级感情就深,觉悟就高。她还说,我调查了,你们这些学生领袖那天下午在东二楼呆着,没有人参与这件事情。

关于王先生出示的那个名单,我是从胡杰电影里第一次看到的。名单是竖着写的,右上是师大女附中,靠下并排写着李松文、徐岩春、李小琦、马恬、王满华、刘进、宋彬彬。后来,2008年在一个博客里再次看到,指控说凶手就在里面。有同学看见那个名单后,告诉我说李松文老师写的字,他教过她们班几何,很熟悉他的字体。于是我去找李老师,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把那个复印的名单拿给他,请他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过了几天,李老师打电话约我见面,详细讲了名单产生的前因后果。他说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带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学校已经快6点了,听说出了事他就跑到后院,有几个学生堵着不让他过去,当时他找赵桂英老师又找校医刘大夫等等,心里很急。到了医院,医生不管救治,在场师生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执,大夫说要有学校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经很晚了,到哪里去开证明、盖公章?李老师问大夫签名作证行不行?医生说,不能让学生写条子,学生一毕业就没法找人了,要写也是老师写。于是,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了校名师师大女附中,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和很多学生。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就问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行不行?我们都说行,他就把几个认得的学生名字写上了。他当时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个高二学生,李小琦、马恬、王满华,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师说,这是抢救以前我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怎么到了王先生手里,大概是医院

交给他的吧。还说:“那天你把名单给我看的时候,一看是我的字体,我都愣了。回家后仔细回忆,记得是这个过程。卞去世以后,大约9、10点钟,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去北京饭店。”

冯敬兰:那天打人的学生,许多目击者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我班有同学看到,刘致平副校长因为谢顶,头上被贴了一张墨汁涂黑的纸,高一某学生命令他跪着,做举手投降状,给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几岁,算是年轻力壮的人,让他挑土围小操场走一圈,再把土倒回原处。胡校长打扫操场附近的厕所,不少同学记得,她的白衬衫被墨汁染成黑色,黑裙子被撕到胯部,露出了粉色的内裤。没有任何工具,她只好用指甲抠厕所盖子上的污物。卞校长被押到宿舍楼打扫卫生,我班同学看见卞校长时,她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街,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搽,使劲按她的脑袋,胡校长就是不低头,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和胡校长当时愤怒的表情。

五、反思“八五事件”

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刘进:8月5日的暴力行为使卞校长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我没有预想到会发生那样惨重的后果。出事后我真是后悔

死了,没有果断地拼全力去制止暴力行为,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胡校长等老师。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悔恨和负疚感丝毫没有减弱。这也是我和宋彬彬为什么要在60岁以后克服许多困难、坚持调查学校“文革”事件的动因。

我曾在“文革”40周年时,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王先生。我也几次登门看望过梅老师。有一次他问我:“我们挨斗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当时这话对我的震动非常大,我郑重地给梅老师写了一封道歉信。经多次沟通,他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谈起了8月5日的遭遇。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能一直待在那儿,为什么要走开?如果是你们的父亲,你们能走吗?”我说自己追悔莫及,是我的父亲我肯定不会走。他说你们都是学生党员,是我们最信任的学生,在最关键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觉得梅老师对我提出的质问,也是大多数老师的质问。我非常感谢梅老师对我的批评,感谢他能告诉我当天的情况和他的感受。

叶维丽:你、我、宋彬彬和于羚咱们四个人一起去看一次梅老师。我们进门时,我感到梅老师似乎不那么欢迎我们,老师一般看到学生来都很高兴,而他不是。当时我走在后面,宋彬彬说了一句话,“我们当时真的很对不起老师们”。声音不高,我听见了。还有一句印象深的话是梅老师说的,他问你(刘进)和宋彬彬,“你们当时在哪儿?”他反复地问,老围着这句话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你们曾是他精心培养的学生,在那天没有“搭救”他和其他领导让他心里受到很深的伤害。我很高兴刘进这些年能和梅老师多次沟通,反复交换意见,倾听梅老师的心声。

宋彬彬:那天去看梅老师,一进门看见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心里充满愧疚,就说了对不起老师的话,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直想说的话。虽然8月5日事发当天,我们也去劝说、阻止过,但是并没有预想到事态的极端后果。想到卞校长被学生暴力殴打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老师们身心遭受重创,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和追悔。

叶维丽:最近,有人提出来追查卞案中“凶手”的问题。我想说,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揪出几

个“凶手”更为复杂。这些年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一所优秀女校的学生会成为施暴者?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我们中的一些人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我的小书《动荡的青春》在一定意义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调查了解卞校长之死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也是很多校友们共同的问题,我们都在追问。我觉得追问这些问题更有意义。

2002年开始做调查后,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冯敬兰帮我联系了我们班十来位同学,听她们讲述当年目击的情形。于羚也介绍我采访了一些高中的同学。2002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我碰到刘进。我“八五”那天不在校,没看见卞校长躺在垃圾车上惨不忍睹的形状,给我刺激最深的是刘进第二天在广播里讲的一句话,“死了就死了”。那天见到刘进,我问了心中存了很久的问題:你那天说没说过“死了就死了”?对我这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提问,刘进回答,“说了”,毫无闪烁其词。她同时告诉我这句话的来历。刘进坦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刘进对我的调查一直非常支持,包括帮我联系访问宋彬彬。

我也感谢卞校长丈夫王晶壺先生对我的信任和我调查工作的帮助。作为卞校长的遗属,他在难以想象的危难条件下,为他的亲人、也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留下了血证。看着他在胡杰的影片中一件一件拿出卞校长当天的衣物时,我既感动,又敬佩。就凭这一条,老爷子做出了历史贡献。我愿意在这里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大家都在拒绝遗忘,正视历史。

冯敬兰:“八五事件”已经成为一段历史,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文革”暴力的典型,也在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别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提供了特殊的样本。不仅仅是卞校长的不幸让我们深思,那些加害于她的学生,从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典型的意义。我想起一个参与殴打老师的同学,不少人记住了她的名字。她长得很漂亮,像电影《苦菜花》里的女英雄赵星梅。她后来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动学生”,我在1968年3月28日的日记里记着她的主要“反动言论”:二十年后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确与否几十年后才能证明;由种种理论推断,中国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在4月2日的日记里再次写到她当天在阶梯教室被斗争的情形,她的胳膊被同学架起成“喷气式”,

匿名信让我错杀人

• 张红云

我是广西解放后第一批进入南宁,在原省委研究室工作。那时还是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1950年冬随省委工作队下到邕宁县心圩乡搞土地改革。经过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了群众。饱受专制压迫的老百姓,苦大仇深的弱势群体,敢于和压在头上的统治者面对面地开展斗争了,敢于控诉他们的罪恶了。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我们这些专做启发教育工作的干部,当然松了口气,心里乐滋滋的。

一天,我正在房里整理材料,一个农民进来,凑到我耳边小声说:“张同志,我发现‘检举箱’里有封信。”

两张纸上,歪歪扭扭、乱石铺路般写着:罗×太,今春曾去西乡塘某地参加过土匪的秘密会,还委任他为地下心圩乡乡长……看完这封无头无尾、字迹变体变形的匿名信,我什么也没想,甚至没有看第二遍,即带起两个民兵,直奔罗×太家。在村口有堆人聚在那里晒太阳,见工作干部进来,都站起打招呼。我问大家说:“看见罗×太吗?”旁边一个背着孩子的汉子应声回答:我在这!我抬眼打量此人,30多岁,中等身材,黑黑的

一张再普通不过的脸膛。“好吧!你跟我来一下!”“等我把孩子送回去。”这时,我才发现他背的那个小囡囡,正怯生生地看着我们。

回来后,我立马从笔记本上扯下一页横格纸,提笔写下:经群众举报,我村挖出土匪地下伪乡长一名……十几个大字,由民兵押送大队部了。

几天后,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罗×太就以土匪地下伪乡长的罪名,被枪决了。

逝者而已矣,生者长戚戚。时间过去了60年,那个小囡囡怯懦的眼神并没有淡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法制不断健全,审判程序逐步完善,口供、证据,不可或缺。这更使那双眼睛像生出芒刺,时时针砭着我。

60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小囡囡该已经是60多岁的老太婆了,这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岁月里,你戴着“杀父之仇”的帽子,怎么走过来的,还好吗?

至于我的忏悔,来得迟,可是总归是来了!

(责任编辑 李晨)

她愤怒地仰起挣得通红的脸大声分辩:“‘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二十年后才能看!”后来我们陆续上山下乡了。几年后,听说她疯了。因“文革”而精神错乱的同学,还有前面提到的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李黎黎,后来她又患上红斑狼疮,在下乡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因服药过量辞世,年仅22岁。初三4班同学闻佳,因“反革命罪”险遭枪决,“文革”结束虽然平反释放,但精神错乱而致终生不幸。今天想到她们,我仍会心痛。卞校长遇难的第三年——1968年我下乡北大荒后,陆续听到了母校在“清队”中不断有老师被迫自杀的消息,记得是四位,其中语文特级教师周学

敏(女)创立过“周学敏教学法”,最年轻的胡秀正(女)老师才三十出头。这就是万劫不复的“文革”。

今天,我们五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经历的校友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个久蓄于胸的宿愿——把真实的记忆留下来。我们深知,道德激情不等于历史真相,群体义愤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没有哪个人可以垄断历史的解释权,也没有哪个人可以完全、永久地真理在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谨怀殷切诚挚之心,期待着校友、知情者和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京剧革命”与李琪之死

• 王红领



毛泽东会见匈牙利朋友,右二为李琪

今天看来,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京剧革命”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一次“军事演习”。直接指挥这次演习的人是江青。江青早年投身演艺界,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在演艺界的口碑也颇有微词,但她毕竟有演艺之特长,更重要的是其特殊的身份,因此由她担任这次“军事演习”的主帅也在情理之中。

1963年12月,江青以“戏剧革命”为由到北京市进行调研。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琪主管文艺工作。尽管宣传部的工作职责远不止于文艺工作,但江青的到来,使得李琪不得不将工作重点放到戏剧上,特别是京剧方面。更重要的是,虽然当时的江青,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政府机关均没有后来的显赫地位(仅仅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但由于她的特殊身份,身为市委常委会的李琪还是给了她应有的礼遇,文艺工作者也尊重她的指示。然而,仅仅礼遇远不能满足江青的要求。

江青的指手画脚、挑剔、刁难,使得大家诚惶

诚恐。对此,李琪有过评论:“江青不许别人提不同意见,哪怕是稍加解释,就会被她说成不听她的话,你如果保持沉默,就会被她认为故意对抗。”

从“文革”过来的人对八大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沙家浜》都不陌生。但在这部“现代京剧”背后的故事可能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江青来到北京进行京剧改革,推荐了一个剧本《芦荡火种》。这个剧本是剧作家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地下联络员》改编而成的。李琪根据彭真的意见,组织有关剧团排练,力求做到既有京剧的特色,又具现代戏的风貌。经过大量的工作,《芦荡火种》的排练终于完成了,并定于1963年12月面向公众试演,以听取观众的意见,并预售了三场戏票。在试演前,李琪请江青观看彩排,江青看后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随后李琪在家中却接到江青的电话,命令取消公演。接完电话,李琪气得浑身发抖,沉默了许久,拿起电话通知剧团取消演出,赶紧退票,向群众做出解释。

其实,江青取消演出的具体理由很牵强。例如,后来全国都知晓的“茶馆”一场就被江青以不合她的口味为由,坚决要求拿下。但是,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阿庆嫂、刁德一和胡传魁这一场三方对唱很精彩,可以说是戏中之戏,不愿意取消,李琪和彭真也认为应该保留。事实上,江青真正关心的并非是戏中的某个情节,她要的是一种权力的宣示:如果你们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李琪一个颜色,给你北京市委一个下马威。关于《芦荡火种》里的这一场戏的争论,后来惊动了周恩来,并得到了总理的肯定:要上。再后来,毛主席看了演出,肯定这戏排得好,并上台与演员合影,说“剧名改为《沙家浜》更好”。用李琪的话说,“大家胜利了,如果不是毛主席的肯定,‘茶馆’一场肯定是没有了”。

“京剧革命”在江青的领导下，“革命”举措迭出。比如，在对待一些中国著名的京剧大家上，江青的做法是，在和传统戏决裂的同时（江青的原话是“我是和传统戏决绝了”），也把这些京剧权威赶出了舞台。例如，《杜鹃山》由北京京剧团演出，男主角和女主角分别由裘盛戎和赵燕侠出任。江青认为“男主角用错了人，听说他过去抽过大烟，这样的人演主角有损英雄形象”。对此，李琪不以为然，和江青争辩说：“从旧社会过来的名角，不能要求太苛刻，他们有演现代戏的要求，排练也很卖力气，演出后观众反映也很好”。对马连良、张君秋等人，江青也是极力排斥，用她的话说，就是“我的试验田，不能用这些人”。李琪对此很无奈，感叹道：“唉，江青禁止这些人演出，不是要这些观众熟悉的名演员绝迹于舞台，剥夺他们的艺术生命吗？”为了争取让老艺术家出演，李琪硬着头皮犯“上”，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市委的意见是这些老演员除了在艺校教戏外，也可以演一些革命现代戏和允许演的老戏。

李琪和江青的矛盾日愈加深。用江青的话说，“李琪骄傲自大，眼中没有我”。李琪也压抑不住对江青的不满，甚至在周围的同事之间也难以掩饰这种情绪。1965年5月，江青以谈工作为名将李琪叫到上海。但李琪到上海后，江青根本不露面，只是叫张春桥从中传话。两个星期后，李琪忍无可忍，拂袖回京。1966年2月，李琪第三次去上海见过江青后，回到北京给彭真写信说到，“江青像皇太后，比西太后还坏，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像奴隶主一样对待我”。不久，李琪又对一位北京市委常委说：“江青品质恶劣，作风霸道，不赞成她，不跟她走，一定会遭到打击报复”。李琪还对妻子李莉说：“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坐牢和杀头的一天，你要有思想准备”。

李琪虽是一位官员，但颇具书生的性格。这或许和他的教育经历有关。1949年1月他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学习。学习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一书。对哲学，他也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从马列学院毕业后，李琪被留校，担任中共党史的教学工作。1951—1952年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并发表了数篇论文。

1953年和1956年，他分别出版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全国累计发行50万册，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

如果李琪没有后来的奉命调动，如果他的工作调动最终不是主管北京的宣传工作，如果不是江青来到北京推行“京剧革命”，李琪或许不会有后来的不幸。1965年底，江青在上海指挥《文汇报》批判北京的副市长吴晗，抛出了姚文元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日报》没有转载，这也被看作是李琪的罪过。后来上海又将批判吴晗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让北京的新华书店订购。李琪说：“批我们的副市长，还让我们订购，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李琪和邓拓、范瑾一起分析形势。李琪认为，这次批判一定是江青发动的，不然上海不敢轻易批一位北京的副市长。他们都认为，批北京的副市长，又不和北京打招呼，是在将北京的军。

很快，1966年5月16日和17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李琪——说他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是包庇吴晗。紧随其后的当然是隔离审查，无休止的批斗。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李琪个人的力量显得是那么单薄，最后他选择了自尽，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不到52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晨）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我心目中的廖承志

• 瞿独伊



廖承志与姐姐廖梦醒及外甥女李眉

廖承志公离开我们已经 27 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眼前。

大革命时期，我的父母瞿秋白和杨之华就认识廖公的父母。

1928 年父亲去莫斯科为召开中共六大做准备工作，开完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廖公在欧洲从事海员工作，父亲与他有工作关系和书信来往。

1978 年，廖公住在北京医院，我去看他时，他问我母亲怎样？我说妈妈于 1973 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廖公听后很难过。他对我说：独伊你应早日给中央写信要求为你父亲平反。我说父亲是中共领导人应该由中央提，我作为女儿不好提平反的事。廖公说你不提，谁来提？正因为你是他的直系亲属就应该提。我说：好，我回去想一想。随后我去看望当时也住在北京医院的陆定一同志，对他说了这件事。陆老说：廖公说得对，你应该写信给中央要求为你父亲平反。

第二天，陆老夫人严慰冰给我打电话说：陆老要你来医院看他。我去了，见到陆老，他对我说：独伊，你赶快给中央写信，你看，我已给陈云和黄克诚二位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为你父亲平

反的三条理由。他把此信给我看了。于是我回家后给中央写了信。信中提到：1946 年我们从国民党的新疆监狱释放回延安时，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我和我母亲以及朱旦华和毛远新。当时毛主席对我母亲说：“你放心，秋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为秋白曾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平反了……”

因为后来事情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重新出现为瞿秋白平反的问题。陆老和我的信先后寄出，不久我的姑妈也给中央写了要求为父亲平反的信。

中央纪委很快就成立了“瞿秋白平反复查组”。经过半年的调查，平反复查组向中央递交了平反报告。

在为我父亲平反的整个过程中廖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为此我很感激他……

早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时，我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时，廖公走到我身边说：“独伊，快出来，快出来！”他用车把我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室，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刚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的宣言的俄文稿。廖公要我用标准的俄语读出来，同时用唱片灌录。我读第一遍他不满意，读第二遍成功了，于是就播出了。过了几天，有一位懂俄语的朋友刚从东北回到北京来我们家，她说：“我在东北从广播中听到用俄语播的毛主席的讲话，听着很像是你的声音，是不是你？”我说：“是我！”

这样，我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俄语广播员！本来廖公希望我做播音员的工作，可是组织上决定派我和李何去创建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站。我们俩于 1950 年 3 月去了莫斯科。李何的护照是第一号，我的护照是第二号，我们是新中

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

• 艾以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成了这数十万“分子”中的一分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同学”(在改造农场里,“分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更不能称同志,彼此只能互称“同学”)。

陈歌辛先生生于1914年9月19日(农历七月三十日),上海浦东南汇人。原名陈昌寿,因希望自己能为人民大众服务,改名歌辛。是30年代著名音乐家,一生创作歌曲二百余首,被人们誉



陈歌辛

为歌仙,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1931年,20岁的陈歌辛在玻璃电台邂逅小他3岁的播音员——一位貌美灵巧的富家少女金娇丽,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堕入爱河,坚定地走到一起。他还为娇妻谱写了一首表达两人心声的《永远的微笑》,经金嗓子周璇一唱而传遍大江南北。

40年代初,陈歌辛创作了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爵士风格、伦巴节奏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他创作的《蔷薇处处开》以及《渔家女》等等,我青少年时就会唱。

更因为我也是来自文艺界,和陈先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虽然我们过去互不相识,年龄相差悬殊,他年长我13岁,但在那特殊的环境里,不期而遇,我们显得格外亲近,终于结为忘年交。

国成立后第一、第二个去苏联的中国公民。

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廖公对我的关怀:那是在战争年代,新华通讯社从延安撤退时,廖承志社长带队。我当时怀孕,胎位不正,妇科大夫给纠正胎位,我实在不能跟着大队一起走了,当时廖公夫人经普椿刚生产不久。社里弄了两头骡子抬着一张带顶篷的担架方便她给孩子喂奶。廖公知道我的情况后,马上把这架简易但已经是当时最高级的“骡车”让给我坐,这样我才跟上了大队。后来,我生下孩子4个月后,害了严重的伤寒,没有奶给孩子吃,廖公把给孩子吃的一点奶粉送给我的孩子,同时他还给我母亲拍了电报请她速来看我。但当时妈妈正在薄一波领导下参加土改,不能来看我。后来我身体恢复了,新华社借我一匹马,我抱着孩子骑着马去看母亲。见了母亲很高兴,同时第一次见到薄一波同志,也见到

薄一波同志的前妻和刚满三岁的陈潭秋烈士的儿子陈楚三。陈潭秋烈士是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在新疆监狱牺牲的。他是我母亲的战友以及我们在新疆监狱的难友。陈潭秋烈士的妻子被派到东北工作,小楚三留在延安,我母亲看他可怜,便请薄一波同志的前妻照顾他。

廖公很能接近群众,平易近人,而且性格乐观开朗。我还记得有一次行军休息时,廖公还用德语唱了一支歌给大家解闷。他在香港、日本、德国、苏联及北欧一些国家都呆过,会几国语言。虽然他是我们新华通讯社的社长,但他没有一点架子,大家都称他为“小廖”。他是我们大家尊敬的爱戴的好领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永远深切的怀念他!

(责任编辑 萧 徐)

关于陈歌辛先生被划为“右派”一事,贺绿汀先生生前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这顶‘右派’帽子本是归我戴的,后来陈毅保了我,就由陈歌辛‘顶替’了。”他就是在这样一言未鸣、一语未发的情况下,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陈歌辛的坎坷遭遇。其实,陈歌辛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热血青年。在上海“孤岛”时期,他组织创办了“实验音乐社”,积极传播苏联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抗战胜利后,满怀胜利激情的陈歌辛,创作了被誉为上海市歌的《恭喜恭喜》歌。由于他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交往密切,又有许多爱国和反内战的言论,因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陈歌辛已无立足之地,他便和一些爱国文化人士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回到上海,想不到陈歌辛“左”“右”都不逢源,却成了“右派”分子。

我们到了农场之后,不久即遇上三年困难时期。改造农场的物质生活条件原本就难以想象的贫乏和艰苦,更何况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大都市里的文化人,一旦置身在山区的蛮荒环境中,又为了“脱胎换骨”而被迫从事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下,每个人的生命安危都时刻受到无情的挑战。

到了1961年,改造农场口粮锐减,每天一干一稀,“罪人”们在饥饿中艰难地挣扎着。当时农场中流行一种怪病,发病前无明显症状,只觉得四肢无力,日渐消瘦,最终导致恶性贫血,临近死亡时又突然全身浮肿,浑身皮肤肿胀得发亮。此病发病率高,死亡率也高。陈歌辛先生在农场,水土不服,饮食生活不能适应,幸亏上海亲人不断接济一些食品和营养品聊以维持生命。但改造无期,天长日久,毕竟生存维艰,求生不易,一旦得病,也就在劫难逃了。

在农场,“罪人”们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通铺,几十号人乃至上百的“分子”分小组一排排同室同铺并肩就寝。实际上,这里就是“分子”们的家,吃饭、睡觉、休息、学习(洗脑筋),除了白天上山下地劳动外,所有时间就在自己的床铺周围转。一天早上,大家都按时起床,但陈先生却睡在那里毫无动静,和他邻床的一位“同学”便走到铺前叫他起床,没见反应,便用手推他,仍无反应。一时急了,便掀开盖被,俯首一看,不对了,只见

陈先生脸色惨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人世。那一天是1961年1月25日,一代著名音乐家陈歌辛先生,就这样撒手人寰,无声无息地走了。

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白茅岭农场,地处皖南丘陵地带,横跨郎溪、广德两县,下属十几个分场,散落在连绵起伏的荒山野岭中。白茅岭农场的改造对象分两类:一类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劳改分子;一类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劳教分子。在那饿殍遍野的年代,在白茅岭改造农场,天天有人饿死,被抬到荒山野岭去草草掩埋。而这掩埋饿殍的任务就落在劳改犯的身上,而那些劳改犯同样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自身难保。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饿殍抬到荒山坡上,也只能草草掩埋,这些尸体很快就成了狼群的美食。我是亲历其境的过来人,曾经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我有时曾想,有些事情也绝处逢生,因祸得福。我在“反胡风”、“反右”后,两罪并罚,不仅把我送到白茅岭农场去改造,而且株连家属,全家扫地出门,撵出上海,随我到农场“安家”。这样一来,或许因为我身边有亲人的同情、照顾和安慰,使我坚强起来,大难不死,捡回一条老命,活到今天。可怜陈歌辛先生,就只能遗恨终生,饿死在农场了。事后他夫人闻讯赶到农场,寻遍荒山野岭,只见遍山累累白骨,哪来一具完整的尸体?

三中全会之后,我和奇梦石、司徒阳、姚福申等大难不死,先后回到了上海。80年代初的一天,陈歌辛之子陈钢教授到上海作家协会看望李子云同志时,我也在座,交谈中他曾向我打听他父亲在农场的情况,我当时只是含糊其辞地应酬了几句。因为,一来我经历了21年的磨难刚脱离苦海,离开改造农场,心有余悸,不敢吐露真情;二来我也不忍心把他父亲的死因和后事谈得太具体,以徒然增加他心灵的创伤。

往事并未如烟。正如少奇同志所说:“饿死人是会记入历史的。作为亲历者的我,应该拒绝遗忘,抢救记忆,为那个历史时代留下生命的见证。对我们的后代,应该怎样去避免曾经发生过的那场人间悲剧的重演,或许有所启迪。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李晨)

古巴革命与华侨的命运

• 程映虹



“祖国就是人类”（本文作者摄）

这幅画上的两位历史人物，一个是在中国废君主立共和的孙中山，另一个是古巴共和国国父何塞·马蒂。作画者是古巴哈瓦那民间历史学家吴帝胄。吴帝胄把这幅画赠给另一个古巴民间历史学家加西亚，后者把它悬挂在自家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上。画上的名言，分别是孙中山借用孔子的“天下为公”和马蒂的“祖国就是人类”。在这幅画像的背后是两个跌宕起伏的人生，一个志同道合的事业和一个令人深思的感悟。吴帝胄和加西亚都是快80的人了。他们年轻时都是革命者，志在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投身于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甚至世界革命。但退休之后，近二十年来他们却把余生完全奉献给了古巴华人历史研究，聚焦于哈瓦那中国城和中国社区，力图用历史叙述复原一个被革命摧毁，被权力话语忽视和遮蔽，在古巴民族历史记忆中长期消失的少数民族的真实面貌和昔日辉煌。这幅画上的文字表明，这个晚年的事业不但凝聚了他们对革命的深刻反思，而且把他们在精神上带入一个超越族群认同，摆脱意识形态窠臼的普世主义境界。

2009年加西亚和吴帝胄合作的部分成果以《华人在古巴——1847年至今》（*The Chinese in Cuba 1847—Now*, Lexington Books）的书名在美国以英文出版。英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班国瑞（Gregor Benton）和两位作者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不但翻译了这本书，而且是书的编者，并撰写了长篇序言帮助西方读者理解此书的背景和贡献。这本书出版后，英国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找我写书评。我在班国瑞的介绍下和加西亚通过电子邮件建立了联系，并于2010年3月前往古巴对两位老人进行了采访。

从外交官到历史学家——加西亚的人生经历

加西亚（西班牙名 Mauro Garcia Triana）出生于一个西班牙裔的工人家庭。他在高中时就加入了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运动，1959年以前担任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在拉斯维拉斯省的地下学生组织负责人。革命胜利后，1960年，他还在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被卡斯特罗政府委任为古巴驻玻利维亚的高级外交官，在驻在国左派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大力扩散古巴革命的影响。他的极左立场引起驻在国不满，1961年回到哈瓦那，任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1962年到1966年他任古巴第一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之后回到哈瓦那担任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1967年到1971年任驻中国临时代办；1972年到1975年任驻东德大使。此后他先后在外交部和古巴科学院从事和亚洲事务有关的研究。1991年退休后，他致力于古巴华人历史研究，前两年历尽艰辛用西班牙文在古巴出版了《古巴华人和中古关系》。这是这个领域一部资料性很强

的著作,但由于它处理的是一个“正史”以外的领域,只印了300册左右,也从来没有进入公开发行渠道,只是私下馈赠给同道,和一些在中国问世的历史著作的命运很相似。

加西亚的中国缘是由“文化大革命”促成的。1967年1月,中国学生在莫斯科红场上的“文革”行为导致了和苏联警方的冲突,全中国掀起了反苏狂潮。古巴驻中国大使馆内的中国职员向馆方提出参加反苏示威,和大使馆官员发生冲突。古巴大使馆擅自改变了部分中方职员的办公地点,将他们的东西搬出,解雇了中方翻译。中方职员于是“造反”,指责古巴大使“挑战中国”,如此对待中方员工是“法西斯”,发起了罢工,向馆方提出翻译复职、中方人员搬回原办公地点、中国职工的权利必须被尊重、古巴大使要道歉这四项要求。古巴驻华使馆日常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古巴总统多铁戈斯召见加西亚询问对策,加西亚说除了道歉,其他都可以接受,于是外交部紧急将加西亚派往中国解决问题。加西亚到北京后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在和中方会面时他叮嘱还在气头上的古巴大使不要开口,一切由他来应付。除了回避要古巴官方正式道歉的要求,他基本上迁就了造反派的要求。问题解决后,古巴立即召回了大使和参赞,加西亚以临时代办身份主持大使馆的工作,一直到1971年春。因此,他实际上的身份可以说是大使。

加西亚因缘际会,在华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不但是他外交生涯中极不平凡的一段,而且我感觉到这段生活在他晚年对革命的思考中有着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文革”代表了整个60年代国际范围内左翼思潮和极端主义的巅峰,古巴与此同时也发起了和“文革”类似的“革命攻势”(1968—1971),吸引了众多西方左派的眼球。加西亚从1967年3月到1971年4月在中国,没有切身经历这个“攻势”,但根据采访中他对古巴革命史和现状的评论,我感觉中国的“文革”在他思想变化的过程中不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阶段,而是给了他一个特殊的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他对我介绍了很多“文革”的细节,例如造反派对外交机构和很多国家使馆的冲击,整个外交使团内部对“文革”的态度,苏联东欧阵营的外交使节每个星期都聚会商讨局势等等。有一次他在

首都机场被中方人员拦住,强迫他读毛泽东语录,他设计脱身,留下一个低级外交官去应付。但最有意义的一段是他帮助中国官方把“井冈山会师”由当时的“毛林会师”改回“朱毛会师”,并由此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朱德和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在“文革”期间由于林彪被定为毛的“接班人”,朱德被批为“老军阀”,“朱毛会师”一度被篡改改为“毛林会师”。好学的加西亚对中国革命史十分熟悉。1971年元月2日,周恩来破例前往古巴大使馆参加古巴国庆招待会,这是周恩来开始调整受“文革”冲击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步骤。加西亚抓住机会向周恩来提出在他离任前到中国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地方)走一走,中方批准了。文革期间外国人不能随意离京,外交官去外地旅游也要特批。在江西参观期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一再要求他对中方的工作“提意见”,于是他向中方提出了一些受“文革”影响的历史问题,例如为什么南昌起义纪念馆被关闭,在井冈山究竟是“朱毛”还是“毛林”会师。他告诉中方人员,古巴也有过类似的对历史的处理问题。有一次卡斯特罗出席一个纪念古巴革命英雄埃切维里亚的会议,会上古巴青年团的负责人重读了埃切维里亚在发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武装起义时的一份声明。但卡斯特罗发现这个干部故意漏掉了原文中类似于“上帝保佑我们”这样的语句,于是他打断了那个干部,要他重读这句话,还说了一段大意是历史就是历史这样的话。中方外交部官员把加西亚的意见上报后,周恩来批转给毛泽东。毛林当时的矛盾已经深化,毛于是批示,要求改回“朱毛会师”。这段改来改去的历史,后来在官方所谓“林彪事件”的叙述中非常重要。

加西亚在“文革”的一个特殊时刻起了那样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件事早就记载在一些中国外交官的回忆文章中,尽管细节上有出入,也没有卡斯特罗谈埃切维里亚那一段。这段故事我很多年前就读到了,由此也知道了加西亚这个名字,在为《中国季刊》写书评时立刻就想到这两个加西亚是同一人。在采访中,加西亚详细介绍了周恩来在1971年4月初他离任前和他的谈话,这是对中方材料的重要补充,对研究“文革”历史

应该有一定意义。周恩来感谢他帮助中国纠正了一个历史错误,并就他被中方人员要求读毛泽东语录一事表示歉意,说当时中国的外交工作出现了无政府状况,外交部甚至一度失去了对密码的控制。周恩来介绍了“文革”中国内的情况,针对军管的情况说军队现在应该回到军营中去,军人不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周说中国现在不再坚持一个“好的反帝国主义者必须是一个好的反修主义者”(即“反帝必反修”)这个说法,意为中共可以和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的共产党发展关系,例如古巴。周恩来花了很长时间和他谈了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尽管当时中美在越南战争中实际上在直接对抗,周恩来强调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台湾而不是越南。他还告诉加西亚:中美很快就可能在最高层展开接触(当时离基辛格秘密访华还有好几个月),中方想让古巴方面了解这个情况。加西亚根据当时古巴官方的立场说尼克松政府是法西斯政权,尼克松英文名字中的X在古巴报纸上从来就是印成法西斯的那个符号。周恩来纠正说:尼克松不是法西斯,美国永远不会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他们还谈到了当时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独立出去(即现在的孟加拉)引起的印巴战争和国际冲突——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反对东巴独立,而印度和苏联支持东巴独立,中国认为这是苏联在南亚扩张势力并和印度地区扩张主义联手。加西亚说他认为东巴要求独立是东巴民族主义问题,周恩来承认他的看法有道理,但说中国必须支持巴基斯坦,反对东巴独立。

前往一个在很多方面处于非理性的混乱无序中的国家就任,而且是匆忙之间走马上任解决一个棘手的外交问题,对于很多外交官来说可能很难培养起对这个国家及其文化的感情。但加西亚不同。在中国的特殊经历给了他了解中国及其文化的机会。尽管自己曾经是个激进的革命者并为此被迫离开第一任外交职位,他对中国的“文革”还是绝无好感。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态度。他对我说,他对中国的态度和苏联东欧阵营的外交官不同。苏联东欧阵营的外交官每周聚会,商讨如何对付中国。加西亚说他从不参加这样的聚会,他对他的苏东同僚说他来中国是为了保持和发展中古关系。当中美开展“乒乓外交”,

美国乒乓球队在北京和中国队进行“友谊比赛”时,苏东阵营没有高级外交官出席,但他去了,中方注意到了,周恩来和他见面时也提及此事并表示谢意。中国方面对“井冈山会师”一案的纠正和周恩来的军队现在应该回到军营去的谈话,让敏感的加西亚觉得林彪的地位有问题了。在和我的交谈中,尽管事隔多年,他仍然为自己当时准确的判断而骄傲。

加西亚在中国任职的后期,正是周恩来试图扭转中国由于“文革”而在国际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局面的时候。周既想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关系,又想和美国发展关系,这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是难以两全的,事实上也给中国和朝鲜、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投下了阴影。周给加西亚很高的礼遇,在会见时可以说畅所欲言,但这并没有起到他期待的结果。加西亚回国后,古巴方面不久就对基辛格访华一事对中国大张挞伐,一度有望改善的中古关系又急剧降温。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古巴加入苏联的全球战略,将军队派往非洲,和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发生直接冲突,被当时的中国称为“苏联霸权主义的走卒”和“反华小丑”。1979年中国和越南发生边界战争,而越南一直被古巴视为最了不起的反美英雄,所以哈瓦那勃然大怒,不但召开数十万人大会谴责中国,而且把当时中国领导人称为“希特勒式的角色”。这个政治环境对对华友好的加西亚显然不利。他告诉我说,一些人指控他“亲华”。这和他结束了东德大使的任期后没有再担任外交使节,而是安排去研究国际问题有没有关系呢?我没有问,只是猜测而已。

从革命者到佛教徒——吴帝胄的人生经历

吴帝胄(西班牙名 Petro Eng Herrera)有一半华裔血统。他的父亲吴国祥原籍广东新会,上个世纪初移民古巴,是哈瓦那的小商人,也是知识分子,为当地华文报纸写稿,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也支持古巴的民族主义革命,还是古巴独立战争领导人的密友。吴帝胄的母亲是一个十分貌美的西裔护士,不顾家庭反对和吴帝胄的父亲结婚,但不幸在吴帝胄五岁时就去世了。吴帝胄

有一个兄长,抗战时期奉父命回中国参加中国空军,成为飞行员,还受到宋美龄的接见,1949年以后他选择留在大陆。吴帝胄从小就受父亲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中国海军舰队访问古巴时,哈瓦那中国社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少年吴帝胄是乐队中的乐手。中华民族主义之外,吴帝胄也深受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古巴华社的影响。自20年代起,古巴华社先后成立过工农反帝大革命同盟、新民主同盟和社会主义同盟,出版左翼日报《光华报》,并和古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过密切联系。古巴共产党人甚至想在古巴建立和中国国共合作类似的统一战线。50年代中期,在他父亲的杂货店里工作的吴帝胄(当时20出头)就加入古巴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会中工作。1959年卡斯特罗的革命成功后,他带头成立华裔民兵队,以1920年代哈瓦那华社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黄淘白的名字命名,帮助新政权接管中国城。1960年秋当古巴与台湾断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吴帝胄的民兵队在接管国民党在哈瓦那的外交和党政机关以及各项产业中一马当先。黄淘白民兵队后来并入古巴正规军,吴帝胄进入古巴内政部工作。

1974年,吴帝胄的人生经历发生重大转折,他被古巴内政部开除,原因是有人指控他亲华。出于对苏联援助的依赖,古巴在中苏对立中支持苏联,和中国关系自1965年开始恶化,1971年中美开始逐渐恢复外交关系后两国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古巴的华社深受两国关系恶化的影响,很多在古巴党政军机构中工作的人被迫放弃华裔认同,回避和华社的来往,也有人为了他们的华裔身份受到歧视和迫害。吴帝胄失业一年多,才被安排进文化部担任一般干部。吴帝胄本来和在中国大陆的兄长一直保持联系,但在1970年代的气氛下出于恐惧而中断,后来彼此再无音讯。除了受中古关系的影响,在华社内部吴帝胄也成为极“左”分子的攻击目标。古巴华社内部的极“左”分子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亦步亦趋,在华社内挖反革命,吴帝胄因参加1946年欢迎中国海军的活动(当时他还是少年)而被批为“国民党分子”,他的父亲由于和革命前华社各方面的复杂关系也被戴上“国民党”的政治帽子。

1991年吴帝胄退休后,以民间历史学家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华裔对古巴民族独立、政治革命、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研究,收集了大量历史材料。此外他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画家,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作。他用绘画的方式叙述历史,其风格有些类似于原始主义画派,用粗犷的线条和亮丽的色彩把1959年革命前五彩缤纷的哈瓦那华社表现得生气勃勃。他告诉我,自己现在是一个佛教徒。这是一幅他画的“慈航普渡”:释迦牟尼像很多佛像上那样坐在莲花宝座上,但下面多了一棵加勒比海常见的棕榈树。

向民间揭示真相——吴帝胄和加西亚的古巴华人历史研究

吴帝胄和加西亚晚年都投身于古巴华人史的研究并因此成为密友。他们的族群身份和人生经历很不相同,但他们都曾经是理想型甚至狂热型的革命者。吴帝胄说他11岁时就参加了哈瓦那华社中社会主义同盟的活动,加西亚则在高中时就加入了左翼学生组织。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一起了呢?为什么他们都选择了古巴华人史作为研究对象呢?

我在采访中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十分简明:这是为了历史的公正,恢复华裔在古巴历史叙述和民族构成中应得的地位。那么,华裔究竟对古巴有过什么样的贡献呢?

华人于1847年开始前来古巴,取代即将取得自由的黑人奴隶,大大减轻了废奴运动在加勒比地区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使得古巴经济在奴隶制废除后能继续发展。1870和1880年代,大量从美国西部过来的华人加入了创建哈瓦那中国城的活动。这些人在美国小有积蓄,但受到1870年代美国排华运动的影响而选择离开美国。20世纪中期,哈瓦那的中国城在规模上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旧金山的中国城,拥有数千大小商家,华裔成为古巴经济中最活跃的少数族群。在政治上,出于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愤恨和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大量华工和小业主参加了古巴民族主义者马蒂领导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从马蒂的战友,古巴开国元勋之一的奎萨塔(Gonzalo de Quesada)那里赢得了“没有一个中

国人是逃兵,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的赞誉。奎萨塔早在1892年,即古巴独立前10年,就写下长文赞扬参加古巴独立斗争的华裔的贡献。1931年古巴政府和华人社区在哈瓦那海边建立了“旅古华人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但由于“九·一八事变”,哈瓦那华社没有举行揭幕和庆祝仪式,而是将之留到1946年中国抗战胜利后成为世界大国,中国海军第一次访问古巴,他们才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碑揭幕仪式和欢迎中国海军的活动。民族主义革命之外,从1920年代开始,华人知识分子也积极参加了古巴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很多人加入了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即1962年以前的古巴共产党)。1950年代下半期,大量华人参加了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目的是恢复被军事强人巴蒂斯塔中止的宪政,实现社会正义,争取古巴经济独立。古巴华人对所在国政治生活的贡献有它的特殊意义:一般来说海外华人总是尽量避免卷入当地政治冲突和纠纷,很少有华人在它国政治独立和国家建设中像古巴华人那样积极。

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上,华人社区以哈瓦那中国城为中心,区区两万人口(常驻)不到,却拥有4家报纸(起码有两家日报),数十个拥有自己活动场所的民间社团和一个代表华社整体的中华总会(由各社团选举产生),4家影剧院,众多的文体俱乐部,一家银行,一家医院,一家养老院,一个面积很大的社区墓地,还举办各种和中国文化或者拉美文化(例如嘉年华日)有关的庆祝活动。因此,整个华人社区在古巴(尤其是哈瓦那)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远远超出了它在总人口中的比重(1959年古巴人口有600多万,华裔只有一万多),中国城因其繁华而有“加勒比的小巴黎”之称。

历史作证:华人在古巴不是外人,不是埋头挣钱万事不问的打工仔或小店主,也不是用炫耀和卖弄自己族群文化的奇异特色博得主流社会青睐和宽容的少数民族,而是古巴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的积极参与者,是古巴除了西裔和非洲裔以外第三个重要的族群。在华人社团场所,孙中山的画像和中国国民政府的旗帜与马蒂的画像和古巴共和国的旗帜并列悬挂,体现了华人对中国和古巴的双重民族主义情感。华人参加马蒂领

导的革命,是为了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古巴共和国。他们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是为了这个革命许诺的恢复宪政和民主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历史细节是:推翻巴蒂斯塔的联合阵线一建立新政权,就通过了以被巴蒂斯塔中止的1940年宪法为蓝本的古巴共和国新宪法,确认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华社在一周之内就迅速翻译出版了这个新宪法的中文本《古巴共和国基本大法》,其第一条就是古巴是“共和国家,以共同享受政治自由、社会正义、个人和集体福利和人类团结为本”。(毫无疑问,国家最高权力的独揽和共和制是格格不入的,就连巴蒂斯塔当初也不得不声明共和宪法的中止是暂时的。但众所周知的是,这个由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产生的《古巴共和国基本大法》很快就在掌握了枪杆子的政治权力下变成一纸空文,现在则完全被遗忘了。)

但是,这样一个对民族历史做出卓越贡献并具有鲜明的民主共和意识的族群,在今天的古巴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1959年古巴革命后,在经济收入上高于平均水平的华人社区成为革命的对象,私人产业从银行、商店到街头小贩先后全部被国有化,整个社群在经济上被釜底抽薪。失去财产的华人社区各个民间社团和文化事业也置于政治权力的直接控制下而大大萎缩,例如4家报纸革命后就被关了两家,到60年代末只剩下《光华报》一家。就这唯一的一家自7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常常因为没有纸张和缺乏资金而暂停出版。我在报社印刷厂采访时,看到挂在印刷机上的是一张印到一半的两个月前的报纸。在阅读华社团体自70年代以来的会议记录中不时可以看到有关《光华报》停刊和复刊的讨论,说明它一直困难重重。曾经是社区财产的墓地也被国有化,但政府却不承担任何维护责任,古巴工人进入墓地种树,今天很多个人墓穴已经被树根从底部拱起而断裂或粉碎。作为社区空间的中国城今日之衰落和破败,令在记忆中仍然保有昔日“小巴黎”印象的人触目惊心。

最为令人痛心的是华裔族群意识的消失。今天全古巴只有200个左右垂垂老者还可以说是“华人”,他们是1959年革命以来的活化石,还能说一些广东话,识一些中文。中华总会馆今天号



旧哈瓦那华人社区的戏剧活动

称有 3000 会员，但据会馆秘书长周卓仁先生告诉我，这只不过是个纸面上的统计数字。这些人多半是华人和西裔或非洲裔婚配的后代，自 1960 年代以来华社在古巴的地位和华人的遭遇早就造成了他们和这个族群的特有文化和传统的隔膜。虽然节庆时期或者当有中国代表团来访时他们可能被找来应景，但他们当中没有人懂汉语或广东话。可以预计，如果没有新鲜移民血液的输入，华人社群在古巴很快将真正成为历史。

后冷战时期中古重新建立战略性关系后（始于 1989 年古巴政府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古巴政府开始修正对华社的政策，设立了哈瓦那中国城重建项目，由一个政治局委员主管，尤其是对哈瓦那中华总会馆的内部装修投入了大量资金，今日这个会馆里面可以说很富丽堂皇，形形色色的中国代表团访问哈瓦那时就被带到这里参观。逢年过节中国城里也常能看到舞龙和其他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表演。此外还给华社以私人 and 团体开设餐馆的特权。因此，华裔的身份今天不再是一种忌讳。一个政治权力的牺牲品就这样出于政治考虑转而成了权力的受惠者。当然，这种在官方主持下的复原离昔日哈瓦那“小巴黎”之间的距离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今日游览哈瓦那中国城的人看到的往往只是那条在“中国城”小牌楼后面的近十家饭馆，以为这就是“中国城”了，从而加深了华人只会开饭店，华人在居住

国的文化点缀就是过年过节舞狮子和耍龙灯这些族群和文化偏见。这样一种重建已经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新的东方主义”的议论和批评。

在古巴官方历史叙述中，直到 1990 年代，华人和华社一直是个禁区。官方以促进族群融合，创造一个新的不分种族的“古巴人”为理由回避和压制对古巴华人史的研究。这种态度加上中国和古巴的敌对关系，更加剧了华社的衰落和华人族群意识的消亡。自 90 年代起，受中古同志关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古巴官方开始允许甚至鼓励华裔历史的叙述和研究。但是这种叙述和研究仍然有着难以逾越的禁区，这就是革命前古巴华社究竟有多么繁荣，革命后华社又为什么迅速消亡？2005 年在美国出版的《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有中文版并加入了中国的“红色”怀旧话语）就是一个事例。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左派出版社“探路者”的编辑对三个身居高位的古巴华裔将军的采访。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次由有古巴官方身份的人出面对华裔的历史贡献以大张旗鼓的方式作了高度评价，可以说正式结束了这个话题作为禁区的历史。但在编辑的处理下，全书被革命（解放）话语主导，不但书名，内容也在于强调古巴革命并没有“终结”。它说古巴革命给华裔带来“新生”，因为革命实现了阶级平等和种族平等，例如在拉丁美洲找不出另一个华裔当上将军成为政府高官的国家。这种论证不过说明“官本位”绝不是中国特色，而是由所有崇拜政治权力的社会所共享。华裔既然如此从革命中受惠，那么又如何解释哈瓦那中国城的消失呢？三位将军基本上回避了政治权力的作用，而是归咎于“生老病死”。此外，全书的重点在于古巴华裔对“革命”的贡献，而非华社在 1959 年以前的全貌。对古巴华社的消失感兴趣的读者从这本书中很难得到实质性的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吴帝胄和加西亚的工作具有非凡的勇气和意义。在《华人在古巴——1847 年至今》这本书中，华人对古巴独立和革命的贡献固然是一个重点，但全书用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华社 1959 年以前作为自治的民间社会是如

何繁盛的全貌,不但那些社团组织和报刊俱乐部的来龙去脉,就连有多少洗衣店多少水果摊和理发店这样的细节都无一遗漏。它对华社文化的丰富和社会活动的积极也有全方位的描绘。任何一个具有起码的常识和理性的读者在读完全书后都会对那个被革命话语百般诅咒的时代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受,很难相信那是一个被华社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外部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所统治的社会。对哈瓦那中国城的衰落和华人族群意识的消亡的具体过程,两位作者在古巴当今的环境下虽然还不可能专设一个章节来揭露,但在很多地方或是点明或是暗示,那就是因为革命、国有化和对华裔族群意识的压制。因此,1959年的革命带来的与其说是种族平等,不如说是族群消亡。或者说,革命话语在概念上把族群消亡偷换成了种族平等。

在言论自由的西方,左翼史学自我标榜“向权力诉说真理”,听上去很有站在道德高地的气势,但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变成了“帮权力掩盖真相”。《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就是这样一种史学的范例。相形之下,“向民间揭示真相”是一种更朴素更明了的诉求和目标,这就是吴帝胄和加西亚的选择。青年吴帝胄和加西亚参与了摧毁旧古巴、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但半个多世纪后,他们却在晚年用全部精力试图在文字和画面上重现那个被摧毁的旧世界的一个场面甚至一个角落。吴帝胄笔下的旧中国城阳光灿烂,连墓地和祭祀都用了强烈的色彩来表现。在他眼中华社生活一事一景都可以入画,连磨药的石碾和称药材的量具都描绘得趣味盎然。两位老人带我前往和昔日哈瓦那华人社区历史有关的很多地方,目光所及之处无不引起他们深深的叹息。在哈瓦那一处由于防止古巴人从这里偷渡去美国而被关闭的港湾,加西亚告诉我50年代当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码头是如何热闹,夜晚灯光是如何灿烂,人流是如何熙熙攘攘,难以相信今天会变得如此死寂。吴帝胄则沉浸在儿时父亲带他来这里在清澈的海水中游泳和钓鱼的回忆中。在哈瓦那市中心最著名的景点国会大厦的对面,马路旁边在破烂的挡板背后存放着十多个锈迹斑斑的废弃的火车头,周围又没有铁路。我看了十分不解,这就等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面无来由地出现这么一

大堆废铜烂铁。我问他们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旅游者摩肩接踵的地方会出现这么一个煞风景的场面,他们都很茫然,但我觉得他们对此类现象早已习以为常。两人简短交谈几句后,加西亚意味深长地用英文对我说:“I'm gonna.”我立刻明白,这不是他的话,而是最高领导人信心满满要摧毁一个旧社会创造一个新社会时曾经的口头禅,意为“看我的”或者“什么都会有的”。

历史的潮流和普世的追求

加西亚和吴帝胄两位老人的选择和志业其实是全球范围内后革命和后冷战时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挑战官方或者主流历史话语,重写国家历史和重建民族记忆的时代潮流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工作具有普世性。在思想层面,本文开始时介绍的那幅画揭示了更深刻的普世主义精神。“天下为公”用最朴实的语言回答了“什么是社会公正”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会心的读者自然能明白它在当时当地的含义,而“祖国就是人类”则在身份认同上超越了任何狭隘的族群意识,体现了精神和心灵上“世界公民”的境界。吴帝胄的身份既是华裔又是西裔,一生经历了源于族群身份的追求和困扰,但在晚年得出这个感悟,并把这个感悟和加西亚分享。加西亚和吴帝胄不同,他虽然没有族群身份的困扰,但他却把这幅画展示在自己家中最醒目的位置,说明了吴帝胄的感悟在他心中的共鸣。他晚年投身于发掘和拯救一个和自己的族群身份无关的少数民族被政治湮没的历史和被权力压制的记忆,这本身就闪耀着普世精神的光芒。我告诉加西亚,这幅画表达的境界让我很感动。我向他顺便提起中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的争论。他听了十分会心,说他完全理解这样的争论具有什么样的背景。

超越族群认同和意识形态的是非,追求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这就是把吴帝胄和加西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是孙中山和马蒂这两个自己国家民主共和制度之父的追求。后人评判历史和现实,应该以此为参照。

(作者为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都拥有一部回忆录！
愿每个老人

二千元起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

- 出书范围：**
1. 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2. 生平传记：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回忆录、自传。
 3. 思想论著：理论专著、自研著作、旧文结集、旧书翻印等。

一般标准：

大32开本，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无线胶装。二百页出版50本两千元，三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特别说明：

书稿内容文责自负，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办理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另行安排。



都拥有一部家族史！
愿每个家庭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家谱图册、家史传记！

- 出书范围：**
1. 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录音、摄像，遗作汇编。
 2. 家史传记：家族大事记、家族先贤传、家谱族谱、家史档案等。
 3. 传家宝盒：百年家族史、家族图片册、家史光盘、家族音像等。

一般标准：

16开本，封面与重要照片插页铜版纸彩印，文字内页胶版纸黑白印刷，无线胶装或锁线精装。基本价格：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三百页出版50本四千元，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出版附赠光盘，需录音摄像另行协商）。

出版服务专员热线：010—68920114 62525116

展示咨询中心：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西大街64号、海淀图书城文化步行街
雪芹书画社2楼大厅 邮编100080

编辑部接待室：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5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
博越商务楼6106室 邮编100089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ae.net）

长途免费咨询电话
400 633 2311

欢迎订阅2011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6853905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8.00元

全年定价：96.0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

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是从《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至1995年计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的重点文章150万字，编辑为五卷珍藏本，分别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该珍藏本出版后一度脱销。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精品书系五卷珍藏本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由于数量有限，恕不分卷出售，欲购从速。定价125元，另加邮资12元。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联系电话：010-68532048 68539058，传真：010-68532569。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欲购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购。



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

朱厚泽的到任和离职

大跃进前后的煤炭工业

为何“耀邦不愿动华国锋”

黎澍批判专制主义

古巴革命与华侨的命运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6.90元